

美国研究

季刊

1994年第1期

AMERICAN STUDIES

第8卷

3月5日出版

- 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正确所向
美国人眼中的“大中华”
反英雄与亚文化
——美国战后避世朝代作家与王朔比较研究
朝鲜战争初期的英美关系（1950.6-1951.6）
- 陈宝森（5）
王缉思 朱文莉（13）
朱世达（24）
赵学功（31）
- 争鸣
国际政治的又一种透视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述评
塞缪尔·P·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
- 王逸舟（42）
徐国琦（48）
- 论点摘编
罗斯福“新政”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罗斯福“新政”
中美贸易中双方的利得分析
克林顿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 刘绪贻（57）
李存训（59）
韦伟（63）
陈克容（65）
- 书评
为美国开药方
——介绍莱斯特·瑟罗新著《21世纪的角逐》
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
——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 张蕴岭（66）
杨玉圣（69）
- 信息
美中经济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 胡国成（73）
- 新书架
- （77）
- 告读者
- （80）

本期责任编辑：赵梅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仰山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3.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Sprint 1994

Vol. 8, No. 1

ESSAYS

THE CORRECT WAY FOR DEVELOPING SINO-U.S. ECONOMIC TIES

Chen Baosen (5)

In the post-Cold War period, both America and China are facing the historical task of invigorating their respective economies. Better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will bring substantial benefits to the economies of both countries and contribute to their revitalization. Now that China's open policy is all-round without any obstacle to a closer economic ti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up to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to surmount ideological divergence, adopt correct policies towards the mainland of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 and lead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to a healthy and steady development.

“GREATER CHINA” IN THE AMERICAN EYE

Wang Jisi and Zhu Wenli (13)

In recent years America's China watchers hav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merging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Taiwan and Hong Kong, which they often refer to as “greater China.” The article analyzes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is are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toward China.

ANTI-HEROES AND SUB-CULTUR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WRITERS OF THE BEAT DECADE AND WANG SHUO

Zhu Shida (24)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socio-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scenarios of American society in the 50s and Chinese society in the 80s and 90s that give birth to the writers of the Beat Decade and Wang Shuo of China. The author comes to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leading characters of their fiction are all anti-heroes, sharing the same free-for-all outlook on life and a lack of belief in anything but easy pleasure though Kerouac's anti-heroes are other-worldly and Wang Shuo's are worldl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y are all sub-cultural phenomena with but secondary literary and aesthetic importance.

U.S.-BRITISH REL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KOREAN WAR

Zhao Xuegong (31)

The United Kingdom was one of the major countries engaged in the Korean War as well as the most important military all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war its divergence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such issues as the Taiwan policy, the petroleum embargo on China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war and so on, and British efforts all had impacts on U.S. policy toward Korea. Thus any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U.S. relationship would doubtlessly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course of war.

ESSAY REVIEWS

A NEW KIND OF PERSPECTIVE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ng Yizhou (42)

The author examines a recent article by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criticizing the view on confrontat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and discussing the role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0tates in contemporary world. The approach of "Grand-culture" embodied in the article is reviewed. Huntington's response to the criticism published in *FOREIGN AFFAIRS* is also appraised on some key points.

SAMUEL P. HUNTINGTON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Xu Guoqi (48)

The merits in Huntington's essay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include his emphasi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ization of nations and his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from a cultural viewpoint. However, his theory does not help in understanding these conflicts, because he sees the term "civilization" as immutable and oversimplifies it. Besides, he uses double standards in interpreting facts; his depicting of the Western and other civilizations has not got out of the rut of the Cold War; and he ignores the influence of market econom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nkind have to cooperate if they are to survive. His argument on antagonism of mankind may lead the world astray.

ACADEMIC DIGEST

PLACE OF ROOSEVELT'S NEW DEAL IN WORLD HISTORY

Liu Xuyi (57)

WORLD WAR II AND F.D. ROOSEVELT'S NEW DEAL

Li Cunsun (59)

ANALYZING GAINS OF BOTH PARTIES IN SINO-U.S. TRADE

Wei Wei (63)

THE ECONOMICS BILL CLINTON NEEDS

Chen Kerong (65)

BOOK REVIEWS

A PRESCRIP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MMENTS ON *HEAD TO HEAD* BY
LESTER THUROW

Zhang Yunling (66)

TRACKS OF A RESEARCH OF AMERICAN HISTORY: COMMENTS ON *THE AMERICAN
HISTORY AND AMERICANS* BY DENG SHUSHENG

Yang Yusheng (69)

ACADEMIC ACTIVITI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Hu Guocheng (73)

NEW BOOKS (77)

THE EDITOR'S NOTE (80)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正确所向

陈宝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一、改善中美经贸关系有利于两国经济的振兴

在冷战后的世界格局中，美国和中国都面临振兴本国经济的历史性任务。克林顿总统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中获胜，说明他所提出的用积极行动振兴美国经济的主张得到多数美国选民的认同，愿意给他一试身手的机会。

克林顿经济纲领的许多内容如削减财政赤字，控制政府开支，压缩军事费用，改善基础设施，改革教育制度，促进科技发展，革新医疗保健等等无疑都是必要的。但是要振兴美国经济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处理好它同对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相互之间的经贸关系。否则他仍将难于实现振兴美国经济的宏伟目标。为此他需要制订高明的经济外交战略，而正确的决策则出于对当今国际竞争态势的正确判断。

麻省理工学院的莱斯特·瑟罗教授不久前出版了《二十一世纪的角逐》(Head to Head)。这本书论述了冷战后由军事竞争转变为经济竞争的历史特点。他认为“1992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没有对手，但是经济超强却有三家即美国、日本和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它们正在进行一场争夺世界经济霸权的角斗，未得喘息，旧时的军事争夺战已经转为一场经济争夺战”。这一估量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已成为当前很多人的共识。

在这场经济争夺战中，三方除了要发挥各自的内在优势之外，还都在策划外联合的战略。

瑟罗对欧洲的外联战略是这样描述的：“利他主义加上对边界上迫在眉睫的动乱的担心将导致（西欧。——作者注）对中欧和东欧提供援助”，（1）如果“在扩大的共同市场上把很大一部分中欧和东欧与西欧结合起来，那末就可以建立起别人不能建起的大市场，……拥有8.5亿到9亿人口……即使欧洲仅所得部分成功，迄今他们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2）

瑟罗也对日本的对外联合战略作了估量，他说：“日本通产省在谈论东亚地区秩序，把日本的大部分潜在利益寄希望于中国和俄罗斯东部。这样做并不是想要建立一个具有平等制造格局的共同市场，而是要一个能为日本制造业产品提供原料供应（俄罗斯）和潜在巨大市场（中国）的共同市场。”（3）

瑟罗没有谈美国的外联战略，实际上美国也有自己的战略并正在执行。这就是自美加自由贸易区出发，演变到建立美加墨自由贸易区并为囊括中南美洲的“美洲经济圈”奠定基础。

这种依靠地缘优势实行经济联合的战略有其在经济上存在的理由，但绝不是联合的唯一途径。正如瑟罗所说：“经济地理可能要比自然地理更为重要。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与美国一体化的程度远胜过它们与日本一体化的程度，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没有理由认为贸易集团非要由地理上相连的国家组成。组成富有创造性的和令人感到意外的联盟的潜在机会是相当多的”。（4）

除去经济地理比自然地理重要的理由以外，还应当看到以自然地理为依托的联合完全不

能适应大企业生产力日益膨胀对世界市场的需求。大企业的兴旺取决于在全球获得生存空间，这就是区域经济集团化不能取消经济全球化的原因。而 21 世纪国际经济谁主沉浮的问题又取决于三强所属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的成功与失败。

可见美国要想在未来竞争中取胜仅靠北美自由贸易区乃至“美国经济圈”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在全球范围物色更多可以合作的伙伴。“组成富有创造性的和令人感到意外的联盟”。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如果不考虑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将是不明智的。

中国这个市场早已为世界所垂涎。1898 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时面对的是一个经济落后，政府无能，处于被列强瓜分危险之中的旧中国，当时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政府空前开明，愿意同一切友好国家进行全面经贸合作的国家，它已经开始对世界经济产生相当的影响。中国的魅力在于它已经是一个具有相当购买力的大市场，它有日益改善的投资环境，在这片土地上兴办实业资本回报率相当高，它的政府正在执行比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更为开放的政策。正因如此，眼光敏锐的各国企业家正在纷至沓来同中国洽谈经贸业务。连过去只愿贷款不愿办企业的日本大公司也已改变初衷，以空前的热情来华投资。欧洲也不例外，他们的企业家所采取的主动行动还得到了各自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可见同中国建立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已成为许多国家在争夺世界市场时的重要考虑。他们已意识到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将为他们的竞争地位增加份量。

美国的许多企业家也是聪明的，目光敏锐的。美国实业界、金融界的许多人都看好中国这个市场，纷纷来华洽谈业务，开店办厂。现在到上海投资的美国跨国公司已达 80 多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自 1992 年以来突飞猛进。据美国商会对 1069 家大公司的调查，现在还没有来华投资者有 63% 准备在今后五年中有所行动，已在中国投资者有 89% 准备在今后五年中扩大生产，实行再投资。

一个发人深思的例子是美国电报电话公司 (AT&T)。几年前该公司不重视中国市场。在程控电话线路的报价中输给了日本和欧洲的公司。现在该公司调整了对华战略。今年 2 月与中国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签订了内容广泛的谅解备忘录，准备把中国变为该公司业务全球化的基石。为此它提出了一个到 1997 年向中国投资 100 亿美元的计划。现在中国方面与 AT&T 的合作是大门敞开的。障碍来自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个是限制向中国出口技术的问题，另一个是每年一度美国国会就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争吵。这些障碍都有可能使 AT&T 在中国的雄图大略受到挫折。

从上面这个例子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和国会建立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对美国的意义在认识上还远远落后于美国的企业界。美国相当多的企业界人士已经看到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关系，看到美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一旦与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便宜而优秀的劳动力以及尚待开发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就能给两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并将有利于中美两国经济的振兴。

现在中国的开放政策是全方位的，建立与美国更密切的经贸关系不存在任何障碍。关键是看美国。看克林顿政府能否从振兴美国经济提高美国国际竞争能力着眼，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像尼克松总统在 1972 年那样采取勇敢的，创造性的，令人感到意外的行动，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谱写出新的篇章。这是历史向克林顿提出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二、大陆、香港、台湾经贸关系的加强和美国的对华政策

海峡两岸、香港三地的经贸关系本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经贸关系。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尚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海峡两岸仍处于人为的分割状态。因此内部关系扭曲为外部关系。但是随着香港的即将回归和两岸关系的互动，港、台与大陆之间的经贸关系正在出现空前良

好的势头。为了应付21世纪国际上的激烈竞争,三地以民族大义为重加强合作,发挥相互之间的互补作用是使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

美国与港、台之间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相互在对方都有重要的经济利益。作为贸易伙伴美国在香港的进口中仅次于中、日、台居第四位,美国市场在香港的出口中则占第一位(见附表)。早在1898年美国在香港的总投资已达60亿美元,1992年达70亿美元,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有800多家美国公司在港注册,其中包括18家银行和14家律师事务所。美国同台湾的经贸关系也非比一般,1992年美国在台湾的进口中仅次于日本而居第二位。美国市场在台湾的出口中则占第一位。长期以来美国还是台湾最大的投资者,在台湾外资中的比重为38.9%。有鉴于此,美国关心港、台的前途和发展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与港、台之间也有程度不等的贸易磨擦,处理好这些关系使美、港、台之间的经贸关系得到顺利发展也是彼此关心的问题。就美国方面说需要有对港、台的正确政策。这有两方面,一是对香港回归祖国和两岸的统一采取什么政策;二是对贸易磨擦采取什么政策。对第一个问题美国有三种政策选择即:(1)采取有利于顺利回归和和平统一的政策;(2)采取无害于回归和统一的政策;(3)采取不利于回归与统一的政策。对第二个问题美国也可以采取两种政策,一种是施加高压和单方面制裁的办法;另一种是采取理智的,平等谈判的办法。

在考虑美国对回归与统一问题的对策时,美国应当理解两岸、香港经济贸易关系日趋紧密是不可逆转的,三地经贸合作越紧密就越能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并使各自的经济更加繁荣。香港的回归和两岸的统一将从政治上促进这一进程,因此美国采取有利于回归和统一的政策将是明智的。

三地加强经贸合作为什么会增强国际竞争力呢?这是因为三地在经济上各有优势和劣势。紧密合作,优势互补就可以产生 $1+1>2$ 的力量。

首先让我们观察一下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香港的优势在于它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的经济中心之一,这表现在:(1)香港有相当发达的轻工业,以纺织、成衣、电子、塑料产品、电器、钟表为主,它的产品近90%出口外销,在国际上富有竞争能力并拥有在全世界行销的网络;(2)它是亚太金融及财务中心,在世界居于前列的100家大银行中,有四分之三以上在香港设有分行。香港有成熟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黄金交易所。香港股市与纽约、东京的股票市场处于昼夜衔接的地位;(3)它是地区性运输及航运中心,拥有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码头,联结世界各地的运输线,新建的港口和装卸设施,香港的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华的机场;(4)它是地区性专业服务中心,世界上知名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咨询公司、建筑公司、工程公司多数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5)它是地区性旅游中心,拥有许多世界级的酒店餐馆和购物中心,不少大型会议和博览会都在这里举行。此外香港还是跨国公司总部的集中地,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由1980年的174家增长至1990年的602家。

但是尽管香港拥有许多优势,它却也有自己的弱点。第一,劳工技术结构失调,某些行业劳工过剩,主要是低技术工人过剩,另一些行业劳工短缺,主要是技术工人短缺;第二,土地和劳工成本上升,香港办公室租金比台湾高55%,比新加坡高31%,香港的职工薪金比台湾和新加坡高3-20%;第三,经济效益下降,由于土地和劳工价格上升,营业成本增加并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幅,所以产值赶不上成本使效益降低。

香港同内地的互补关系在于内地可以为香港提供它所短缺的生产要素: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以电器电子业为例,由于香港的技术工人不足,在香港企业中熟练工人占雇员的比率1984-85年只有15%,1990-91年也只上升到22%,在把生产厂房转到内地之后1988年熟练工人的比率上升到24%,1991年更上升到60%。香港企业在把生产厂房转移到大陆之后,它的生产成本下降了。仍以电器和电子业为例,1980年在其成本的结构中物质消耗占77.6%,职工工资占14.8%,年利只有7.6%。到1

1989年由于许多企业把生产厂房转移到了大陆,其成本结构发生了变化,物质消耗下降到77.2%,职工工资下降到11.6%,毛利相应上升到11.2%。正因如此,许多香港企业都采取前店后厂的方式把生产厂房搬往大陆。目前在华南地区有300万以上的工人受雇于港资公司,在全国范围受雇者多达500万人,香港厂家约有75%在中国设厂,单以广东省一地计算就有23000家与港商合资经营的企业和80000家加工工厂。香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正在进行经济转型,发展附加价值高的高科技产业。但是香港的科研基础和科技力量相对薄弱,而大陆则有实力相当雄厚的科技队伍。两者结合起来将有利于香港的产业升级。

香港反过来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有力地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首先是成为大陆吸引建设资金的媒介。大陆的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港口及电讯都需要外来投资,香港可以成为大陆的资本市场。与此同时香港也可以为内地上市股票提供方便,安排政府债券和商业债券在国际上的发行;第二,香港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向国际的媒介,协助内地公司扩展国际贸易和投资。作为一个地区性的服务中心,它可以协助内地产品出口,提供货物转口、仓储、贸易信贷和商品交易等服务;第三,香港可以成为跨国公司向内地投资的媒介,充当跨国公司的顾问或合作人,沟通双方的文化和语言。特别由于地缘上的优势,香港对于广东省提出的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的宏伟目标可以做出特殊的贡献。

事实上,香港与内地已经形成了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彼此都已经并正在从经济上的一体化得到好处。从贸易上看,香港从大陆的进口1992年达到454亿美元,为1980年的16倍,每年平均递增26.1%;向大陆的出口1992年达到79.3亿美元,为1980年的38.6倍,每年平均递增35.6%;转口1992年达到272亿美元,为1980年的45.6倍,每年平均递增37.5%。贸易量如此迅速的增长自然给香港带来巨大的利益和繁荣,而香港与内地的相互投资也是巨大的。从1979年到1984年香港对内地投资81亿美元,1985年到1990年翻了一番,达到185亿美元;大陆对香港的投资也超过了100亿美元。

香港与大陆在经济上的日趋一体化给香港带来了繁荣,在香港有重大经济利益的美国当然也从中受益。因此美国只有对香港的顺利回归祖国采取热情支持的态度才是合乎逻辑的。

现在再来考察一下两岸的经贸关系。

台湾是新兴工业化地区,同香港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它也与香港相似,拥有资金、技术方面的优势,而这些恰好是大陆的短处。台湾的短处在于缺乏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力,而这些恰好是大陆的长处。据调查大陆工农业原料如棉花、铝锭、煤、花岗石等价格比国际价格低15—30%,劳动力价格只及台湾的1/10。大陆出口台湾的燃料煤价格为每公吨40美元,比台湾从南非进口每公吨便宜5美元,如果从大陆进口石油和煤炭,台湾每年可节省外汇10亿美元,但是由于两岸迄今仍未实现通航,这种地缘优势远没有发挥出来。这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正推动双方朝着加强经贸关系的方向发展。由于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90%以上的台湾正面临贸易增长势头放慢,产品缺乏竞争力,经济转型困难重重的局面。据台湾“经济研究院”的调查,1991年上半年台湾有近7成的产品,因出口下降而使整个产业陷于不景气之中。另据调查在2714家制造出口产品的厂家中有61%的公司对今后出口前景感到灰心,纺织、成衣、鞋业、玩具业更为悲观。

影响台湾竞争力的因素是成本上升。在生产要素中首先是地皮价格猛涨,1987—1990年间台湾地皮价格上了3.1倍,而同期日本上涨1/3,南朝鲜上涨1倍,美国上涨1/10;其次是工资上涨过猛,1987—1990年涨幅达87%,是东南亚各国的3.7倍。此外进口能源路途遥远,运输费用过高也是一个原因。台湾为了加强竞争力已致力于产

业升级和经济转轨。但至今仍有 2 / 3 的企业未能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原因之一是找不到合适的转产基地。台湾所面临的这些困难恰好是通过大陆的经贸合作可以顺利解决的。大陆的地价便宜,工人的素质好但工资低,能源储藏量和生产量都很可观。大陆的产业是多层次的,从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业到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业无所不包。对于不同层次的台湾产业都可以容纳。此外大陆日益繁荣的市场也为调整台湾出口商品的地区结构提供了可能性。

目前两岸经贸往来虽然还不畅通,但自 70 年代末大陆主动采取各种促进政策以来,两岸经贸往来已有长足发展。两岸的贸易额已从 1979 年的 2100 万美元跃增至 1992 年的 74 亿美元,增加了 351 倍。1992 年以来受到大陆景气的影响,台商对大陆投资快速增长。台湾“经济研究院”新出版的一份报告指出,从 1983 年至 1993 年第一季度台商对大陆投资金额累计已突破 100 亿美元,投资厂商超过 1.2 万家。同时台商的投资项目也由过去以劳动密集的制造业为主开始转向高科技产业和金融服务业。投资地区则由闽粤扩散到了内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台商的投资模式正在促进台、港、大陆三方面经济的结合。目前台商普遍的操作方式是由香港下订单,台湾提供资金与技术,大陆提供劳力与厂房,形成一种“两岸三地合作”,并以加工出口行业为投资重心;因此台商在大陆的企业平均出口占产值的 80% 以上,与大陆一般外资工厂出口平均占产值 27% 相比在创汇方面的成绩是很突出的。台商企业还为大陆新增劳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台商每年大约可以吸收大陆 8% 的新增劳动力,同时台商企业雇用的多为中低级技术工人,他们大多来自农村,有利于缓解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可见两岸经贸互补关系即使在双方往来仍处于初始时期的现阶段也已经显示出巨大的活力。这种势头足以说明只要不断促进两岸经济向更加密切的方向发展就可以使双方大大加强自己的竞争能力,这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

从美国在台湾的利益说,它是与台湾的经济繁荣连系在一起的。台湾经济要靠两岸经贸的密切合作而兴发,因此美国采取有利于两岸政治统一,经济紧密协作的政策将是明智的。

美国同台湾、香港存在不同程度的贸易磨擦,用什么姿态解决这些矛盾会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形象。用保护主义的大棒敲打贸易伙伴乃至发展到贸易战是不明智的。美国现在的许多做法正在促使东亚地区产生对美国的反感。瑟罗在他那本书中提到的美国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地理关系正在日渐削弱。目前还不存在什么亚洲经济共同体,亚洲国家深知同美国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性。美国不应用不适当的政策驱使亚洲国家选择建立对美贸易壁垒的道路。

三、不遗余力推进中美两国经贸关系

发展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但是良好的合作关系需要双方共同精心培育。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障碍如对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的问题、贸易逆差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本来都不应成为障碍,如果美国政府从两国根本利益出发,执行改善两国经贸关系的总方针,这些问题应当是不难解决的。

最惠国待遇本来是互惠的。把最惠国待遇作为政治筹码是不明智的。它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伤害别人,也会伤害自己,这本来是很浅显的道理。在布什政府时期国会民主党多数议员对最惠国待遇要附加条件,其矛头是指向布什总统。现在克林顿当政,国会把附加条件与否的决定权转给了总统,对克林顿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已经处于一个能够使中美经贸关系摆脱政治干扰,把它安放在一个稳定基础上的地位。

贸易逆差问题,双方的统计并不一致。即使按美方的统计数字,如果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导致逆差如此之大原有原来港台出口商品转移大陆生产的因素。如果把港台、大陆对美出口

加在一起,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增加很多,而中国对这些产品主要是加工,只收很少的加工费。对这一点美国学者也早有公论。另外中国本来愿意从美国进口更多商品,并为此做出了努力,但是美方对高技术出口加以限制,这就约束了本来可以抵销美国贸易逆差的商品出口。前不久克林顿政府宣布对盟国放宽高技术出口的限制,但对中国的出口仍然要巴黎统筹委员会审定。美国商人对此十分担心,如果不能取消限制,中国有可能从不受巴统管辖的国家进口同类产品,这将使美国商人失去机会。克林顿政府能否做出明智的决策,人们正拭目以待。

关于纺织品和服装向美国非法转口的指控连美国《商业日报》都认为美方的指责缺乏实据。美国海关宣称中方的非法转口高达20亿美元。但是据华盛顿一家跟踪进口配额的公司——国际开发系统公司估计,受指责非法转口的商品价值只有1.679亿美元,即只占1990年至1993年6月28日这个时期中国向美方出口纺织品及服装总值150亿美元中的1%多一点。但是美国海关拒绝讨论它的估计是如何得出的。美方的这种态度显然是不公正的。

中方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使分歧得到解决,并尽最大努力继续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做为学者,我们赞赏中国政府的下列做法。

在中美贸易方面,中方将信守1992年同美方达成的三项协议,即关于知识产权、劳改产品、市场准入三个谅解备忘录并在落实协议方面下功夫。此外,中国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过程中将不断改革自己的进出口制度,使之向国际惯例靠拢。

在引进外资方面中国将进一步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首先是改善引进外资的硬环境,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在铁路、公路、电力建设等方面加大投资力度。

(1)在铁路方面。1996-2000年期间将建设十大项目,其中新建铁路大动脉三条。第一是京九铁路,它将纵贯9省市,缓解南北运输的瓶颈。第二是南昆铁路,从广西南宁到云南昆明,联结西南五省(自治区)使四川、云南、贵州获得面向东南亚的出海口(钦州港)。第三条是西安——安康铁路保证将山西、陕西、内蒙古的原煤输送到大西南以促进四川的繁荣和陕西的开发。十大项目中有四项是使现有四条铁路电气化,有三项是使三条铁路由单轨变为双轨。在进行大规模铁路建设中,中国政府将欢迎外国投资,采取合资与独资两种形式都可以。已有的例子是深圳——平南铁路,它是由6家香港和内地的股东合作兴办的,今年3月动工,总投资3.28亿人民币,它是第一家由中国和外国股东管理的铁路运输企业,为今后铁路建设吸引外资开辟了道路。

(2)在公路方面。交通部计划在今后8年建设纵贯南北、横贯东西的四条国家级高速公路。纵贯南北的干线公路一条起自黑龙江省的同江,终点在海南省的三亚,另一条起点为北京,终点为珠海。两条横贯东西的干线公路一条起自连云港,终点在新疆。另一条起点在上海,终点在成都。这四条干线将是国家高速公路网络的主体部分,为各省市提供迅速、安全、经济、舒适的客运和货运服务。它们全长14500公里,联结100个大中城市和20多个省、自治区,它们将占全国高速公路网络全程的41.4%。在修筑高速公路中政府也将多渠道筹集资金,包括鼓励兴办合资独资公司经营高速公路、桥梁和隧道建设,以便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以及科学的管理方法。

(3)在电力方面。今后8年中国预计将引进250亿美元的外国资本兴建电站。已有9个外资项目获得批准,另外5个正由中央政府审批。这14个大电站将具有200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85%的发电设备将通过进口解决。中国到2000年还将建设1.3亿千瓦的发电厂,也需要利用外资。

改善投资环境的第二个方面是改善软环境。这方面的首要措施是加强宏观调控,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今年7月以前由于放松了金融管理,银行盲目贷款,支持了不健康的股票热、房地产热和开发区热,导致通货膨胀和外汇调剂价的大波动。这种局面加大了来华投

资外商的外汇风险,对引进外资是不利的。7月份以后政府从整顿金融财税秩序入手,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现已取得积极成效。首先是固定资产超高速增长势头有所控制,其次是金融财税秩序好转,乱拆借,乱集资,乱设金融机构等混乱现象得到制止。居民储蓄存款逐月回升;第三是生产资料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开发区秩序好转。生产资料供应由紧转松,价格回落。各地已撤并一些不合要求的开发区。外汇调剂市场,美元对人民币的比价已稳定在1:8.8左右较合理的价位。在开始实施强化宏观调控时,外商担心中国经济将因金融紧缩而陷于萧条。实际上这次加强宏观调控并不是全面紧缩而是局部调整。所以第三季度经济继续稳定增长,足以消除人们的疑虑。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有能力引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增长。这就为引进外资创造了最好的宏观环境。

在改善软环境的第二方面是狠抓反腐败斗争,为外商创造一个公正廉明、可以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

为了更多地引进外资,有关部门还决定进一步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扩大地方政府批准外资的权限和进出口决定权。政府将根据产业政策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高技术产业。政府还将鼓励外资投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在服务业中,银行、商业和房地产业也将逐步向外国投资者开放。在吸引外资的形式方面中国将采用一种新的被称为BOT的做法,即让外国投资者直接建设一个项目,由外国投资者负责经营管理,15年后转给中方。在外商管理期间中方只收税款。BOT方式将被应用于基础设施项目如从浙江温州到金华的铁路以及在湖北省的港口。为了克服沿海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预期中国将把内地的自然资源向外商开放。外国公司将可以参与云南、贵州、广西以及新疆塔里木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发。

在引进外资方面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对外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即把外资企业同国内企业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在税收、销售、运输、采购和营运等方面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

为改善投资环境所采取的上述种种措施将不仅使美国公司在中国获得更适宜的生存空间,而且将使美国公司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

由于中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投资环境将渐臻理想,中国的市场将日趋繁荣,同中国做生意,来中国投资将使美国商人和投资家得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的好处,因此中美经贸关系不管还要经历什么风险,它的前景将是光明的。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既然能给中美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志在振兴美国经济的克林顿政府无疑应当摆脱偏见,扫除一切障碍,做出正确决策,把中美经贸关系引向健康和稳定的发展道路。我们对此寄予希望。

注释:

- (1) 莱斯特·瑟罗:《二十一世纪的角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10月版,92页。
 (2)(3)(4) 同上,第91页;第66页;第67页。

1992年香港进口、出口、转口的地区构成

	进口	
	金额(百万港元)	比重
中国	354348	37.1
日本	166191	17.4
台湾	87019	9.1
美国	70594	7.4

南韩	44155	4.6
新加坡	39087	4.1
西德	21911	2.3
英国	19221	2.0
意大利	14825	1.6
马来西亚	12825	1.3
其他国家	125118	13.1
总额	955295	100.0

	出口	
	金额 (百万港元)	比重
美国	64600	27.6
中国	61959	26.5
西德	15956	6.8
英国	12541	5.4
日本	10997	4.7
新加坡	10360	4.4
台湾	6500	2.8
加拿大	5018	2.1
荷兰	4878	2.1
法国	3164	1.4
其他国家	38151	16.3
总额	234123	100.0

	转口	
	金额 (百万港元)	比重
中国	212105	30.7
美国	148500	21.5
日本	37465	5.4
西德	33103	4.8
台湾	26156	3.8
英国	20591	3.0
新加坡	13866	2.0
南韩	13588	2.0
加拿大	11101	1.6
法国	11039	1.6
其他国家	163315	23.6
总额	690829	100.0

资料来源：《香港经济年鉴》。

《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美国人眼中的“大中华”

王缉思、朱文莉

作者单位：王缉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朱文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大中华的出现——不论其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联合体——对美国形成了经济和安全上的挑战。当欧洲共同体向一体化迈进时，美国经济利益有被排斥在外的危险。为了防止在亚洲出现一种类似的前景，我们必须在一体化进一步发展之前，加深和扩大与香港、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¹⁾

美国参议员麦康奈尔的这段话，代表了近两三年来美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对“大中华”（Greater China，直译为“更大的中国”）的看法。他这几句话，包含着三层意思。第一，美国人对他们所称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组成的“大中华”将向何处发展，既感到十分关心，又感到难以预测。第二，“大中华”对美国利益的挑战主要是经济上的，但也不排除安全因素。第三，美国必须从全球战略的高度作出政策调整，加强同这三个地区的关系。本文拟就目前所掌握的有限资料，对以上三点做一些介绍和分析。其中个别资料尚未公开发表，恕暂不注明出处。

一、“大中华”的含义

8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商业周刊》等个别西方报刊开始用“大中华”一词来表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间扩大的经济联系和政治统一的前景。⁽²⁾据笔者看到的资料，美国人最早公开讨论“大中华”概念，是在1990年3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讨论美国与香港关系的会议上。该会议的总结报告提到：“‘大中华’是今日世界经济中最有意义的长期经济趋势。美国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一变化及其含义。”⁽³⁾当时台湾当局刚刚放松对两岸交流的限制，两岸三地的经济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美国学术界和企业界即开始高度重视这一现象。

此后，随着两岸三地经济交往的迅速发展，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讨论在美国逐步升温，并在近两年形成了一个高潮。首先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对华商业论坛这两个机构1992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对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边经济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体化前景，以及美国与这一区域的经济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并发表了题为《美国与大中华的经济关系——90年代的挑战》的报告。5月，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商业评论》推出以“大中华——朋友还是敌人”为主题的专号。10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也发表报告，论述“大中华的出现及其对美国的意义”，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两岸三地经济合作在安全、政治等方面对美国的影响。1993年1月，《中国季刊》在香港就“大中华”问题举办学术讨论会，一些有影响的美国学者与会，会议论文正在编成专辑。2月，加州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又就“大中华”现象召开专题研讨会。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大中华”几乎成了他们讨论美中关系以至亚太问题时必然谈及的话题。迄今尚未看到美国政府的正式文件使用这一名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谈到此现象时，是这样表述的：

“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更大的中国社会 (greater Chinese communities) 已成为最有希望的投资和贸易地区之一。”〔4〕

为说明 80 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之间的经济融合,美国人曾提出多种概念,包括“中华经济集团”(Chinese Economic Conglomerate〔5〕)、“中华圈”(The China Circle〔6〕)和“中华三角”(The China Triangle〔7〕)。也有人从斯卡拉皮诺提出的“自然经济区”概念,引申出“中国东南自然经济区”(The Southeast China 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y〔8〕)。但使用最为普遍的提法还是“大中华”。

美国人按照各自的理解,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大中华”一词,说明不同范围内的现象。概括起来,美国人所说的“大中华”大致有以下几层含义:

1. 经济领域中的“大中华”。其中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最为宽泛的定义认为,“必须承认作为大中华一部分的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在海外和流亡中的华人的重要性。”〔9〕狭义的“大中华”指的是华南地区、香港和台湾,有人甚至把“大中华”在大陆涉及的范围仅限于广东、福建两省,理由是据称只有广东与香港、福建与台湾实现了经济上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10〕

但是,多数美国学者不使用过宽或过窄的界定。他们指出,除了广东、福建两省外,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如长江流域、上海和其他沿海省区,也同港台两地建立了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成为兴旺发达的“大中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专攻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尤赫礼更尖锐地指出,不适当地使用“大中华”概念将带来不良政治影响。他说,把“大中华”限定于中国东南部只能导致误解,而且具有不必要的危险含义;此外,如果把中国的一部分割裂出来称为“大中华”,又何谓之“大”?〔11〕

实际上,一般美国人所提到的“大中华”,内涵是整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特别是三者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他们认为,80年代末以来,两岸三地的经济真正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有人统计,1987-1991年间,三边贸易总额增长了1.55倍,其中大陆与台湾的贸易增长幅度最大,为2.67倍。到1991年,三边贸易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各自的贸易总额中已分别占到42.3%、40.1%和14.5%。〔12〕到1991年为止,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累计已达250亿美元;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在5年内增加了14倍,累计达到39亿美元。港台两地的投资额占到大陆1991年吸收外资的一半以上;与此相对应,到同年为止,大陆对香港投资额累计达到150亿美元,〔13〕成为香港最大的投资者,远远超过美国的70亿美元。〔14〕台湾人在大陆已拥有3000多家企业,〔15〕而香港已有80%的企业将部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大陆,〔16〕仅在广东一省就拥有2500家,雇员达300万人。〔17〕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经济被生产、贸易、投资这三条线紧紧地穿在一起,结合成一股巨大的经济力量。美国《中国商业评论》主编鲍丁格预言:“中国、香港和台湾之间的经济联系正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增长,可望最终将这三个社会组织成单一的经济实体。”〔18〕

2. 地缘政治中的“大中华”。在一些美国人眼里,“大中华”的含义不仅限于经济方面。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部的一份报告提到这样一种观点:“被许多人称为‘大中华’的这个迅速发展的经济区域将在经济上日益融合,而经济一体化将冲破屏障,激发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向更广泛政治合作和最终重新统一前进。”〔19〕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大中华”的概念预示着中国的统一,预示着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分裂后,中国将再次恢复它完整的版图。人们将因此联想起历史上中国强大时曾经统治过的辽阔疆域。尤赫礼在专门论述“大中华”概念的论文中出示了1944年美国军方绘制的一份标明Greater China的地图,说明这一概念在美国也有其历史渊源。他认为,在国名前冠以“大”字,有时“隐含有霸权主义的意味”。尽管他指出中国在历史上从未使用武力向南洋扩张,还是提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大中华”的出现,使中国在扩大在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海地区的影响上占有优势。〔20〕

3. 全球文明中的“大中华”。有的美国学者提到“大中华”等概念所暗含的文化认

同或优越感：“它暗示着一笔同文同种的悠久遗产”和“在中国人和海外华人中不断增长的共同自我意识”，包含着对精神和文化统一的渴望和期盼。(21) 这种含义上的“大中华”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地域空间，与华裔美国学者杜维明提倡新儒学时所用的“文化中华”(Cultural China) 概念和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提出的“外中华”(External China) 概念相映衬，涉及分布在全球 130 多个国家的 3000 多万海外华人。有的美国人意识到，文化意义上的“大中华”的出现，“不是一个普通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是一个遍布若干国家、地区和城市的苏醒了民族，一种全球性部落的兴起”，而“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以华人为基础的经济的崛起……似乎更具有威胁性”。(22)

迄今为止，最为明确地给“大中华”下定义的是美国学者哈丁。他写道：“‘大中华’实际上把三个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概念归为一类。经济上，大中华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正在扩大的商业互动。文化上，它指的是全世界有华人血统的人们之间在人际、科学、智力、艺术上的接触。政治上，它指的是一种可能性，即重新建立单一的中国人国家，把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外部压力和内战所割裂的政治实体重新联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意义是相互联系的：一种普遍的文化认同提供了经济联系的催化剂，而经济相互依存可能为政治统一打下基础。”(23)

总之，“大中华”一词在美国人笔下展现了丰富的含义，涉及经济、政治、国际关系、文化等领域。它容易引起误解和各种联想，也可以带有感情色彩，具有政策含义。它基本上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提法，没有人能权威性规范它的使用范围；同时，它所描述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具有巨大意义，也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笔者不赞成这一可能造成政治误解的提法。但在引述美国人看法时，为方便起见，暂不作改动。

二、美国在“大中华”的经济利益

目前，大多数美国观察家还是把“大中华”首先看作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力图对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作出基本判断。更重要的是，从克林顿政府、美国国会到企业界、学术界，都需要研究这种趋势对美国利益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 美国同“大中华”的贸易关系。20 多年来，台湾和香港一直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显示了强大的对出口能力。近年来，香港、台湾公司纷纷到中国大陆投资设厂，它们较先进的技术和较丰富的商业经验与大陆的廉价人力物力相结合，在大陆一些沿海地区建成了许多出口加工基地。1987-1991 年间，两岸三地与美国的总贸易额增加了 44.6%，其中对美出口总额增加了 26.7%。增加幅度最大的是大陆对美出口，1991 年出口额是 1987 年的 2.07 倍。(24) 从 1989 年开始，如果把两岸三地的对美贸易额相加，该区域超过了墨西哥，成为仅次于加拿大和日本的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5)

美国人所说的中美贸易不平衡，成为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而一些人担心“大中华”现象会加剧美国的贸易逆差。他们担忧的是，两岸三地间的经济依存逐步发展后，从外国进口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此外，人们对台湾过去那种外向型的、“新重商主义”的经济战略记忆犹新，担心中国大陆的发展战略“步其后尘”，逐渐形成一个带排他性质的贸易集团。有人问道：“这个集团会不会限制他国进入自己的市场，同时成为美国在世界上又一个更为强劲的对手？”(26) 还有的美国人预言，台湾和香港在大陆的经济参与“终将对美国构成新的挑战，因为它使中国向我国出口廉价轻工业品的能力加速增长，从而扩大业已造成麻烦的贸易赤字”。

但是，一些学者主张更深入地分析美国与这一地区的贸易统计数字。哈丁谈到：“纯粹的双边统计有可能掩盖现代贸易关系的实质。我们必须学会更全面地看待我们同大中华的贸易格局，而不能只局限于我们同每个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平衡。”(27) 一方面，按美方统计，

近年来美国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剧增（按中方统计，中美双边贸易基本平衡，中方略有顺差）；另一方面，美国与香港、台湾之间长期存在的高额贸易逆差在 1987-1991 年期间却分别下降了 82% 和 48%。如果把两岸三地的对美贸易额相加，美国同这一地区的贸易逆差在这几年内减少了将近 60%。（28）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港台两地在大陆投资设厂，将海外进口的产品进行加工装配，再转口到美国。对于这部分商品，美国按产地原则将其算为中国大陆对美出口，而中方统计中将其列入大陆对港台的出口。结果正如哈丁所指出的，当港台将其部分产业转移到大陆时，也随之将它们对美出口的部分贸易盈余——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包袱——转移到大陆。（29）

许多美国人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大中华”看成仅仅是美国的贸易对手；更重要的是，它也向美国提供了走出经济衰退所需的巨大市场。1987-1991 年期间，美国对“大中华”的出口增加了 90.97%，该地区占美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6.1% 增加到 7.0%。（30）有人主张，“纠正我们（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办法是为中国市场生产更多的产品。”（31）还有人说，美国应当“在这一今日世界发展最迅速的经济实体中为自己创造一个活动空间”。（32）一些美国人要求从更大的角度，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大中华”为美国提供的机遇：“大中华是美国发展其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的巨大跳板。美国工商业可以与遍及全亚洲的华人网络联系起来，从而实现繁荣。”（33）

2. 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大中华”。过去，美国在中国大陆的投资障碍重重，其中既有政治干扰的因素，也受两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商业习惯、文化传统方面巨大差异的影响。两岸三地的经济融合，给这两个方面都带来了变化。首先，当中美政治关系在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上出现紧张时，美国和港台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有某种默契或配合，共同向美国政界施加影响。1989 年天安门事件后，美国在华投资所受影响不大，近两年甚至迅速增加，与港台公司踊跃在大陆投资时所表现出的信心有关。其次，港台在大陆投资时遇到的许多法律、体制、基础设施等结构性问题，也是美国投资者遇到的问题，因此前者的成功，也给后者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同港台企业合作，利用它们与大陆的文化共性搞共同设计、生产和市场开发，是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一条捷径。（34）

3. 美国的技术出口控制与“大中华”。两岸三地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使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政策处于两难境地。目前，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技术出口政策与它对港台的政策差距很大。香港保证遵守巴黎统筹委员会向社会主义国家技术出口的限制，同时在进口技术时，享受与巴统成员一样的待遇，即进口军民两用时无需特别的许可证。对于台湾，巴统正在考虑让它享有和香港同样的地位。但是，巴统仍然对中国大陆采取高技术出口方面的歧视政策，这就意味着作为巴统主要成员的美国，其向香港或台湾出售的技术中，有一部分不准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大陆。此外，美国政府独自采取的对华经济制裁，使美国与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技术贸易关系更加复杂。

在“大中华”背景下，美国有人开始怀疑在技术出口方面的区别对待政策能否继续有效地执行。他们看到，随着 1997 年的迫近，中国对香港的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于是担心中国绕过香港的出口控制法规，取得不能从西方直接进口的先进技术（例如可用于导弹制导系统的技术），然后将其输出到其他地区，造成美国极力避免的军事技术扩散，从而危及美国安全。因此，继续对香港实行宽松的技术出口政策存在危险。（35）而美国一些商界人士则明确反对限制香港的技术进口。他们说，美国许多高技术公司把香港作为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销售中心，甚至在香港设了加工点，如改变对香港技术出口政策，将极大地损害美国公司的竞争力。（36）尽管这两种意见相左，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美国官方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尽快调整政策。

4. 知识产权问题。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比较乐观，认为台湾海峡两岸经济交流的扩大，有助于美国解决与两岸长期存在的知识产权争议。理由之一是，两岸经济联系加强

之际,正值台湾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台湾企业界纷纷将低技术产业转移到大陆,自己则致力于发展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于是大陆与台湾之间也出现了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台湾企业从长期的知识产权争议中的被告地位转变为原告地位。美国人认为,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台湾企业对知识产权的尊重,而且使它们“成为另外一支督促北京保护知识产权的力量”。理由之二是,由于两岸三地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一旦中美贸易关系因知识产权摩擦受到损害,港台企业亦将承受重大损失。因此,他们必然利用同大陆各界的关系进行游说。其促进中国知识产权政策进一步完善的努力,肯定要比美国人的压力收效大得多。理由之三是,大陆和台湾在吸收美国资金时相互竞争,都不愿因知识产权缺乏保护而使美国投资者却步,这将加快他们争相改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步伐。(37) 1992年,中美两国政府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更加鼓舞了上述乐观情绪。

5. 美国的环境政策与“大中华”。环境保护问题在世界是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也成为中美两国进行合作的新领域。美国人认为,“大中华”的出现对环境问题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两岸三地的沟通正在为环保问题上的合作扫除障碍。美国人注意到,香港与中国南方各省的环境保护官员已经进行了几次会谈,讨论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这也许标志着双方认识到需要为保护香港与华南地区共享的环境采取行动。”(38) 随着台湾海峡两岸交流的扩大,环境保护也将列入两岸合作的议程。但另一方面,由于两岸三地在环保措施方面的差异,大陆某些地区的环境污染在进一步加剧。港台的某些企业,为了避免因本地日益严格的环保政策所造成的生产成本上升,把一些高污染工业转移到大陆。据香港有关部门统计,香港已有40%以上的塑料工业转移到了华南地区。(39) 台湾的一批化学工业基地也在向福建等地转移。美国人对此感到关注。

应当指出,美国对这些环境问题的关心,既有保护全球生态的考虑,也包含着利己的商业动机。美国人希望他们新兴的环保工业能够在“大中华”地区投资治理环境的过程中获益,使这一“未来产业”带动美国经济的复苏。实际上,美国公司已经在香港环保技术市场上占有20%的份额。1991年,美国向中国大陆出口了价值4000万美元的环境污染控制技术。但美国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在这一领域面临着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公司的激烈竞争,而美国政府迟迟不取消对华经济制裁,给美国公司造成了竞争劣势。美国人希望,香港与内地在环保问题上加强合作,中国政府增加在环保方面的投资。这样,“那些正在参与香港环保项目的美国公司,可以同时在中国的环保市场上发展壮大。”(40)

综上所述,美国人在各个经济领域都感受到“大中华”现象所带来的新动力和新冲击。一份政策报告指出:“事态发展要比我们大多数人预期的要快。美国公司必须赶上这些发展,必须从战略角度考虑它们自己同大中华三方的关系。”事实上,不仅美国公司在据此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美国官方为了维护其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利益,也正在宏观上对美国人眼中的“大中华”作出反应。

三、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大中华”和对华政策调整

美国学者哈丁曾在1992年2月写道:“大中华的崛起,给美国对这三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人社会的政策都带来了新的复杂情况、新的挑战、新的约束和新的考虑。在某些领域里,我们需要新的政策,以应付新的问题。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对现行政策作出重大的修订。在剩下的领域里,我们只须保持现状,对目前的政策稍作调整即可。”(41) 那么,哪些是“大中华”给美国政策带来的新情况、新挑战、新约束和新考虑? 在这些新问题面前,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或者将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

1. 经济方面的新问题。两岸三地的经济融合,引起了东亚地区内部经济格局的重组,也给美国的全球贸易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人注意到,东亚各国普遍持一种看法,即“中

国的经济正在起飞，它为投资者、商人和生产者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使他们可以把中国作为向美国和欧洲出口的基地”。〔42〕一向对在华投资持较为谨慎态度的日本和新加坡，近年来转而采取积极态度。东亚国家在香港、台湾的带动下，纷纷将制鞋、纺织、体育用品、电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中国大陆。伴随投资的增长，原材料需求的增加，中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联系也在迅速扩大。

对于美国来说，主要问题不在于中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因为在这些传统工业领域，美国本来就缺乏竞争优势。美国人更担心的，第一是中国大陆和港台是否会发展成一个内向的经济集团，限制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出口，这一点上文已经提及。第二是“大中华”会不会促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带有排他性的东亚经济集团，与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从而造成对全球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巨大冲击。美国的《商业周刊》最近评论说：“不论是凶是吉，中国正将东亚的一大片拉进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轨道。这是造成亚洲内部贸易和投资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同美欧联系的一个原因。中国新竞赛的胜利者将是骑在中国龙背上的亚洲公司。那些骑不上去的，就会被踩扁。”

〔43〕这反映了美国商界对亚洲内部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的一种忧虑。

但是，美国人基本上还是把“大中华”作为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机遇来看待，而不是把它仅仅看成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或有可能向美国封闭的市场。正如哈丁所说，港台和大陆之间经济障碍的减少，将创造一个统一的大市场，进一步吸引美国投资，从美国进口更多的产品，同时增加储蓄，向外投资。两岸三地的经济一体化不大可能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增长为代价，而是给外部世界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44〕

2. 战略平衡方面的新考虑。面对中国实力的增长，有的美国人已经描绘出这种“最可怕的前景”：“随着经济资源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将试图在亚洲称霸，从而成为近期内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首要战略威胁。”〔45〕在美国人眼里，如果“大中华”在不久的将来发展为政治上统一的中国，那么中国的综合国力更会大大增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对外贸易总额接近日本，军事实力称雄于亚太地区。这样一个中国会对全球战略平衡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美国的决策机构主要思想库并不认为台湾海峡两岸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产生一个“统一的政治意志”。以和平方式实现的两岸统一，至多是一个松散的邦联。〔46〕因此，“大中华”不对美国构成现实的战略威胁，是美国人容易达成的基本共识。

美国有关“大中华”的战略平衡考虑，主要涉及日本。冷战结束后，一部分美国人主张将美国在亚太的外交重心放在日本，甚至说中国可能成为阻碍美日合作的绊脚石。〔47〕但是，美日双方政治和战略利益的分歧，随着经济摩擦的加剧而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于日本在亚洲的未来作用感到担心。有人把日本在中国的经济渗入，看成美日竞争中的一个不利因素。他们指出，美国与“大中华”的贸易逆差，同日本的贸易顺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对华政策对美中贸易的消极作用，同日本政府对本国企业对华出口的支持，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长此以往，日本投资就能够把“大中华”变成更具威胁性的对美出口基地，日本就可能成为亚洲的经济霸主。有人甚至提到“中日经济合作导致两国间密切的政治军事关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大中华”作为一个经济大三角，韩国与中国北方正在形成的经济合作区，都能对日本的经济扩张和政治影响形成牵制。〔48〕无论怎么看，两岸三地间的经济政治互动都会对美日关系和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3. 对美国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新挑战。那些把推进“民主和人权”当作外交政策目标的美国人，把“大中华”现象看成向中国施加政治影响的一个机会。他们预言，两岸三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发展，将有利于西方意识形态向中国渗透，“逐渐为在中国大陆出现更加多元化、其管理者更具人情味的社会创造条件。”〔49〕

但是，美国人也注意到，台湾和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固然有助于引进市场机制和西方

观念,但“大中华”现象促进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以及海外华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这对于美国的政治利益又是一种挑战。有的学者认为,在历史上,文化价值观是从中国大陆向外辐射;而在当代中国大陆,儒家文化曾一度遭到批判,港台和海外华人近年来“从外向内”传播着儒家观念,这种传播同“大中华”的经济成就所引发的自信相结合,造成“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其意义是深远的。(50)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向何处去,同西方文明的关系如何,对未来世界发展有重大影响。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一篇引起很大争议的政论文《文明的冲突》里预言,各种文明间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全球冲突形式。他特别提到,儒教和伊斯兰教的联系,对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提出了挑战。(51)此外,有的美国人怀疑,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未来发展道路,将不是经济自由化带来西方式的政治民主自由,而是崇尚权威和高效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发展模式,这也会对西方价值观构成挑战。

4. 对华政策调整。很明显,以上几方面的新因素,都将促使美国对华政策作出调整。这种调整带有长远的战略意义。首先,美国对华政策中安全考虑、意识形态考虑、经济考虑之间孰轻孰重的优先顺序将发生变化。冷战时期,联手抗衡苏联扩张的安全考虑,是70年代至80年代中美关系的主要基础。随着冷战的终结,“中国抗衡苏联霸权的价值下降,接着消失了。”在许多美国人眼里,中国“由地缘政治中的伙伴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人权因素一度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诸因素中占据了最显要的位置,出现了“以经济政策作为服务于道德和政治目的的工具的倾向”。(52)近两三年内,美国人眼中的“大中华”现象越来越突出,对于美国对华关系中应以“人权外交”为主轴的主张,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一份政策报告提到,“对于中国贸易行为的抱怨第一次排在了国会议程的前列。”美国人所称的巨大对华贸易逆差,港台经济与中国大陆经济的结合,迫使汲汲于“民主与人权”问题的美国议员和政府官员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

克林顿政府把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放在其内外政策的首位,克林顿本人多次强调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密不可分。(53)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人眼中“大中华”的崛起和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正在改变美国政治家处理对华关系的思路。如果说中美经济关系即将压倒安全问题(包括军售、核扩散等)和人权问题,成为双边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也许尚为时过早。但是经济问题在美国对华关系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则是确定无疑的。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993年初发表的对华政策报告中,将“亚洲内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存及其经济的不断增长”和“迅速成长的美中贸易和投资关系”排在“美中合作新的重大基础”的前两位,并指出,“1989年以来冷战后世界秩序的出现决没有消除美中建设性关系的合理性;它只是使这一合理性变得更复杂了。美国必须更多地将重点放在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上,放在为维护亚洲稳定而共同努力的需要上,放在为寻求合作解决跨国界问题而扩大中国的参与上。”(54)

其次,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机制,将因两岸三地经济互动的发展而日趋复杂。更多的美国利益集团,特别是在台湾和香港有既得利益的企业和组织,企图对美国对华政策施加影响;台湾当局和港英当局,由于台、港两地在大陆的经济利益日益增加,也对中美关系的状况十分关心,不希望中美关系恶化损害自身利益。这对美国政府在考虑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进行制裁时,客观上形成了一定的牵制。

一份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撰写的研究报告指出:“由于中华三角经济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美国不可能对中国出口实行广泛的制裁而不严重影响台湾和香港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55)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康纳布尔和会长兰普顿也说:“香港和台湾把中国(大陆)作为向美国输出产品的生产基地。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若实行经济制裁(例如取消对华最惠国待遇或对之附加条件),企图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将无意中给台湾和香港造成损失。美国不应该制造给朋友和对手造成同样打击的经济集束炸

弹。”〔56〕针对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美国商界有人抨击道：“巴统不是为控制中国在人权或武器销售问题上的行为而设的。当美国认为中国在人权或武器销售问题上的行为不能接受时，（限制技术出口）是美国准备使用的唯一手段，这对美国商界来说是一大不幸。美国商界认为自己因（美中两国）根本的政策分歧而受到伤害。”〔57〕从近年来的实际情况看，美国工商界（包括在港台的美商常设商务机构）和香港、台湾的工商界，在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技术出口控制等一系列关系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基本倾向是反对在经济上制裁中国，反对将人权、军售等问题同商业问题挂起钩来。

第三，美国政府将更积极地“支持”和“参与”两岸三地的经济融合，同时企图以此为契机和手段，对中国施加政治影响。大西洋理事会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对华政策报告建议：“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之间开放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减少各方之间发生失控的冲突的可能性，促进这三个地区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并促进所需要的政治变化。”

〔58〕还有的政策报告主张：“美国人应该鼓励这些地区之间在经济和文化上尽可能密切地合作。”〔59〕“美国需要一项积极参与大中华的政策，它应当包括下列要点：充满活力的接触，多样化，多边化，以及承认相互依存。”〔60〕

在“积极参与”两岸三地之间经济合作的同时，美国能取得什么政治上的好处呢？从美国所鼓吹的“世界新秩序”的角度看，美国人希望“大中华”能受到他们所制订的竞赛规则的约束。正如美国学者鲍大可所说，美国政策是要“帮助”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更完全地同世界经济实现一体化，使它们服从国际公认的准则所包含的纪律和约束”。〔61〕从两岸三地之间政治关系的角度看，美国人以为经济利益能限制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和香港政策上的活动余地，希望“北京不再以为美台关系的发展将给自己带来损失，台北也不再认定中美关系的进展会妨碍自己的利益”，于是，“大中华使中美关系史上最具争议的（台湾）问题失去了爆炸性”。〔62〕从中国内部政治发展的角度看，美国人希望维护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化进程”，促使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导致政治自由化”，即发生和平演变。〔63〕

值得警惕的是，有的美国人提出，如果中国不在人权等方面对美国作出让步，美国就应当“鼓励”华南一些地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进一步向港台靠拢，脱离中央控制。1991年底《纽约时报》的一篇署名文章，就公开透露了上述想法。联想到某些美国人鼓吹支持“台独”，支持香港现任总督的“政治改革方案”，支持“西藏独立”，制造“中国威胁论”，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人是否蓄意要采取敌视中国、分裂中国的政策。

以鼓励中国政治分裂来要挟中国政府的提议，一开始就遭到了美国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他们指出：“这一战略将是严重的错误。威胁要任何肢解一个国家，都是一种敌对行为。当美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集中注意力于国内事务时，经不起同中国处在一种对抗关系中。此外，威胁要造成中国实体上的分解，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基本问题，从而可能使大部分中国市民对美国尚存的好感丧失殆尽。”〔64〕同时，分裂中国的政策“将遭到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反对，使美国孤立和无所作为。”〔65〕他们还认识到，即使从美国在华经济利益的方面考虑，一个稳定的、有强有力的中央控制的中国也对美国更为有利：“美国人要发展同中国各地区和地方的广泛联系，这是很重要的。仅仅同中央部门打交道是越来越不够了。但是，我们不想犯这种错误，即认为同一个权力非常分散的中国很容易打交道，或者这样一个中国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的。许多引起美国人忧虑的非正规和非法的贸易做法，说明中央控制力不够，而不是中央权威太多。”〔66〕

四、结 论

近两年来，美国学者对“大中华”的研究和讨论形成了一个高潮，并且引起了美国政界和工商界的充分重视。从概念上说，美国人所说的“大中华”虽然有多种含义，但最常见的

用法是指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 ㄍㄌ木罽靡惶寤畝 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在“大中华”有越来越重要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两岸三地的经济合作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机会；另一方面，美国人也担心这种发展形成对美国的经济竞争。由于当今世界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大中华”将向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开放，还是自成一体，或成为可能出现的东亚经济集团的一部分，对美国长远利益关系很大。许多工商界人士和学者主张，为趋利避害，美国应当积极参与这一区域的经济的发展。

由于美国对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态度各不相同，而两岸三地的经济融合又是一个难以阻挡的趋势，美国必须对现行对华政策的许多方面作出调整。在对华最惠国待遇、技术出口、削减贸易逆差等方面，美国更难以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但是，少数美国人提出削弱中国政府领导以至鼓励分离倾向的主张，这不仅将损害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是对亚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威胁。我们应当加强对于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的研究，调动积极因素，抵制消极倾向，以利于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顺利发展。

注释：

(1) Senator Mitch McConnell, "Hong Kong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a speech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n June 4, 1992, *The Heritage Lectures*, No.385, p.3.

(2) Harry Harding,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Themes, Variations, and Reservations," final draft for publication in *The China Quarterly*, p.5.

(3) Kerry Dumbaugh and Michael Ip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ong Kong's Future: Promoting Stability and Growth*,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Policy Series, No.3, June 1990, p.16.

(4) "Winston Lord Lays Out 10 Goals for U.S. Policy in East Asia,"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s East Asia/Pacific Subcommittee, March 31, 1993. *Foreign Policy Backgrounder*, FB-1838, distributed by U.S. Embassy in Beijing, April 1, 1993, p.7.

(5) David M. Lampton, et al.,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China Policy Series, No.5, October 1992, p.1.

(6) "The China Circle: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Evolving Relations Among the PRC, Taiwan, and Hong Kong-Macao," a research proposal by the Institute on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GCC),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ay 1993.

(7) Stephen Uhalley, Jr., "The China Triangle... Plus," draft paper, October 1993.

(8) Stephen Uhalley, Jr., "'Greater China': What's in a Name", draft paper, February 1993, p.21.

(9) David Shambaugh, "Forward by the Editor," *The China Quarterly*, No.128 (December 1991), p.689.

(10) Thomas W. Robinson and Madelyn C. Ross, "Preface," in Robinson and Ross, eds., *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Greater China: Challenges for the 1990s* (Report of a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China Business Forum), February 1992, Washington D.C., p.III.

(11) Uhalley, "'Greater China'", op. cit., pp.17-21.

(12)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8—1992)，据其中“统计对外贸易”部分之“中国进出口分国家、地区总值表”和“世界经济贸易资料”部分之“世界部分国家(地区)贸易额”计算得出。

(13) Kenneth Lieberthal, "Hong Kong Scenarios,"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19, No.5

(September-October 1992), p.46.

(14) Donald M. Anderson, "The US Role in Hong Kong's Future,"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 19, No.3 (May-June 1992), p.11.

(15) Robert G. Sutter, "Taiwan-Mainland China Relations --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92-658 S, distributed b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ugust 6, 1992, p.9.

(16) The Atlantic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policy paper), February 1993, p.14.

(17) Pamela Baldinger, "The Birth of Greater China,"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 19, No.3 (May-June 1992), pp.14-17.

(18) Anderson, op. cit., p.11.

(19) Sutter, op. cit., p.13.

(20) Uhalley, "'Greater China'," pp.2,3,10.

(21) Uhalley, "'Greater China'," pp.4-6, 9.

(22) “华人的世纪”，《华盛顿邮报》1992年11月22日。转引自范士明：《“大中华经济圈”现象与中美关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1993年5月，17页。

(23) Harding, "The Concept of 'Greater China'," pp.32-33.

(24)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8—1992），据其中“统计对外贸易”部分之“中国进出口分国家、地区总值表”和“地方经贸”部分之“台湾对外经济贸易”、“香港对外经济贸易”计算得出。

(25) Barber B. Conable, Jr. and David M. Lampton, "China: The Coming 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71, No.5 (Winter 1992/1993), p.145.

(26) Harry Harding, "The US and Greater China,"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19, No.3 (May-June 1992), p.18.

(27) Harding, "The US and Greater China," p.22.

(28) Jan Prybila, "How Should Future American-Chinese Economic Relations Be Managed," *New Ideas and Concept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 Conference report edited by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ovember 1992, p.108.

(29) Harding, "The US and Greater China." p.20.

(30)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8—1992），据其中“统计对外贸易”部分之“中国进出口分国家、地区总值表”和“世界经济贸易资料”部分之“世界部分国家（地区）贸易额”计算得出。

(31) 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17.

(32) Conable and Lampton, op. cit., p.145.

(33) 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17.

(34) 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21.

(35) Erik C. Wemple, "An Export Controls Clash,"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19, No.3 (May-June 1992), p.30.

(36) Dumbaugh and Ipson, op. cit., p.17.

(37) 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p.17-18.

(38) Henry S. Richmond, "Saving Hong Kong's Environment," *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 Vol.19, No.5 (September-October 1992), p.43.

(39) 《香港进出口贸易年鉴》，1992年，第20页。

(40) Richmond, op. cit., pp.38, 42-43.

- (41) Harry Harding,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Greater China*, p.39.
- (42) *The United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p.39.
- (43) "The Spark Plug of Asia's Future," *Business Week*, May 17, 1993, p.29.
- (44) Harry Harding, "Taiwan and Greater China," Draft Paper, September 27, 1993, pp.38-39.
- (45) Harry Harding, "Setting a New Benchmark for U.S.-China Relations," Statement presented 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7, 1993, p.2.
- (46) Harding, "Taiwan and Greater China," p.41.
- (47) The Asia Society, *U.S.-Japan Policy Dialogue on China: Economic Issues*, Report on Policies towar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cember 18-19, 1991, p.30.
- (48) "The China Circle," a research proposal by IGCC, p.3.
- (49) Conable and Lampton, op. cit., p.145.
- (50) Uhalley, "'Greater China'," pp.4, 10, 12.
- (5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3 (Summer 1993), pp.22-49.
- (52) Thomas W. Robinson, "Clinton and China: Confrontation or Compromise," *New Ideas and Concept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p.68.
- (53) Bill Clinton, "A Strategy for Foreign Policy: Assistance to Russia," April 1, 1992,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Vol. LVIII, No.14 (May 1992), p.422.
- (54)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p.xxiii, p.6.
- (55) 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21.
- (56) Conable and Lampton, op. cit., p.148.
- (57) Wendy Frieman, "Export Control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Greater China*, pp.55-57.
- (58)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ations at a Crossroads*, p.xix.
- (59) 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22.
- (60) Conalbe and Lampton, op. cit., p.147.
- (61) A. Doadk Barnett, "China/Hong Kong/Taiwa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Greater China*, p.28.
- (62) Anderson, op. cit., p.11.
- (63) Robert Scalapino and Lewis Coleman, *America's Role in Asia: Interests and Politics*, Report of a Working Group convened by The Asia Foundation's Center for Asian Pacific Affairs, 1993, p.24.
- (64) Harding, "The US and Greater China," p.20.
- (65) Scalapino and Coleman, op. cit., pp.51-52.
- (66) Lampton, *The Emergence of Greater China*, p.21.

《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反英雄与亚文化

——美国战后避世时代作家与王朔比较研究

朱世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中国80年代出现了一个王朔。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他独领风骚，出了四卷本的《王朔文集》，在中国文学界引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评说。不管是褒还是贬，是臧与否，王朔作为一种现象，是值得作理论上深入的研究，并由此而得出实事求是的、符合实际的结论的。我读到了雪莉儿·吴顿（Sheryl WuDunn）发表在《纽约时报图书评论》上的文章。她把王朔比喻作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1〕她作为外国人，敏锐地发现了王朔与凯鲁亚克的共同之处。我觉得，王朔毕竟不是凯鲁亚克，他们有许多共通的地方，但也有不少歧异之处；对王朔与战后出现在美国文坛上的塞林格（Jerome D. Salinger）以及“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作家（按马库斯·坎利夫的意见，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可统称他们为战后50年代，即避世时代〔the Beat Decade〕的作家）作一比较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中的王朔现象是极有裨益的。

—

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文学，我们会发现在美国文坛上出现塞林格以及以杰克·凯鲁亚克、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格雷戈里·科索（Gregory Corso）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又称“鄙德派”〔Beatnik〕）的作家，在对人生与文学的态度上、文风上、观念上和对人物的处理上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都是一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了它无与伦比的军事与工业力量。战后，全国上下洋溢着一种满足与自豪的情绪。《幸福》杂志在1946年的一期中说：“这是一个梦幻的年代。伟大的美国繁荣的时代来临了。”战后的美国经济发展迅速。从1945年到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增长一倍。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经济发展更为迅猛，据1970年统计资料，美国人口占世界6%，却生产与消费2/3的世界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激发起来的军事工业，由于冷战与朝鲜战争，得以继续增长，同时推动了与军事工业有关的化学工业、电子工业与航空工业的兴起。世界其他工业大国，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苏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大伤元气，美国在国际贸易中实际上享有完全垄断的地位。新型机械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从1945年到1955年增长了35%〔2〕。

在这一片繁荣之中，在美国社会心理中出现了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在50年代，政府向公众声言他们无需再惧怕另一次大萧条时期的来临。当时主要的经济学家也认为，由于有新政时期创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美国经济已不可能再出现戏剧性的萧条。他们认为，美国持久的繁荣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这种对永远不会枯竭的繁荣的期望成为19

45年之后20年间社会思潮的主流。

为了使这种繁荣持续下去,经济学家鼓吹20年代的销售理论,即将公众消费的期望刺激越高,则消费便越多。这激发了公众对生活的高期望和自我实现的价值观。年轻的美国人投入进这场购物文化(shopping culture)的潮流之中。在美国婴儿出生高潮期出生的人(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人口增长达4千万),在50年代末大都进入少年期。他们每星期的收入达10至15美元,与15年前相比,增加了5至10倍。战后的年轻人对于大萧条与定量供应食品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从降生一开始就泡在“繁荣的蜜罐”里,将无忧无虑地消费视作一种与世俱来的生活方式。

这时,在美国的社会思潮中出现了以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0)为代表的“新正统”运动(neo-orthodox)。他鞭挞战后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不合时宜的自满自足与苟合”的思想。他发现诺曼·维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在《积极思维的力量》(*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1952)中所鼓吹的“自我肯定的教义与物质成功的心理”的药方是无法医治现代社会的病态的。他认为,自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美国哲学家约瑟夫·伍德·克勒奇(Joseph Wood Krutch)在1960年也认为,“认定当前时代精神是适宜的与持相反意见的人们之间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了。”对于战后美国生活方式与价值的批判始于50年代初期,不久便在知识分子、神职人员、小说家、戏剧家、诗人和艺术家中间广泛传播开来。社会科学家也攻讦这种所谓的乐观主义精神,在《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 1958)中,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警告说,“持续的经济增长不一定能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

在此,不得不提到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里斯曼在美国主要人格中发现了从他称之为“内向”(Inner-directed)向外向(other-directed)的转变。他认为,内向的人们拥有一整套由其意志坚强的父母培育的深深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些固有的价值原则——它们与传统的清教徒的虔诚、勤劳、俭朴的伦理原则十分相似,起到一种内心的陀螺仪的作用。这些内向的人们由于内心固有的价值观的镇定作用每每处于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之中。

然而,在战后的美国,由于以家长制统治为特点的公司的广泛盛行,那些能赢得朋友和影响别人的人得以发财兴旺,而对个人名利淡漠的传统价值的坚守者则落伍、式微。适应公司文化的人没有内心信念与标准的羁绊和束缚,他们并不按照内心的良心,而是依照此一时流行的价值标准行事。他们更为关注别人在信誉市场上是否喜欢他们,而不是个人的独立性。根据里斯曼的研究,这种外向性格并不仅仅存在于商界,它还广泛存在于美国的中产阶级。

在这种大的社会经济与思潮的背景下,在美国社会中产生了“垮掉的一代”。这些年轻的作家、诗人、画家和艺术家希冀自我表现,拒绝接受中产阶级的固有的观点。这些愤怒的年轻人,除凯鲁亚克、科索之外,还有加利·斯纳德(Gary Snyder)和威廉·巴罗斯(William Burroughs)。

同样,王朔是在中国特定的现实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他与凯鲁亚克等人的兴起一样,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毋庸置疑,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给现代中国带来了自1949年以来最开明的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扫除了种种僵化的思想,破除了对神的迷信,清除了林林总总的禁区、禁令。社会变得较为宽松了,出现了一个较能容忍非正统思想的宽容的文化环境。

从1979年农村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释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经济取得了重大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提高。其速度之快,进展之速,人民生活之改善,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中所罕见的。农业产值以每年5.9%的速度递增。

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到1990年,“三资”企业和个体企业、私营企业的产值比重达到工业总产值的8.6%,乡镇企业产值占30%。(3)据统计,

从1979年至1993年6月底,中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达134432家。1992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已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6%左右。个体户户数已达几千万。这种经济成份构成的演变,必将给中国社会、乃至文化境遇带来变化。

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的推进,自我的主体意识觉醒,并得到强化。人们呼吁个性发展,以个体为本位,日益繁荣的多元化经济现实为这种个性发展和个体为本位的思想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和土壤。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念演变”课题组的问卷调查,青年价值观念的演变显示出三种趋向,即:在个人需求、个人利益、个人价值得到确认并受到保护的商品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倾向,以现实利益为目标的世俗化、功利化倾向,以及随对外开放和社会变动加剧而出现的价值体系的多元化趋向。(4)由于中国正处于非常复杂而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正处于痛苦的嬗变之中,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架构一方面为产生价值体系的多元化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心理的失衡。社会行为的失范是与信仰危机互为因果的。由于人们不再相信过去虚假的、强调到极端的因而显得荒唐的信条,在一部分社会人群中出现了道德规范的空白。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由此而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经济主义、个人主义和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人们的本位价值观由对于权与官的崇拜,转向为对钱的崇拜。这种处于社会与历史转型期冲突与无序中的文化背景是产生王朔现象和王朔小说中人物的肥沃土壤。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这十多年来的改革,没有现行的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就不可能有王朔和王朔现象;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充满价值观念冲突的社会生活,也就不可能有王朔的作品。

二

综观王朔的作品和塞林格以及凯鲁亚克的艺术,人们发现他们描写的主人公大都是反英雄(anti-hero)。塞林格描写的是城市中产阶级子弟,他们生活优裕,没有衣食之忧,对于社会政治问题漠不关心。他出版于1951年的“现代经典”《麦田里的守望者》刻划了一个出身于富足的中产阶级的16岁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德,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之一。在第四次被开除出学校后,他独自在纽约城里闲逛了一天两夜,出没夜总会,与女人鬼混,酗酒。在他流浪街头与小客店之时,目睹了美国社会各种丑恶的方面,接触形形色色的人物,他认为他们中大部分都是虚伪的君子。他认为学校里的老师和父母强迫他读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他离开爱尔兰敦·希尔斯中学的最大原因就是“四周围全都是伪君子。就是那么回事。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5)

凯鲁亚克在《在路上》(*On the Road*)里,描写了另一群反英雄形象。从教养院刚释放出来的狄恩是个酒鬼的儿子。在少年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教养院里度过的。他专事偷车,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在旁人看来,他是个标新立异的疯子。小说另一反英雄形象雷米,少年时期在法国度过,继父从不管他,备受世人的欺侮与凌辱。当他一个人踉跄街头时,他诅咒命运和社会。当他在旧金山混上一个警察职务时,他从所管辖的贫民区居民中偷窃钱财,毫无廉耻之感。在作品中,作家描写了这群没有固定职业的游民,驱车游荡于纽约、旧金山、墨西哥之间,他们开飞车取乐,在公寓里疯狂玩乐,吸大麻,男女滥交;遇到身无分文时,便去偷汽油、偷烟。他们在人生中漫无目的,自己也无法回答:我在干什么?我要到哪里去?他们著名的生活信条是,“对一切都摸摸底”(I dig life),并认为“诗人、浪子和毒鬼”三位一体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因此,跑的地方越多,也就越能达到这个“境界”。(6)

而在王朔的作品中,无论是《玩儿的就是心跳》,《橡皮人》还是《顽主》中,其反英雄形象也是十分突出的。这些人大都没有工作,却大把大把地花着来路不明的钱,赌钱、玩女

人、狂饮、惹事生非。他们中许多人是在“炮局里呆过”的刑满释放的人，在开放改革的社会中寻找发财的缝隙。王朔在《橡皮人》中维妙维肖地刻划了倒腾电视机的“我”，描写了流氓商人张燕生、老邱、徐光涛在生意场上的奸诈和狠毒。他们可能是“生活的可怜虫”，也可能是“末路英雄”。正如李江云对方言说的，“你已经活得很有点豪杰的味道了，不是杀过人就是奸过人，占上哪条都够人尊敬的，都算没白活。”〔7〕

如果在凯鲁亚克小说中，这些人物被称为“避世青年”的话，那么，在王朔的小说中，就是“橡皮人”“顽主”“流氓”“痞子”。王朔给予他的人物以一种“非人的”——即橡皮人的气质。“我回头看了眼墙壁上镶的镜子，也立刻毛骨悚然。镜子里那张脸黯淡僵滞，呈现着真正橡皮的质感和光泽，我被吓的一声不响。”〔8〕这“一具毫无生气的橡皮模拟人”，踉跄街头，混迹人群当中，在各等小酒馆里喝得烂醉，用醉态来掩饰非人。正如杨金丽形容的，“你不是人！你从来就不是人，站着躺着都不是人。”〔9〕小说中的反英雄“只能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麻痹着自己”。〔10〕王蒙指出，“他的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与其朋友、哥们儿经常说谎，常有婚外的性关系，没有任何积极干社会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牵连到一些犯罪或准犯罪案件中，受到警察、派出所、街道治安组织直到单位领导的怀疑审查，并且满嘴俚语、粗话、小流氓的‘行话’直到脏话。”〔11〕

凯鲁亚克的人物与王朔的橡皮人在精神、气质上，生活态度上，价值取向上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蔑视传统和公认的习俗；都有一种深度的不安定感与浮躁；对过去漠不关心，对未来不去思索，全身心投入的人生是今天；他们都看不起循规蹈矩，以愤世嫉俗的眼光审视一切。

他们笔下的反英雄，崇尚非政治的、非道德的行为，对传统有着本能的反叛。在《麦田里的守望者》里，16岁的少年霍尔顿看透了中产阶级子女教育的本质：“不少学生都是家里极有钱的，可学校里照样全是贼。学校越贵族化，里面的贼也越多——我不开玩笑。”〔12〕他公开揶揄学校教师关于人生的说教：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说什么人生是场球赛。你得按照规则进行比赛。……”

“人生的确是场球赛，孩子。……”

球赛，屁的球赛。〔13〕

在霍尔顿的眼中，表面上道貌岸然的中产阶级都是些性变态的怪人。“我看见有个头发花白的家伙，看样子还很有身份，光穿着裤衩在干一件我说出来你决不相信的事。……他拿出整整一套妇女服装，开始穿戴起来。那是一套真正妇女服装——长统丝袜，高跟皮鞋，奶罩，搭拉着两条背带的衬裙，等等。”〔14〕他否定美国社会的理想和现实，认为学校“里面全是些伪君子。要你干的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凯迪拉克；遇到橄榄球队比赛输了的时候，你还得装出挺在乎的样子，你一天到晚干的，就是谈女人、酒和性。”〔15〕

《在路上》的反英雄们则是用流浪、放浪形骸、寻欢作乐、对人生取一种颓废的态度来表明他们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愤懑。他们到处漫游，到处偷窃。

我说，“……雷米，你老这么给咱们自己找麻烦。你为什么不能老实点儿？你干么老要这么偷人家东西？”

“这个世界欠我点儿什么，就这么回事。本性难移呀。……”

……“萨尔，咱们都是朋友，事情都是咱俩一块儿干的。这会儿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所有那些坏蛋都在想要咱们的命。所以咱们一定得随时注意，不能让任何人陷害咱们。……”〔16〕

雷米在偷窃时还拿杜鲁门总统的话“我们必须削减生活费用”来调侃他的窃行。

调侃，对人生抱一种漫不经心的、犬儒主义式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可以说是塞林格、凯

鲁亚克和王朔反英雄们的共同特点。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一下塞林格所运用的大量美国学生的俚语和凯鲁亚克刻意追求的俗语，便会发现他们愤世嫉俗的俏皮、幽默和机智。

麻烦就在这里。你永远找不到一个舒服、宁静的地方，因为这样的地方并不存在。你或许以为有这样的地方，可你到了那儿，只要一不注意，就会有人偷偷地溜进来，在你鼻子底下写上“×你”字样。（17）

王朔作品中的语言，虽然不是极有文采的，却也妙语连珠，许多是深刻地针对时弊的。由于他曾经生活在一个泛政治化的社会中，他比塞林格、凯鲁亚克更多地调侃和嘲弄正统的观念、信仰、政治和文化。“他的刚烈、正直、勇猛以及有错必纠有反必肃的严格劲儿都和母亲的迁就、温和乃至毫无原则地护犊恰成鲜明对照。他不认为儿子正是……从大是大非的立场才决定跟上他的”。（18）“他差不多开始恨自己了，恨自己的腼腆、羞涩、患得患失。这不是在万人大会上，也不是什么要人的接见室，更不是狮虎山女澡堂什么的。”（19）“有没有，我们中国人都这样儿，夸起来跟骂人也差不多——热情奔放。”“‘是的，我很羡慕。’老外说，‘也就是在中国，在我们那儿没人成天这么坐着说闲话——饿死了。’”（20）“回到家，吴胖子他们在玩牌，见到我就说：‘我媳妇回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党小组会挪到你这儿继续开。’他又指着一个大脸盘的陌生男人说，‘这是我们新发展的党员。由于你经常缺席，无故不交纳党费，我们决定暂时停止你的组织生活。’”（21）王朔在许多场合拿神圣的东西开玩笑。玩世不恭是王朔笔下反英雄们的思想根源，在他们心目中没有神圣的东西。这种犬儒主义是对过去泛政治化社会的一个反动。正如王蒙指出的，“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22）

三

在美国四五十年代出现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从德国移民过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他们的代表为威尔汉姆·雷奇(Wilhelm Reich)和赫伯特·马库泽(Herbert Marcuse)。雷奇提出了“性欲性格”(the genital character)，认为性功的健全是他所谓的健康的关键。他将他的这种理论应用在对社会的研究上，主张本能生活的解放。他认为，本能生活或者说“本质”，是相对于“文化”或有组织的压制而言的。他主张释放，主张个人的转化（而不是自我抑制），以最后达到被拯救的目的。他将性欲力与宇宙力——他称之为自然力(orgone energy)联系起来，呼吁进行文化的与性的革命。雷奇的理论对“垮掉的一代”作家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在《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 1955)中，马库泽不仅将性欲解释为身体的行为，而且还涵盖一种完全感官的现实经验（例如美感，快感，等等）。他认为，一旦实行了“性解放”，“自由的时间就能变成生活的内容，而工作则能变成人的能力的自由发挥。在这方面，本能的压抑性结构将被爆炸性地改变：不再是被局限在不是满足人的愿望的工作中的本能的能量之中，而将变成是自由的，而且作为爱欲，将拼命把性欲关系普遍化和发展成一种性欲文明”。（23）马库泽的所谓“非压抑的升华”“性解放”“性欲文明”等等乌托邦理想成为日后反文化的思想武器。

于是，自由的“性”成为避世时代作家小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他们所描述的“性”是自由的，毫无责任感与爱欲的，毫无顾忌的。必须指出，无论是塞林格，凯鲁亚克还是王朔，在描述反英雄们的性爱时，不管他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确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非人的存在的本质。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过多地依赖这种描述以突出人物的野性与颠狂。

狄恩在寻欢作乐；他放上一张爵士乐唱片，一把抓住玛丽露，紧紧地搂着她，随着音乐

的节奏往她身上撞去。她也随之撞回来。这是一场真正的爱之舞。伊恩·麦克阿瑟带着一大帮人来了。于是新年周末开始,持续了三天三夜。……路西尔看见我跟狄恩和玛丽露在一起,她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

“我不喜欢你跟他们在一起。”

“啊,得了,这只是找乐子而已。我们仅仅活一次。我们在及时行乐。(24)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王朔在《橡皮人》中的一段对话:

“干吗去了一宿没睡?”我闭着眼睛随口应答,“又上哪个垃圾堆后面捡妞儿去了?”

“你太踩乎哥哥了。哥哥虽说壮点,也是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梨一筐。”

……老邱自个儿乐了一阵,又捅捅我淫笑地说:“你觉得李白玲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人呗,还能怎么样!”

“得了吧,比你那个小‘早蜜’棒多了,真腴。”

“你没戏。……腴也轮不到你,你也就捏捏她手到头了。”……

“昨天晚上——你小子傻了吧!……

哥哥也是所向披靡。你不成,还得学。”(25)

塞林格的流浪的中学生,凯鲁亚克的总是在横跨美国东西部的大路上逛荡的愤世嫉俗者(hipsters),以及王朔笔下一点正经都没有的“玩主”,可以说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多余人”。他们从各自的卑下的社会地位出发,蔑视传统和主流文化。这种道德规范的失落必然导致他们玩世不恭,在酗酒、毒品、性中寄托他们的精神家园。正如有人指出的,这“是一种弥漫社会底层的无可奈何的失败主义情绪所致。……生命的短促感和宿命感加深了恐惧,被恐惧主宰着的身体必然遁入感官刺激的王国。”(26)

四

对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以及王朔的作品在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争议,评价不一。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1951年夏出版之后,由于主人公满嘴脏话秽语,16岁便抽烟、酗酒、与女人鬼混,社会上有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本书“猥亵”“渎神”,如加利福尼亚州桑胡斯城中学图书馆将此书列为禁书,有的教会杂志警告少年们不要读此亵渎神明的书。然而,《大西洋月刊》、《星期六评论》等文学杂志的书评对它评价极高。美国公共学校中用为教材的小说,以《麦田里的守望者》为第二位,仅次于斯坦培克的《人鼠之间》。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里斯曼在哈佛大学开设的《美国的社会结构和性质》课程中,指定此书为必修读物。30年来,此书的销路已在一千万本以上,平装的班登版已印至53版。

对王朔的评价就更为歧异了。《中国青年报》1993年1月3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作者认为,王朔的流行“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凶兆”。王朔作品乃是过度自卑的产物,王朔式的嘲讽是泼皮无赖式的,是一个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弱者的诅咒,一个疯狂破坏的力比多分子。(27)也有人认为,的确有无数“劳累不堪”“沦落的”无奈“小人”、“多余人”、“边缘人”,从王朔的作品中得到某种解脱、消遣、平衡、娱乐和轻松,而不管他是否以花样乌云的方式“掩盖了生活的血肉和残酷性”。(28)青年作家郑万隆说:“王朔是写当代城市生活中最好的。他的作品,无论怎么说,是适合城市的氛围和人们的欣赏口味的。”林斤澜认为,目前,文学上处于一个转型期,读者喜欢王朔更多是出于一种心态。文学评论家冯牧承认王朔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文学很值得注意的现象,王朔帮我们认识了社会生活,具有认识价值。(29)

我认为,王朔现象揭示了当今中国社会文化涌动中的一个走向。这种与主流文化相异的走向是经济进一步多元化、文化越来越世俗化、世俗的享乐主义愈益成为风尚的必然产物。

与其说王朔现象是一种文学现象，还不如说它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转型期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它迎合了文化世俗化的时代情结，符合世俗的市民社会的审美情趣和要求。通过比较研究，人们发现王朔作品的文学价值远远逊于塞林格和凯鲁亚克，尽管凯鲁亚克在美国近代文学史上也仅仅是二流作家。我把王朔与塞林格、凯鲁亚克进行比较，是基于一种文化的认识，是把他们界定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在不同的社会（后工业化社会和前工业化社会）中演变的文化现象范围之内。在这两种文明情境中，我们发现了共同的表征，也发现了歧异之处。

塞林格、凯鲁亚克的人物是从世俗的中产阶级中异化出来的。他们看透了中产阶级的虚伪、奸诈和荒唐，希望寻求一种新的生活，在流浪和无定中获得解脱。而王朔笔下的反英雄，是从社会的底层渣滓泛起——他们没有金钱作后盾，也没有势力可以依赖——希冀成为大款或大腕——中国的中产阶级。所以，在社会的架构中，他们是逆向而达到同一点上的。凯鲁亚克的人物是对中产阶级伦理的失落，而王朔的玩主们则是对正统伦理的失落。

凯鲁亚克对政治极为反感，与其说他是在寻求社会解决方式，还不如说他是在寻求个人的解决方式，正如凯鲁亚克说的，“他们并没有在垮掉这一词的含义上垮掉；他们发疯般地想活，想与人交谈，想被拯救。”而王朔在作品中远离政治文化，是因为政治曾经给了他过多的震动。王朔说，“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都是政治的东西。比如林彪事件，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震动；还有四人帮。这种震动，超过了机能上的身体上的损害。”（30）所以说，王朔亚文化现象是对过去泛政治化社会的一个反动，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塞林格的人物还是有理想的。考尔菲德说，“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像，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我呢，就站在混帐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塞林格赋予了考尔菲德一种殉道者的理想。而在王朔的作品中，人们很少能找到理性的东西。王朔自己表示，他不主张作品有哲学的深度。他说，“还有一个口号叫作要使作品有哲学的深度，理由是大作家的大作品都是有哲学深度的。最后作成一种什么效果呢？好多作家读哲学著作去了。”（31）“我们只想让观众掉点眼泪或者乐乐。可有的观众愣要从一切东西里发掘出思想内涵，好像什么都必然得跟人生经历、情操修养联系起来，累不累呀！”（32）王朔否定文学作品社会与美学的内涵，这对于他创作大作品将是一个致命的障碍。

凯鲁亚克和王朔笔下的人物都是精神流浪式的。凯鲁亚克的人物远离城市的喧嚣，他们希冀在路上、在禅中寻找精神家园，是出世的；而王朔的人物则注定要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之中寻觅人生的位置，他们不信神鬼，毫无信仰，是入世的。

在叙述的文体方面，凯鲁亚克刻意追求自然流露(spontaneity)，他的叙述风格属于一种个人的、散漫的、随意性的、冷隽而感伤的文体。王朔的文体也具有一种自然流露的风格。他们这种自然流露的文体导致他们都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来观察社会的下腹部。

美国50年代“垮掉的一代”引发、产生了60年代嬉皮士的文化。他们蓄长发，穿蓝色的牛仔裤、拖鞋，吸精神毒品，听摇滚乐，过男女混居的生活。王朔亚文化现象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什么呢？当80年代婴儿出生高潮期出生的独生子女在21世纪初进入青年期时，它将会在这些富裕生活中成长的年轻人中引发、产生什么呢？这是值得社会学家、政治家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1) Sheryl WuDunn, "The Word from China's Kerouac",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S, January 10, 1993.

(2) George B. Tindall, David E. Shi, *Gmerica*, W.W. Norton to Company, New York, p. 816.

- (3) 马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展望”，《新华文摘》，1991年7月，第42页。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中国青年大透视》，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 (5) (12) (13) (14) (15) (17) J. D. 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译，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页，第4—5页，第10页，第78页，第166页，第259页。
- (6) 黄雨石：《在路上》后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北京，第317页。
- (7) (8) (9) (10) (21) (25) 《王朔文集》第2卷，华艺出版社1992年，北京，第334页，第27页，第27页，第107页，第243页，第62页。
- (11) (22) 王蒙：《躲避崇高》，《读书》1993年1月。
- (16) (24) Jack Kerouac, *On the Road*, Penguin Books, England, 1986, pp. 69-71, p. 125.
- (18) (19) 《王朔文集》第3卷，华艺出版社1992年，北京，第184—185页，第193页。
- (20) 《王朔文集》第4卷，华艺出版社，1992年，北京，第119页。
- (23) 马库泽：《自由和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五篇讲演》，波士顿版，1970年，第22页。
- (26) (29) 《王朔，大师还是痞子》，高波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1页，第185—187页。
- (27) 老愚：“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蜘蛛”，《中国青年报》1993年1月30日。
- (28) 何东：“干嘛老吹起床号？”，《中国青年报》，1993年2月13日。
- (30) (31) (32) 《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92年，第39—40页，第85页，第47页。

《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朝鲜战争初期的英美关系

(1950.6—1951.6)

赵学功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91级博士生

朝鲜战争是战后东西方之间在冷战背景下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较量。英国既是主要参战国之一，同时又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事盟国，它的对朝政策及其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整个战争进程中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不仅直接出兵加以干涉，同时还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加强在菲律宾的美国部队，增加对印支地区的军事

援助，并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所有会员国提供必要的援助，以击退“北朝鲜的入侵”。美国政府试图以自己的行动来表明，它有能力在几个地方同时对付共产主义的“试探”。〔1〕

英国对美国所作出的迅速反应十分赞赏。同美国政府一样，英国政府也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它成功了，将会严重危及西方的安全，进一步鼓励苏联在其他地区采取行动，大大打击“自由世界”的威望和声誉，且不利于英国在香港和马来亚的统治。艾德礼首相在下院为美国的侵朝行径辩护时称：“国际法的一般原则认为，任何被侵犯的国家有保卫自己的权利，而且任何其他国家也有援助遭受侵略的国家的权利。”〔2〕因而，英国不仅完全支持安理会6月25日、27日通过的“谴责北朝鲜侵略”和“紧急制裁”两项决议，而且紧步美国后尘，把其驻太平洋地区的皇家海军置于美国支配之下，以实际行动援助侵朝美军。

但是，英国的出兵参战并非全力以赴，而只是作为英美团结的象征。英国政府反对美国把朝战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威胁”联系起来，担心冲突一旦扩大，西方就有可能把战略重心偏向东方，而使西欧没有像样的防御力量。〔3〕6月27日，英国外交部电告驻美大使弗兰克斯，明确指出：“我国政策主要的、基本的目标在于设法控制朝鲜的局势，以避免发生全球性战争。”〔4〕当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向英国驻苏大使凯利提出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时，伦敦立即表示极感兴趣，敦促苏联运用其影响，帮助恢复朝鲜原状，尽快结束冲突，作为回报，英国愿意说服美国从台湾撤军，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5〕

对于杜鲁门总统派遣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决定，英国政府颇感不安，认为此举是凶多吉少，倘若中国按既定计划解放台湾，势必会与美国发生冲突，引起战争，这不仅影响到英国在亚洲特别是在香港的利益，而且美国也会因此深深地陷在东亚，难以自拔。〔6〕

7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美国的台湾政策提出了温和的批评，指出：美国在朝鲜的“勇敢行动”可望获得“世界舆论的全力支持”，但是对于美国宣布的对台政策，却很难指望得到同样的欢迎，因为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反对朝鲜冲突的扩大。贝文强调：“中央人民政府现已控制了整个中国，根据开罗宣言，任何有悖于归还该国领土的做法都是不正当的。”他认为，美国在公开声明中提及台湾问题是非常不明智的，有可能使支持美国的国际阵营发生分裂。〔7〕

在征得杜鲁门同意后，艾奇逊于7月10日发给贝文一份措辞强硬的复电，声称台湾有个眼前的军事问题和长远的政治问题，在亚洲目前的局势下，“我们不愿意看到台湾不情愿地落入北平之手”，用它来做对付美国的海空军基地；美国也不会与苏联作交易，因其“讹诈”而在台湾问题、中国联合国席位问题上作出让步。艾奇逊还把朝鲜战争与中国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共产主义是以中国为先锋，现正在亚洲发动攻势，其近期目标是朝鲜、印支、缅甸、菲律宾和马来亚，中期目标是香港、印尼、泰国、印度和日本”，西方的“暂时让步”不仅不能改变共产主义的“侵略意图”，反而会“进一步刺激苏联的食欲，在其他地方进行冒险活动”。他扬言美国决不会从6月27日杜鲁门所声明的立场后退，后退就是“姑息”，就会给西方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电文发出后，艾奇逊又指示驻英大使道格拉斯，要求他向贝文强调，“这一答复在我们这里是得到最高批准的”，并提请贝文注意英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公开分歧对两国关系所造成的严重影响。〔8〕

艾奇逊的回函使英国人忐忑不安。7月15日，贝文再次致电艾奇逊，重申中国不能永远“孤立”于西方世界，分裂中苏的最佳办法就是保持与中国的联系。在与道格拉斯谈话时，英国外交部官员们也一再强调，英国政府最为关心的是“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亚洲国家对西方国家群起而攻之的局面的行动”，苏联最高兴的莫过于使中国和美国都卷入一场军事冲突，这不仅为它提供了绝好的宣传借口，而且还可能把整个亚洲推向苏联一边。〔9〕

为了消除分歧，协调两国对外政策，防止苏联在世界其他地区给西方制造麻烦，由艾德礼首相提议，7月20日至24日英美在华盛顿就“当前世界局势”问题举行了双边会谈。

英国代表强调,西方国家应尽力避免卷入亚洲大陆的冲突,希望把在远东发生的任何新的冲突都限制在当地,不使之发展成为苏联或中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在英国政府看来,把任何可能的中美和中英间的冲突都限制在当地的好处在于,不仅能避免一场全面战争,而且还将“使中共政权逐渐脱离莫斯科的可能性得以顺利发展”。最后双方商议,应对中国是否会介入朝鲜或亚洲其他地区作进一步的研究,并在联合国体制内继续探寻解决朝鲜问题的最终办法。

(10)

尽管美国再三保证会牢牢把握住台湾的行动,一俟战争结束,第七舰队就将撤离,但英国人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并不持乐观态度。事实上,就在作出这种保证的同时,美国政府即已开始重新考虑其对台的“不干涉”政策。(11)鉴于美国国内舆论正处于高度“情绪化”状态,而目前的首要任务则又是在联合国结成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英国政府决定暂不在台湾问题上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以免导致公开的分歧,而这只会有利于苏联。另一方面,英国又不愿把台湾与朝鲜战争连在一起。8月底,艾德礼在下院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英国在朝鲜的行动与台湾问题无关。(12)

相对而言,在对华石油禁运问题上,英美的分歧要小得多。7月13日,艾奇逊致函弗兰克斯大使,建议英国暂时中断对中国的石油运输,要英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在目前形势下,“对中国尤其是华北实行完全的石油禁运是至关重要的”。虽不免担心中国可能在香港采取报复行动,英国政府最终还是决定让步,征用全部石油物资(包括香港的石油产品),以作为对华禁运“最有效、最简捷”的手段。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在对华问题上单方面与美国合作的印象,英国要求美国寻求其他西方国家的合作,共同采取对“所有苏联集团国家”的石油禁运措施。7月28日,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各国政府一致同意,将六种石油产品列入“国际禁运货单I”之内,禁止将这些产品运往苏联、北朝鲜、东欧和中国。

为了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国务大臣肯尼思·杨格向贝文建议:第一,英国必须寻求英联邦成员国特别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支持;第二,必须设法向朝鲜提供更多的地面部队。杨格认为,鉴于英国在香港和马来亚的承诺以及国内资源的有限,增兵或许是最不诱人的方案,但却是能真正影响美国政策的唯一手段。8月中旬,当美国要求其盟国向联合国军提供更多的援助时,英国政府欣然同意从香港调两个步兵营开赴朝鲜。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从联合国军方面来讲,英国投入的力量仅次于美国,人数最高时可达14198人。

(13)

二

朝战初期,美国干涉的目标明确地限于恢复恢复朝鲜原状,担心如果越过三八线会招致苏联介入,从而引发与苏联的全面冲突。但为时不久,随着战局的逐步改观,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对美军是否要越过三八线,以武力统一朝鲜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事实上,到了8月初,除了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外,在美国政府内部已没有什么人再反对越过三八线了。9月1日,杜鲁门发表广播电视讲话,称“朝鲜人有权获得自由、独立和统一”,在联合国的领导下,美国“将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们享有这一权利”。(14)9月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美国对朝行动方针”的报告,两天后获杜鲁门批准,列为国安会第81-1号文件。该文件规定,只要届时中、苏不介入,就应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占领北朝鲜。已故的费正清教授曾指出,美国的这一军事目标忽略了“中国希望在其东北工业基地的边境上有一个缓冲国的战略需要”。(15)

在战争的最终目标上,英国外交部官员们的看法与美国人的设想是完全一致的,认为若仅仅限于恢复原来分裂的状态,既不会使世界舆论“满意”,朝鲜人也“不会喜欢”。但另一方面,他们提出,在战场形势未明朗化之前就作出越过三八线的决定为时尚早,而且这样的

行动也必须由安理会来批准。英国人还对苏联是否会接受统一的计划表示担心,因为这意味着要以武力消灭它所精心建立起来的“卫星国”,对此苏联不可能袖手旁观。(16)

在与美方协商后,9月底,英国政府将一份朝鲜决议案提交联合国考虑。该项方案提出,联合国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证整个朝鲜局势的稳定,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全”,建议在联合国增设朝鲜统一与复兴委员会,由它行使联合国的权力,在整个朝鲜半岛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政权,并负责组织和监督联合国的旨在重建和复兴朝鲜的活动。(17)

尽管美国不断作出保证说联合国军在北朝鲜不会采取挑衅行动,在中国东北和苏联边境地带将避免使用美军,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特别是陆军元帅斯利姆仍感到忧心忡忡,对非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后的行动感到没有把握,同时担心西方把过多的力量投入到朝鲜这个遥远的东亚半岛,会使欧洲的防务松懈,给苏联以可乘之机,而苏联已经在这一地区享有了军事上的优势。就连艾德礼首相也对继续北进是否明智表示怀疑,因为“中国很可能认为越过三八线是挑衅性的,甚至是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18)

但是贝文极力主张北进。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北朝鲜或南朝鲜,他们都是朝鲜人,不应当人为地永远把他们分开”。他提出,倘若联合国军打到三八线就停止不前,而使北朝鲜完好无损,那么“实际上就等于苏联已经胜利了,联合国的全部努力也将付诸东流”。(19)

9月27日,英国驻美使馆领事格雷夫斯把刚刚从新德里发来的三封电报交给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麦钱特,其中两封是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给尼赫鲁总理的,另外一封是尼赫鲁本人写给贝文的。潘尼迦在他的两封电报中简要汇报了与周恩来总理、聂荣臻代总长以及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谈话的部分内容,他确信中国领导人正积极地考虑出兵参战。但是,格雷夫斯认为,潘尼迦是个“反复无常、不可靠的报告者”,他的话并不值得重视。在给贝文的电报中,尼赫鲁表示坚决反对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认为这种行动将会使“世界灾难变得更有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在这一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了新的指示,授权他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20)

同一天,贝文致函尼赫鲁,再三声明英国向联大的提案“远不是挑衅性的”,决无以武力占领北朝鲜的意图,他怀疑从北京传来的“谣言”很可能是“蓄意破坏反对北朝鲜侵略的统一战线”。与此同时,贝文又向美国人建议,应当做出一些和解的姿态,以便安抚中国。(21)

与杜鲁门、艾奇逊的判断一样,英国的政策决策者们也不认为以武力统一朝鲜会招致中国的大规模干预。据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目前面临三种选择:由北朝鲜发出邀请,公开地或者通过提供“志愿军”的方式进行干预;在联合国内外施加最大限度的政治影响,以支持北朝鲜成为“独立的缓冲国”;在其东北边境地区集结数量庞大的军队,但不入朝作战。报告认为,中国内部尚待巩固,当务之急是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工业化,其军事实力不足以应付大战,而且干预也不会给它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故介入的可能性不大,很可能是通过外交途径,努力争取使北朝鲜成为一个“缓冲国”。(22)

10月1日,南朝鲜军队率先越过了三八线。10月3日,怀着阻止战争进一步扩大的希望,中国政府作了最后的外交努力。周恩来总理紧急约见潘尼迦,请印度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干预。

尽管美国国务院内一些负责东亚和中国事务的官员力主应当严肃对待中国的警告,而不是仅仅看成“恫吓”和“威胁”,并建议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减少中国参战的危险,但决策者们仍固执己见。杜鲁门认为,潘尼迦不值得信任,他只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艾奇逊的看法是,周恩来的谈话“不是一个官方政策的声明”。10月9日,参联会向麦克阿瑟发出一项针对中国可能干预的补充指示,授权他只要有把握取得成功,就应当继续行动。(23)很显然,不论中国出兵与否,美国都不打算放弃武力统一的意图。

中国的警告使英国人惊恐不已。10月3日,外交部高级官员罗杰·梅金斯电告艾德礼,

对战争扩大的可能性深表关注。他说中国目前大约有40万军队集结在东北边境,其中10万可能随时出动,担心中美一旦在朝鲜发生冲突,麦克阿瑟很可能会轰炸中国东北的交通运输线,封锁中国海岸,从而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这不仅会给英国的对华政策造成最严重的困难,使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受到损害,而且还将大大削弱整个西方在其他更重要地区的防御能力。梅金斯建议,应当对中美冲突对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可能影响进行紧急研究,并努力说服美国人尽量减少在朝鲜的军事承诺,通过政治的而非军事的手段来解决朝鲜问题。(24)

10月4日,弗兰克斯大使向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询问有关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问题。他所关心的是,美国是否认为现存的联合国决议已授权采取这种行动。腊斯克答复道,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与6月27日联大决议是相一致的,因为北朝鲜人还有战斗力,仍然在攻击联合国军,三八线不能成为一道障碍,麦克阿瑟在军事上有必要采取在他看来是恰如其分的任何方式继续进行战斗。(25)

战争扩大的危险迫在眉睫,这使得贝文也深感不安。他打电报给外交部,建议弗兰克斯和杨格同美国政府进行紧急磋商,起草一份联合声明,以阻止中国的干预,并为中国提供一个就朝鲜问题在联合国发表意见的机会。

贝文的意见遭到了艾奇逊的坚决反对。在与弗兰克斯会晤时,艾奇逊力图使英国人变得强硬起来。他认为,现在让中国人来参加辩论为时已晚,这样做不仅会使问题愈发混乱,而且还会延搁联合国决议的通过,进而危及到在朝英美士兵的生命安全。他承认,中国参战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存在,但“现在表现出犹豫和胆怯则只会招致更大的危险”,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继续向前推进,而“决不应被大概是中国共产党的恫吓所吓倒”。(26)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一直对联合国军恣意北进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认为越过三八线在军事上的不利远远超过了在政治上获得的好处,建议联合国军暂不要向北发动攻势,在南朝鲜停留一至两个星期,以便给外交家们更多的时间,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艾德礼首相和国防部长欣威尔对此都表示同意。(27)

贝文极力反对向美国施加压力,使其推迟发动攻势,认为这在政治上对英国来说是极其危险的。他争辩道,美国的决定是由“华盛顿最高层以最强有力的措辞”作出的,倘若杜鲁门听从了英国的建议,而日后在军事上出了问题,那么英国就会受到指责。他强调,在过去几个月里,英国对美国的影响一直在不断增强,若要保持这种影响,英国就必须继续谨慎行事。(28)

在说服了艾德礼之后,贝文又要求美国国务院作出承诺:力图使朝鲜战争局部化;不允许麦克阿瑟未与英国协商就进攻中国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在联合国通过朝鲜决议案与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间能有一段时间差。美国人接受了前两点,对于第三点,腊斯克断然回复道:“如果联合国能尽快通过决议,那就会存在一段时间差。”(29)

英国外交部的官员们虽然对北进有可能会过分“刺激”中国而感到顾虑,但总的说来,他们不相信中国会大规模出兵干预,认为中国无力也不敢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苏联也只会停留在宣传攻势上,以煽起西方间的不和。10月7日,联合国通过了“统一”朝鲜的决议,授意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北作战。在这关键时刻,美国的主要盟国未能约束住华盛顿。

三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第一次战役,在重创联合国军后迅速脱离了接触。中国通过自己的行动向美国方面传递了两个明确的信息:第一,中国不会让麦克阿瑟轻而易举地进逼到鸭绿江岸;第二,假若美国人停止他们的攻势,全面战争是可以避免

的。但是，美国政府对此认识并不清楚。虽然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等人都倾向于采取政治的手段来解决中国干预的问题，但同时却又寄希望于麦克阿瑟这个“非同凡响”的军界人物在仁川之后再创一次“奇迹”。11月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讨论决定，不改变给麦克阿瑟下达的作战指示，允许他继续向北推进。（30）

相对说来，英国的行动要慎重一些。它不仅断然否决了美国提出的“允许联合国军穷追敌机进入东北领空二到三分钟”的建议（事实上杜鲁门、艾奇逊以及国防部长马歇尔对该建议都表示赞成），而且还为避免冲突的进一步扩大，积极酝酿在朝鲜北部建立非军事区的行动方案，试图通过政治的途径解决朝鲜问题。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认为，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中国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联合国军的攻势，而同时又不冒战争扩大的危险。建议联合国军撤至并固守住朝鲜半岛的腰部，即沿兴南到安州一线，宣布这条线以北的整个地区为“非军事区”，然后在联合国内就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磋商。军方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工党和保守党的一致同意。贝文认为，这一方案是既能使战争尽快结束，又能让中国人接受的两全其美之策，而且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有利于西方。（31）

尽管建立“缓冲地带”的建议得到了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戴维斯、远东事务处处长埃默森和无任所大使杰瑟普等人的拥护，甚至艾奇逊对此也抱有几分兴趣，但却遭到了军方特别是麦克阿瑟的强烈反对。

11月9日，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他准备在11月15日左右发动全面攻势，向中朝边界推进，力图占领整个北朝鲜。他把英国提出的谋求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斥之为搞“慕尼黑阴谋”，声称“把北朝鲜的任何一部分拱手让给中国共产党都将是近代以来自由世界的最大失败”，“屈从于如此邪恶的建议将会使我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丧失殆尽”。最后，他强调说：“决不能在此关键时刻减弱攻势，我们必须勇往直前，直至取得最后胜利。”（32）

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的高级助手布尔特也同样坚决反对建立缓冲区的建议，认为这只能严重地束缚住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而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他确信麦克阿瑟有足够的力量在朝鲜守住任何一道防线，不应改变给他的作战指示，虽则这样会毫无疑问地在某些方面增加局势的紧张气氛。布尔特强调，如果中国军队被赶出朝鲜半岛，联合国就会获得一个使冲突局部化的更好机会，并“阻止进一步的侵略活动”，软弱则只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他敦促柯林斯应坚决抵制建立缓冲区的想法，因为国务院有相当一部分人正极力兜售这一主张。（33）

11月15日，艾奇逊约见弗兰克斯，明确表示他不打算阻止麦克阿瑟发动已计划好了的攻势，因为目前仍然对中国干预的意图尚不十分清楚，而要搞清它除了采用军事“试探”的办法外别无他途。他认为，如果中国参战的目的仅仅限于保卫其边境和鸭绿江水电站的安全，那么英国提出的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或许会起到“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若中国意在“占领”整个北朝鲜或者把联合国军赶回南方去，则英国的建议就不会收到任何效果。（34）

贝文把艾奇逊的答复看成是“令人鼓舞的”。11月17日，他电告艾奇逊，准备让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布在适当的时候阐明英国方案的基本构想，并希望能得到美国代表的支持。他强调说，同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一样，他本人也十分赞成联合国军停止北上，坚持认为通过撤出联合国军和其他外国军队来建立一个缓冲区是非常必要的，并表示愿意与美国人一起商讨有关缓冲区管理的具体细节问题。（35）

11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与军方领导人召开联席会议。如果此时能阻止麦克阿瑟冒然北犯的话，中美大规模冲突的悲剧或许是可以避免的，但华盛顿并没有这样做。在艾奇逊看来，“如果麦克阿瑟将军不用他的方法进行一些军事上的试探，就不能判断中国干预的程

度”。与会者一致同意，不干预麦克阿瑟在北朝鲜行动的自由，不变更已赋予他的作战任务，但为了保险起见，他只需占领鸭绿江以南10至25英里的高地即可，而不必打到江边。（36）当天晚上，艾奇逊将美国的这一意图告知弗兰克斯，并说明英国推迟向安理会提交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是绝对必要的。紧接着，他又指示美国驻英代办霍尔莫斯以最强硬的口气告诉贝文，倘若杰布现在在联合国提出建立非军事区的建议，那将是极为在害的。这不仅会被人看成是一种“示弱”，而且也会使麦克阿瑟和他的部队感到不知所措，并增加中国在联合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还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军事问题和难以预料的危险，希望贝文在与美方进一步协商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37）

此时，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强烈要求艾德礼和贝文向美国施加更大的压力，使其暂缓发动攻势，以便能有更多的时间与中国人交换意见，但是这一建议没有被贝文所采纳。11月22日，贝文致函艾奇逊，表示同意在知晓麦克阿瑟总攻结果之前不向联合国提交英国的方案，尽管他强烈地感觉到这一方案为迅速结束冲突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为了能在最后一刻阻止中美在朝鲜发生大规模对抗，贝文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他指示英国驻华代办哈奇森要向中国政府阐明，联合国军队在朝鲜的行动决不会损害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合法利益将会得到充分考虑，联合国的目的在于恢复那里的和平和秩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政府，而决无侵略中国之意图，希望中国能打消顾虑，消除误解。与此同时，贝文又要求美国人作出如下承诺：下达给麦克阿瑟的命令与安理会决议相一致；下命令时要经过适当的磋商；麦克阿瑟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只不过是联合国的代理人。他强调指出，凡属超过授权的行动事先必须与提供了部队的安理会成员国进行秘密协商，在征得这些国家同意之前，美国应指示麦克阿瑟不得采取此类行动。（38）

11月24日，艾奇逊复函贝文，指出安理会不可能给麦克阿瑟下达详细的作战指令，要美国政府正式作出不将战争扩大到朝鲜以外的承诺是有困难的，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理论上而非实践上的。他强调，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全力支持麦克阿瑟的行动，在此紧要关头提出任何其他建议都只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39）就在这一天，麦克阿瑟发动了他的所谓“结束战争”的总攻势，贝文建立缓冲区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

四

中国的出兵参战打破了美国试图以武力统一朝鲜的美梦。面对联合国军攻势的惨败，在美国政府内有相当一部分人就纷纷站出来献计献策，要求对中国采取某种形式的报复行动。

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所属的联合战略考察委员会、陆军部的计划与行动处以及国家安全资源局等都曾提议，应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援助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支持中国大陆内部反共“游击队”的活动。国务院的远东处、政策设计委员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自11月份始一直在秘密研究对中国和朝鲜实施核打击的可行性问题。至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则公开地进行原子讹诈，宣称美国正积极地考虑要在朝鲜战场上使用原子弹。（40）

杜鲁门的声明使英国政府感到震惊。76名工党议员联名写信给艾德礼，谴责杜鲁门的讲话，并声明：如果英国支持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决定，他们将对政府投不信任票。政界要员丘吉尔、艾登等也对局势表示了忧虑，呼吁“联合国应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敦促政府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以阻止战火的蔓延。在此情形下，艾德礼不得不通知美国驻英代办，他即将赴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会晤，并在一次内阁紧急会议上宣布了这一决定。（41）

从12月4日至8日，杜鲁门与艾德礼先后共举行了六次会谈。这次美英首脑会晤表明，双方在对华、对朝政策上的分歧达到了顶点。

艾德礼坚持西方应在东方实行战略收缩，集中精力加强西欧防务，认为倘若深陷在东亚，

同中国打一场“有限战争”，那就会大大削弱西方在其他地区的力量，并使欧洲降到次要地位。他强调说，反对共产主义的重要阵线是在西方，必须尽可能地加强在西方的实力，而决不可采取任何导致削弱西方力量的行动。（42）

杜鲁门的看法是，美国在东、西方都负有责任，如同英国在香港和新加坡所做的那样，美国同样在朝鲜、日本和菲律宾承担着义务，美国的目标是，既要维持在欧洲的防线，同时又要保持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艾奇逊也指出，美国对亚洲和对欧洲的政策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必须有一个适用于世界东西方的统一的外交政策”。在他看来，要是美国放弃了远东，苏联和中国就会取而代之，远东各国就会尽其所能与它们和好，相反，若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那么处境就会好得多。（43）

艾德礼不同意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苏关系的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绝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仍有出现“铁托主义”的机会。强调英美的基本目标应该是设法在中苏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促使它们分道扬镳，使中共成为一支独立的、在远东与苏联相抗衡的力量。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对华态度过分强硬，那只会把中国进一步推入苏联怀抱，使中国人把苏联看成是他们的唯一的朋友。（44）

艾奇逊对此回答说，中国共产党人是“服从于莫斯科的共产党人”，一切都按照莫斯科的模式行事，“甚至是比东欧卫星国还要听话的学生”。他认为，也许在今后10年或15年内可以看到中国态度的转变，但目前却无济于事。杜鲁门的看法更为明确，认定中国是苏联的“卫星”，而且只要中共掌权它就仍将是完全受命于莫斯科的“卫星”。（45）

艾德礼要求美国同意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在联合国内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认为这样做不仅不会丢面子，反而在政治上有利于西方，但杜鲁门、艾奇逊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声称美国不会为停火付出任何代价，如果西方作出让步，共产主义就会“得寸进尺”，变得更加富有“侵略性”，继朝鲜之后，他们的目标就可能转向印支、香港和马来亚。杜鲁门指出，对付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要彻底消灭它，而决不能“姑息”、“迁就”。艾奇逊则认为目前是“自1917年以来与共产主义谈判的最坏的时机”，即使谈判也不会有任何成效，美国应当在朝鲜继续打下去，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倘若日后被赶出，应拒绝承认失败，尽量用一切办法来为中共制造麻烦，同时阻止台湾“陷落”。（46）

艾德礼不赞成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力劝美国人不要轰炸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和工业城市，因为“西方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发动这样的进攻”，而且这类行动也不会导致问题的最终解决，只会促使战争的升级和扩大化。至于海上封锁，艾德礼指出，这对西方的损害远比对中国的为大，中国主要依赖苏联进行贸易，而不是西方。他明确地告诫美国人，同中国打“有限战争”的政策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不可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也很难在联合国获得通过，这样的行动将是美国单方面的行动。（47）

在会谈中，艾德礼还提到了关于麦克阿瑟的指挥权问题。他说，欧洲的普遍看法是麦克阿瑟在独揽一切，其他参战国在行动中几乎没有多少发言权，建议成立某种类型的委员会来指挥战争。这一提议遭到了美国人的强烈反对。布雷德利、马歇尔辩解说，麦克阿瑟的一切行动均严格按联合国的要求行事，他所追求的作战目标也正是联合国想达到的目标。至于指挥权问题，他们认为，战争不能交给一个委员会来指挥，因为战争的决定必须作出迅速处理，而委员会就做不到这一点；其他人若不喜欢目前的状况，可以撤出他们的军队，若不想退出，那就有责任听从联合国的指挥。（48）

很难说这次英美首脑会晤取得多少成功。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双方达成了谅解，但基本的政策分歧一如从前。同艾德礼一样，杜鲁门也正经受着来自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他的回旋余地并没有多少，不可能向英国人作出更多的许诺。（49）事实上，就连原子弹问题——这是艾德礼访美的主要目的——也并没有取得彻底的解决。在艾德礼赴美的前一天，艾奇逊、马歇尔以及总统特别助理哈里曼等人就向杜鲁门建议，不要向英国人作出限制美国

使用原子弹的行动自由的承诺，而应告诉他们，美国并不愿意使用原子弹，并强调美国充分理解使用原子弹所造成的可怕后果。(50)结果，虽然杜鲁门口头应允不与英国协商他将不会考虑使用原子弹，却不愿把这句话写进最后的会谈公报中。艾德礼归国后声言同杜鲁门达成了严格的协议，美国不会自行其是使用原子弹，但实际情况是，就在双方会谈期间，杜鲁门已经下令将分解的核炸弹的部件空运至远东，并储存在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上，艾德礼对此却一无所知。(51)

艾德礼的造访并没有动摇美国人要报复中国的立场，尤其是军方，依然对同中国打一场有限战争抱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在1950年底和1951年初，海军上将谢尔曼、国家安全资源局局长赛明顿、抗日战争时期的“飞虎队”队长陈纳德以及麦克阿瑟等人都极力主张对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报复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征询各方意见之后，也正式向国防部提出一份备忘录，表示赞成对中国实施海空全面封锁，取消对国民党军队的限制，对国民党反攻大陆给予后勤支援，支持国民党“游击队”在大陆的反共活动，并提出倘若中国在朝鲜之外进攻美军，就应对其境内的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海空打击。(52)

但是，艾奇逊反对把战火蔓延到中国，使朝鲜战争演变成中美大战。除了美军实力不足以及担心苏联介入外，他所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英国不会支持这样的行动。尽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大为削弱，但它仍是目前美国盟友中仅有的强国，是美国“唯一可以依赖的真正盟友”，没有英国的全力支持，北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美国的全球战略就难以实现。因此，艾奇逊认为，保持英美的团结和合作对于美国的安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53)

1951年1月11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处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有力地支持了艾奇逊的观点。该报告指出：联合国不可能同意对中国大陆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这样的行动反倒会使英国在联合国内外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破坏，并有损于西方国家间的团结，进而影响到西方未来的防御能力。报告最后警告说，在朝鲜之后，美国“经不起对中国的第二次军事失败”。1月2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暂不对华采取报复措施，对这一问题继续深入研究。由于战场形势愈来愈明朗化，美军被赶出朝鲜半岛的前景消失了，交战双方在三八线呈胶着状。这使得参联会的行动方案付诸实施已没有什么必要了。(54)

此时，英、法等西欧盟国表明它们强烈反对扩大战争，渴望看到在朝鲜立即实现停火，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然而，美国政府对此并没有多少热情，认为从“软弱地位”出发进行谈判是“困难的”和“不明智的”，马歇尔部长则宣称：“接受停火就表明在我方有很大弱点”。(55)因此，自1951年始，华盛顿执行了一种既不使冲突升级又不要和平的政策，却积极致力于要联合国给中国贴上“侵略者”的标签。(56)在这一问题上，英美之间同样存在着不大不小的分歧。

1月5日，艾奇逊写信给贝文，要求英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一道同美国在联合国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他以威胁的口吻说道，除非给中国加上“侵略”的罪名，否则，美国国内就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孤立主义浪潮，并损害美国为北约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联合国作为一个集体安全组织也会因此而垮台。(57)

艾奇逊的这封信使得艾德礼对美国政策的真正意图开始担忧起来。1月8日，他致函杜鲁门，表示担心“美国政府可能打算放弃把战争局限在朝鲜的政策，转而采取一种对中国进行有限战争的政策”，提醒美国人不要忘记主要的敌人是苏联，对中国作不必要的挑衅是不明智的。他强调指出，英国政府反对“在目前形势下由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也不赞成由集体措施委员会考虑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58)

但是贝文力主支持美国人的立场，认为如果美国在这件事上受阻，它就有可能退回到军事上的孤立状态，不再积极参与欧洲的防务事宜，这对英国而言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担心，英国若执意在这件事上反对美国的政策，很可能导致“英美联盟的终结”。弗兰克

斯也建议政府态度不要过分强硬，否则就会严重影响到与美国的全面关系。(59)

美国政府继续向英国人施加压力。艾奇逊指示美国驻英代办要尽一切努力说服英国政府官员、新闻界和公众支持美国的政策，他自己也警告弗兰克斯说，倘若英国不同意把中国打成“侵略者”，不仅会使杜鲁门政府在国内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且国会也将大幅度削减对西欧的各类援助。(60) 1月19日和23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谴责中国是“侵略者”。1月20日，美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中国“侵略”朝鲜的议案。

英国虽然打算支持美国的政策，却反对对中国立即实行制裁措施，要求美国修正议案，优先考虑斡旋委员会的工作，敞开同中国政府谈判的大门，否则英国对美国的提案将不予赞成。

这次英国人终于获得了成功。1月27日，艾奇逊向弗兰克斯表示，美国愿意作出妥协以换取英国对提案的支持。他强调说，这是美国在满足英国政府愿望方面可以作出的最大努力，杜鲁门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都同意作出这种让步。(61) 2月1日，美国的提案在联合国获得通过。

在英国政府看来，谴责性的议案同联合国席位问题没有什么联系，因而它继续支持恢复中国政府在联大的合法席位，反对对中国实行全面的经济制裁，并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敦促其在朝鲜停战，为此还曾在5月31日提出了具体的停战方案。(62)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出和平倡议，建议交战双方举行谈判，以求得问题的合理解决，杜鲁门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声明愿意参加谈判。英国政府对美国此举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朝着有利于解决远东问题迈出的正确的一步。7月10日，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朝鲜战争也由此进入了一个边打边谈的新阶段。

注释：

(1) William W. Stueck,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p. 197.

(2) 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3) Alan Bullock, *Ernest Bevin*, New York, 1983, p. 791.

(4) Fo 371/ 84080, June 27, 1950,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London.

(5) *FRUS, 1950*, Vol. 7, p. 339.

(6) C.P. (50) 156, July 3, 1950, PRO.

(7) (8) *FRUS, 1950*, Vol. 7, pp. 329-331, 347-352.

(9) *Ibid.*, pp. 381-382, 395.

(10) *Ibid.*, pp. 462-465.

(11) Dean Acheson Papers, Box 65, July 27, 1950.

(12) C.P. (50) 200, Aug. 3, 1950, PRO;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上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37页。

(13) C.M. 55(50), Sept. 11, 1950, PRO; Harry G. Summers, JR., *Korean War Almanac*, New York, 1990, p. 289.

(14) Max Hastings, *The Korean War*, Simon and Schuster Co., 1987, p. 118.

(15)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82页。

(16) C.P. (53) 193, Aug. 31, 1950, PRO.

(17) *FRUS, 1950*, Vol. 7, pp. 763-764, 773-774.

(18) PREM 8/1405/123162, Sept. 26, 1950, PRO.

- (1 9) 斯帕尼尔前引书, 第 1 1 0 页; William W. Stueck, "The Limits of Influence: British Policy and American Expansion of the War in Kore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Feb. 1986, p.81.
- (2 0) (2 1) *FRUS*, 1950, Vol.7, pp.792-794、811.
- (2 2) *Ibid.*, pp.813-816, William Louis and Hedley Bull eds.,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 Oxford, 1986, p.62.
- (2 3) 《杜鲁门回忆录》, 第二卷, 三联书店 1 9 7 4 年版, 第 4 3 2 页;《艾奇逊回忆录》, 上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1 9 7 8 年版, 第 3 0 7 页。
- (2 4) PREM 8/1405/ 123162, Oct. 3, 1950, PRO.
- (2 5) (2 6) *FRUS*, 1950, Vol.7, pp.859-861、868-869.
- (2 7) FO 371/ 84100, Oct.5, 1950, PRO.
- (2 8) Stueck, *The Limits of Influence*, p.85.
- (2 9) *FRUS*, 1950, Vol.7, p.893.
- (3 0)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Vol.II, 1963, Chicago, p.583.
- (3 1) Peter Farrar, "Britain's Proposal for a Buffer Zone South of the Yalu in November 1950",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No.2, April 1983, p.335.
- (3 2) *FRUS*, 1950, Vol.7, pp.1108-1110.
- (3 3) Stueck,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p.250.
- (3 4) FO 371/ 84114, Nov.15, 1950, PRO.
- (3 5) *Ibid.*, FO371/84114, Nov.17, 1950, PRO; *FRUS*, 1950, Vol.7, pp.1172 -1173.
- (3 6) 《艾奇逊回忆录》, 下册, 第 3 2 7 页; *FRUS*, 1950, Vol.7, pp.1204- 1208.
- (3 7) *FRUS*, 1950, Vol.7, pp.1212-1213.
- (3 8) (3 9) *Ibid.*, pp.1225, 1227-1229.
- (4 0) Callum A. MacDonald, *Korea; the War before Vietnam*, Macmillan Press, 1986, pp.72 -74.
- (4 1) Foster R. Dulle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 New York, 1972, p.107; Bullock, *Ernest Bevin*, p.821.
- (4 2) (4 3) (4 4) *FRUS*, 1950, Vol.7, pp.1365-1366, 1374-1375; 1397-1398.
- (4 5) (4 6) *Ibid.*, pp.1367-1368; 1401-1402.
- (4 7) (4 8) *Ibid.*, p.1451; 1431.
- (4 9) Lewis Purifoy, *Harry Truman's China Policy*, New York, 1976, pp.257- 258.
- (5 0) 詹姆斯·施纳贝尔:《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第二卷, 国防大学出版社 1 9 9 0 年版, 第 3 2 6 页。
- (5 1)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Box4;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 解放军出版社 1 9 9 0 年版, 第 5 2 0 页。
- (5 2) Barton Bernstein, "New Light On the Korean War,"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April 1981, pp.266-267.
- (5 3) Rosemary Foot,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Korean Crisis," *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 1986, p.53.
- (5 4) 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9;施纳贝尔前引节, 第 3 7 5 页。
- (5 5) 福雷斯特·波格:《马歇尔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 1 9 9 0 年版, 第 4 7 0 页
- (5 6) Matthew Connelly Papers, Box2.
- (5 7) (5 8) *FRUS*, 1951, Vol.7, pp.27-28, 37-38.

(59) Foot, *The Wrong War*, p. 113; PREM 8/1405/123162, Jan. 21, 1951, PRO; Stueck, *The Limits of Influence*, p. 95.

(60) Burton Kaufman,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1986, p. 135.

(61) (62) *FRUS, 1951*, Vol. 7, pp. 136-137; 480-481.

《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国际政治的另一种透视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述评

王逸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如果让国际政治学家评选 1993 年度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著述,《文明的冲突》可能名列榜首。这篇登载于美国《外交》季刊 1993 年夏季号、合中文约两万字的作品,一发表便立即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从华盛顿到北京,从东亚地区到阿拉伯国家,或介绍或评论,或褒扬或针砭,无处不闻回应之声。(1)

此文的作者自然不是平庸之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27-),美国当代政治发展理论权威,自 50 年代起即在哈佛大学任教,除学术活动外,亦积极参与各种有关军事、外交、政治之政府顾问工作。亨氏著述甚丰,涉及面也广,主要著作有:《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4 年),《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 年),《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 年),《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1981 年),《第三波:20 世纪末的民主化进程》(1991 年)。其思想和论点影响巨大,尤以他所提权威和稳定对现代政治发展之重要的见解备受注意。据美国《政治学季刊》所载统计资料,在国际政治领域,亨氏被他人学术著作中引用过 1072 次,遥居各家同行之首。(2)《文明的冲突》乃作者在哈佛大学奥林研究所就《转变中的防卫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的课题提交的研究报告。

亨氏在这篇长文中阐发的主要思想,可以简约地归纳成彼此联系又自成一体的若干命题:

(一) 今日世界里,文明差异明显存在,文明意识与日俱增,文明是人类历史的主线。

冷战期间,世界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现已没有太大意义。今天以文化和文明来区分国家,要比以政治、经济体制或者发展水平来划分,更有意义得多。文明的相异不单真实而且基本。文明被历史、语言、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所分隔。不同文明对上帝与人、个体与群体、公民与国家、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种种关系有不同的观点,而对权利与责任、自由与权威、平等与阶级的相对重要性亦有迥异的想法。这些差异在历史上产生,不会立即消失,比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权的差异更深刻。世界的距离拉得愈来愈近,民族间的互动日趋频繁,不仅加强了文明意识,亦加强了彼此的差异性与内部的共通性。全球经济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历程,既使人超越长期以来的本土认同,也使人超越曾经独一无二的民族国

家认同。与此同时,宗教以原教旨主义形式填满这个真空,宗教复兴提供了认同与委身的新的基础。此外,成功的经济区域主义也强化了文明意识。西方人总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要角,可是这状况只维持了几个世纪。长远来说,人类历史的主线还是文明。

(二)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

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于意识形态或经济,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会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世界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七、八种主要文明的互动:它们包括西方、日本、伊斯兰、印度、拉丁美洲、斯拉夫—东正教,也可能包含非洲文明等。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文明间的断层线上。同政治及经济上的差别不一样,文化的特质与差异更难改变,也更不容易妥协与解决。就阶级与意识形态冲突而言,关键问题是:“你到底站在哪一方?”人们可以、并且事实上会选择或改变立场。而文化冲突的问题则在:“你是哪种人?”这是既定且不能改变的。宗教歧视比种族问题更为尖锐和排他。由于人们以种族及宗教来界定自己的身分,因而往往认为他们与不同种族或宗教的人之间,存在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对立关系。文化和宗教的差异亦令政策分歧:从人权到贸易,从商业到环保等等。政府与集团愈不能用意识形态来寻找支持与联盟,它们便愈发诉诸共同信仰与文明认同来达到其政策目标。对不同文明而言,差异不一定意味冲突,冲突亦不一定隐含暴力,但长久以来,由此引起的冲突往往最持久、最暴虐。

(三)与冲突情形对应,将出现文明内部的结合;成功的政治、经济和国防制度的发展,多半会在同质文明内发生。

相同文明的不同集团或国家与异质文明发生战争时,很自然会凝聚一起相互支援。正如冷战后世界所揭示的:“亲族国家”(kin-country syndrome)之文明共通性,取代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势力平衡的考虑,成为合作与结盟的首要基础。这可从冷战后的波斯湾战争、高加索及波黑地区日渐升级的冲突中得到印证。冲突与暴力亦会发生在相同文明的国家与集团内,但这些冲突跟相异文明间的冲突相比要来得缓和,也较不易扩大。俄罗斯同乌克兰近年来关系的演进曲线为此提供了依据。成功的发展多出现于同质文明国家或区域内。比如,尽管目前世界各地均有经济区域主义抬头,只有当经济区域主义植根于共同的文明内才能取得进展:欧洲共同体以欧洲文化及西方基督教为共同基础;北美自由贸易区能否成功,端视当下美、加、墨文化的汇合进程;未来最主要的东亚经济集团很可能以中国而不是日本为中心。

(四)文明的冲突是近代世界冲突演化的最新阶段,从现在起国际关系将日趋非西方化。

由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的近代国际体系出现后的一个半世纪,西方世界的冲突大部分发生在试图扩张其官僚机构、军队、商业力量和领土的君王之间,在这过程中出现了民族国家。自法国大革命起,冲突主线就从君主转移到民族国家之间了,它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后,由于俄国革命及其引起的反应,国家的冲突让位给意识形态的冲突。君主、民族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已迈出西方阶段,重心转到西方与非西方文明的相互作用上。在涉及文明的政治中,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下的历史客体,而像西方一样成为推动、塑造历史的力量。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将成为世界政治的轴心。势力的差异及军事、经济与制度等力量的竞逐,成为西方与其他文明冲突的来源之一;文化的差异即价值与信仰的不同,是冲突的第二个源泉。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轴很可能是“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的强权与价值的回应。这些回应一般是以三种形式之一、或是三者相互组合的方式出现:一是拒绝参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一是尝试加入西方并接纳其价值与制度,一是走“现代化而不西化”的道路。

(五)冷战结束后的今天,已形成“西方对抗非西方”的局面。儒教国家同伊斯兰国家

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

那些因为文化与能力的缘故而不想或不能加入西方的国家，借发展本身的经济、军事及政治力量同西方竞争。它们透过推动内部发展或与其他非西方国家合作来达到这个目标。这种合作最突出的形式是儒家—伊斯兰的连接，它的出现是要向西方的利益、价值与势力挑战。到目前为止，儒家—伊斯兰的军事结合已经形成。尚不能断定这种结合会不会持久。新的军事竞争正在伊斯兰—儒家国家与西方之间产生。在新的军事角逐形式里，情况将是一方竭力发展其军事力量，另一方竭力限制并预防对方逐步建立的军事力量。西方应当做的是：促进欧美之间的进一步合作；将东欧与拉美纳入西方；促进并维系跟俄罗斯和日本的合作关系；避免把地区性文明间的冲突升级为异文明间的重大战争；抑制伊斯兰与儒教国家的军事扩张；支持与西方价值和利益相投的其他文明族群；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

不难想像，东亚和伊斯兰的许多国家对此文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在结语部分，它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信奉儒教和伊斯兰教的国家一律视为西方国家的对头和主要威胁。这种敌视态度以及作者不言自明的“西方中心论”立场，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从感情上讲，差异天成的各种文化或文明，本无高下之分、优劣之比，它们只不过在历史长河的不同流段充当“显学”的时间不同而已。500年前当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时，美国不过是土著人狩猎的荒野；再过50年，地球上还不知有何变化，保不准朝圣的香火会在新的方土点燃。亨氏大概看到这种可能，因而要找出未来西方的“主要敌人”。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本领，也许是博得西方一些人赞赏的原因。但它却给其他国家的人造成无端的刺激，并且同作者的某些分析及结论相矛盾，比如，文章结尾处承认：“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他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呢？这种自我悖诋或许反映了作者充当谋士和作为学者之双重角色在同一份报告中出现时的不自觉来回错位。从道理上分析，“伊斯兰教—儒教国家对抗基督教国家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绝不是锁定的逻辑结局：第一，不同文化的国家之间固然会有矛盾甚至磨擦，问题在于它们是否一定会酿成世界大战、成为“主要冲突”？迄今为止的历史难道不是既有冲突、又有妥协，既有裂变、又有融合的过程吗？第二，各种原教旨主义之间确有水火之隙，但原教旨主义运动要想充当国家大船的罗盘恐怕不那么简单，因为经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观的考虑已经、并且将越来越多地成为当权者的不亚于宗教观和爱国主义信念的决策尺度；第三，伊斯兰国家和儒教国家的结盟，又是一个难以筹划的前景。也许有少数人——从政客到百姓，从西方到东方——如此议论，如此盘算，但对于多数人来讲，政治与赌博毕竟不能完全划等号，何况回教同儒教之间也不乏“文明的”冲突；最后，退一万步讲，即使属于伊斯兰教的某个或几个国家与属于儒教的某个或几个国家的当权者存有彼此联手、伐师西征的意愿，他们能不能搞起来，搞起来后能不能成气候，都是不好说的事。未来不是末日，历史不会终结。磨擦肯定是有，各类冲突也断不了，就像过去和现在一样，然而它们不像、也不是“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顺便说一句，亨氏把当代大陆中国视为儒教法统的传人和主要代表，认为它已经同一些伊斯兰国家（如叙利亚、伊朗、巴基斯坦）结成了反西方的军事同盟，这在西方是很有代表性的论调。可是，在知情且客观的大陆中国学者看来，这两层意思都甚为偏颇，经不起仔细的推敲。

关于民族主义和主权国家的互动关系及它们各自在未来国际政治中的角色，教授说对了一半。他比一般人更有力地指出了近些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民族主义重要性上升的一面和主权国家地位相对式微的另一面。民族主义曾经被视为一种怪物，要么是种族主义那样的怪物，譬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要么是罩有一圈光环的怪物，例如60年代亚非拉美的非殖民化运动（今天西方仍有人认为那是一场貌似进步的悲剧（3）），总之，不是正常时期正常关系的产物；通常，这一问题不属于国际政治研究的重点。然而，今天的世界范围内民族

主义之崛起,其多变性、复杂性、严重性以及人们所能预测到的长期性,已远非任何层次单一的传统定义所能接纳。《文明的冲突》一文以生动的笔触揭示了这一问题之深刻所在,向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提醒:“这正是阁下的事务”。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里,主权国家几乎是唯一的行为主体,权力与均势,战争与和平,外交与联盟。所有话题无不涉及围绕 Nation-State 展开。而在冷战后的现实世界,非国家的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恐怖集团、当然还有民族主义)扮演了日趋重要和活跃的角色,并对古典的国家主权起着明显的侵蚀或约束作用。亨廷顿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趋向,虽然除民族及文化问题外他没有专门分析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但在选定的范围内深入探讨了国家民族(主体民族)和非国家民族(非主体民族)与主权国家的多种组合及其此消彼长的复杂联系。不过,他或许过分看重了民族的(“文明的”)冲突的作用,以至于得出它将取代主权国家的彼此争夺并占据主导地位结论。按照亨氏的理论,冲突与暴力多发生在异质文明的国家或民族之间,同质文明内部酿成对抗的可能性较小,即便出现也相对缓和且不易扩大。从逻辑上讲,这种结论和推导是不周延的,它仅能涵盖部分事实。固然,人们见到了异质间的波黑内战和同质间的俄乌和解,但同时也见到了异质间的和睦共处(如东南亚地区,还有西欧一些国家)和同质间的齟齬相煎(此类冲突的例子比比皆是,索马里甚至是非洲大陆文化及民族最同一的国家)。总体上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际政治仍然会以国家间关系及其同国际组织的关系为中轴,种族的、民族的、文明的差异只会使主权国家产生更多的裂变而不是使其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间的冲突不会超过、盖住或压倒由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实际的经济、政治利益决定的国家间和地区间冲突。如人们所见,学术界所谓的“文化决定论”和“体制决定论”(或“意识形态决定论”)各有其站得住脚的理由,在解释不同的局部时常常各有精彩之处,而一旦极而言之,成为排他性的“大道理”时,就不免失之片面和牵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说明当代国际冲突时亦有类似的情况,作为一个盛有真实画面的框架,它没有、也不可能容纳多棱体的且在不断旋转和变化的大千世界。

类似的讨论还可以继续下去。在笔者看来,《冲突》一文给人留下的思考余地和兴趣多于表面的谬误和错位。例如,作者认为从近代君主争斗、民族国家出现到冷战结束这几百年时间都属于“西方的内战”时期,在此之后也即从现在起进入“西方与非西方的对抗”阶段。正像“现代化等于西化”的说法一样,这种看法需要给予认真的、细致的、知性的批评和商榷。此一认识既是上百年来经久不衰的“核心——外围”之说的自然延伸,反映出西人居高临下、无视他人的心态,又是老大地位摇摇欲坠、危机感加剧的某种折射。从理论上解析,命题含有部分“真实的颗粒”:世界进入现代的进程端始于欧美并受其主宰,非西方文明一直充当西方殖民主义下的历史客体,现在——当非白种人创建了非欧美的现代化范式之后——才形成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同时推动和创造当代文明发展史的局面。两极格局终结之后,与东西方对抗大大缓和不同,南北关系趋于更加紧张,在原有的债务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教育问题、产品差价问题等等之上,又新添了人权问题、难民问题、环保问题、军控问题、贸易摩擦问题等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为争取自身更大利益和确立未来新秩序的斗争,如果不是“主要矛盾”,至少也是“主要矛盾”之一。文明的演进不只是质料的递增和相安无事的循环,它也包含弱小的毁灭和“血恶的厮杀”。

必须承认,亨廷顿教授确有过人一肩之处。与我们的许多“高谈阔论者”不同,他的文章是对现实世界的近距离探究(哪怕是对真实的某种斜视)。他敏锐地观察了当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并为国际政治的研究注入新的矢量。如前所述,传统的国际政治学聚焦在权力角逐、战争和平、外交方略等问题上,在观察新现实时略显局促和单薄。为弥补其不足,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理论架构和学派。比如,有侧重全球一体化问题的“相互依存理论”,有强调经济政治不可分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有专门分析国际危机的国内根源的“内战外溢说”,有依照变化了的环境重新思考国家间竞争和冲突的“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

主义”),有参照自然科学重新定义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系统论”、“博弈论”、“对策论”等等。亨氏以《文明的冲突》另辟一角,开国际政治的“大文化”研究之先河。他以文明的历史演进为主线,从当代国际政治中最令人焦灼的冲突现象入手,仔细辨别暴力对抗行为(以及非对抗行为)背后的民族情绪、大众心理、文化特质、血缘标识、宗教基础、认同层次、角色意识、地缘因素和历史渊源,力陈国际政治将受文明冲突左右的论点。无论是否赞成他的见解,你不能不欣赏他阐述自己见解的方式,不能不说他写了一篇出色的政治文化论文。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多少类似于丹尼尔·贝尔教授在当代社会学领域所做的工作;后者在探索未来西方社会的图像时,从技术分析联系到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权力中心、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相应改变,为人们理解他所说的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路。(4)从他们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宽大的历史视野。你很难——单凭文章本身——把他们划入某一专门的学科领域,他们属于那种为数甚少的集多门知识于一身的学者。

《文明的冲突》激发的不应当仅仅是民族情绪的冲突或政治见解的冲突;对学人而言,思想的碰撞(或曰“文明的冲突”)或许更为重要。笔者以为,亨廷顿的文章的一个特点,是它具有很大的弹性或延展性,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发现自己的批评点。本文乃一个侧面的考量;恰当与否,还望得到同行及读者的指教。

注释:

(1) 例如,可见:Comments--Responses to Samuel P. Huntington'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ep./Oct., 1993, Volume 72, No. 4, pp. 2-25; 关于未来全球文化冲突的讨论,(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3年10月号,总第19期,第4-35页;“文明冲突”是与非,《环球文萃》1993年10月31日。

(2)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序”,沈宗美译,三联书店1989年7月版,第2页。

(3) 见美国《时代》周刊1992年12月14日文章,题目是:《处理无政府国度》。

(4) 贝尔的代表作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商务印书馆1986年2月版。据一份权威的调查统计,贝尔教授在当代美国最有声望和影响的知识分子中排名第一,见(美)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第17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12月版。

* * *

【补记】本文即将付梓之际,新一期《外交》季刊上登出了亨廷顿教授回答质疑者的文章《假若不是文明,还会是什么?》(*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3, pp. 186-194)。细细读一遍,感觉它大体不脱“文明冲突论”的外壳,惟个别说法略有新意。为论说完整客观起见,特追补少许述评文字。

1. 关于分析的“范式”。亨氏在新作中用相当多的篇幅论述“PARADIGMS”(即所谓“范式”或理论模型)的问题,这篇文章的副题就叫《后冷战世界的各种范式》。“范式”概念最早由当代科学哲学大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确立。库恩指出,当一种范式越来越无法解释新的事实时,它将被新的范式所取代;“要作为一种范式被人接受,一个理论(在关键之处)须强于它的竞争者们,但这个理论不必、事实上也从来不用解释它面临的所有事实。”亨氏以此为自己的“文明冲突论”辩护,认为它作为冷战后新世界的一张地图,比其他范式(如两极霸权模式,三个世界模式,富国-穷国模式,自由世界-共产主义集团模式等等)更能勾勒现实的轮廓、揭示本质的特征和解读重要的事实。与此同时,他也承认“文明范式”有不能涵盖和说明的地方,例如伊拉克同科威特的战争以及巴以和平协议等重大事件。在笔者看来,亨教授的这番说法,比头一篇文章中的断语更高明一些;它从侧面证明,理论

(或“范式”)有可能是多样的,关键在于论者观察问题的角度,而理论(或“范式”)的多样性恰恰是我们这个世界之复合而多元特征的折射。至于亨氏“范式”本身的创意及缺失,前面已有探讨,在此不复赘述。

2. 关于对“文明冲突论”的批评。亨廷顿在复文中主要回答了两种质疑意见:一种意见强调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功用,“文明并不控制国家,国家控制文明”。亨氏认为,文明与国家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函数关系,上述说法仅仅在二者间建立起某种人为的和不相干的对立;民族国家尽管保有很大作用,它们总是隶属于国际政治中的某个主导因素:在冷战时期,它们隶属于三个世界中的某一个,在后冷战时代,它们隶属于众多文明中的某一个。在我看来,教授对批评者意见的解释有偏差,“民族国家主导说”不是要使文明同国家两种范畴对立起来,而是想说明,以国家现实利益为基石的主权国家的行为不完全决定于或主要不决定于文化或种族的差异,这种行为引导着国际关系。另一种意见建立在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认为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社会将朝着更大规模的合作与协调的方向演进,而不会加剧彼此间的冲突。亨氏对此评论道:“普世文明只能是普世权力的结果。罗马帝国曾经在有限范围内创造了类似普世文明的东西,西方曾经以殖民主义的形式在19世纪、美国则依靠其霸主地位在20世纪把西方文化及价值观念扩张至现代世界的大部分角落。”此一论点及其论据有部分的合理性,它揭示了权力政治的本质和世界大同论或世界正义论的不足(亨氏称后者是“一种非现实的选择”),但是,争夺霸权和相互冲突也绝不是各国走向21世纪的唯一抉择,看不到经济全球化的作用及由此带来的国家间进一步协调和合作的可能,同样会导致判断上的误差。

3. 关于美国的种族问题。与一些批评者的想像不同,亨廷顿教授亦把美国作为文明冲突理论的一个事例。他指出,当今美国社会也面临日益增大的种族分裂的压力。据估计,到2050年,美国总人口中将有23%的西班牙裔人、16%的黑人和10%的亚裔人,也就是说,近半数的美国人将具有与传统的美国人不同的文化背景。他问道,到那时,传统的美国人奉为圭臬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和民主还能受推崇吗?假如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发展到相当规模,美国的政治团结和民主制度还会存在吗?若美国变成非西方国家,历史将走向何方?在他看来,美国的种族冲突乃现实而可怕的危险。亨氏的这番话当然是从西方的利益出发,反映出美国时下流行的一种孤立主义情绪。从另一方面说,亨教授讲出这样的话,也需要某种勇气,因为在美国历来人们对谈论种族差异和分裂问题讳莫如深。不过,依笔者管见,半个世纪以后的美国究竟是“熔炉”的火比较旺一些,还是“裂变”的力量更大一些,尚属不确定之事,更不遑论美国的“非西方化”。至于说到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再过50年,不仅美国人的看法可能有变化,其他地方的人同样会有变化,变化后的观念既可能更加冲突,也说不定比较接近。这里又回到了有争议的问题上:世界是通过发展趋同?或是在冲突中解构?它是一个大题目,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多方面经验的证明。亨廷顿教授的大作只提供了一种可能,并非“盖棺论定”之作。

《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塞缪尔·P·亨廷顿及其“文明冲突”论

【注释】承蒙亨廷顿教授将当时尚未出版的《If Not Civilization, What?》一文手稿供作者参考，特此致谢。【注尾】

徐国琦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历史系

塞缪尔·P·亨廷顿系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及约翰·M·奥林战略研究所(John M. Oli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所长。曾在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为当时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左右手。并经常担任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部门角色。政治上，他以保守出名。曾因支持越南战争及卷入诸多中央情报局研究项目等原因，一度被人斥为“疯狗”及“学政复合体成员”(academic-political Complex)(1)。学术上，他以当代马基姆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自诩(2)，一向以提出极具争议的观点或理论闻名于学术界。他的十来种学术著作大多探讨当代重大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的理论问题，在学术上颇多建树。

亨廷顿的第一本重要著作《士兵与国家》(*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哈佛大学出版社1957年初版)，便是探讨军民关系方面的一流理论专著，甚至在其出版30多年后的今天，仍被权威军事史家爱德华·科夫曼(Edward M. Coffman)誉为“挑战性著作”，值得任何军事史学者参考。(3) 1968年出版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则集中研究各种政府类型(专制型、独裁型、民主型、准民主型等)如何维持政治稳定问题。他在书中提出一个著名原则：“国家之间的最重要的分别不在于其政府形式，而在于统治的程度”。(4) 该书出版后，风行一时，不少学者及政界人士备加推崇。80年代后期，亨廷顿又把目光集中到当代各国民主化问题，并于1991年出版《第三次民主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该书认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共出现了三大民主浪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26—1926年间。包括美国在内的近30个国家踏入了民主进程。全民普选为其主要标志。发生在1943年到1962年间的第二次民主浪潮，促成20多个国家跻身民主社会之列。1974年的葡萄牙革命揭开了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序幕。该浪潮至今仍方兴未艾。亨廷顿的结论是，这三次浪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曲折性，即高潮之后总伴随退潮。但世界民主化的总体趋势是以“进两步，退一步”模式前进。导致第三次民主浪潮的主要原因是：(1) 威权政府失去其统治基础；(2) 经济发展；(3) 宗教的作用；(4) 国际政治的变化；(5) 民主化的“滚雪球”效应。在亨廷顿看来，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出现主要是内部因素而不是外界影响促成的。他还强调文化因素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影响，认为某些文化为儒家文化、伊斯兰教义等具有反民主倾向。

从以上所介绍的亨廷顿三种代表著作可以看出，他善于把握重大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亨廷顿的这一特色的最新体现便是他发表在《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的《文明的冲突》及该刊同年12月号的《后冷战世界的范式》二篇著名论文。在这两篇文章中，亨廷顿精心

思考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亦即未来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什么?意欲成为新时代的乔治·F·凯南〔5〕可能是亨廷顿撰写上述两篇文章的主要动机。

—

1989年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指导美国外交政策40多年的“遏制战略”因此过时。“冷战时期许多熟悉的模式及规范(亦)应抛弃”〔6〕。时代呼唤新的“X先生”。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写道,新时期的乔治·凯南,“您在何方?”〔7〕许多学者及政客在1989年后都想成为新凯南,纷纷撰文,提出对后冷战国际关系模式的形形色色的解释。如“单极时刻”论〔8〕,“民族国家衰落”论〔9〕,“不再有主要战争”论〔10〕等。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美国前国务院官员,现在兰德公司任职的富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The end of History)。福山最早在1989年夏季号的《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抛出这一观点。他的这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广泛注意,到1991年止,至少有14个国家翻译出版了这一文章〔11〕。1992年,福山进一步将其观点引申,并出版成书。书名是《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纽约1992年版)。

福山的主要观点是,冷战的结束,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体系等赢得彻底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与西方对立的其他意识形态体系的失败。因此哲学意义上的长期意识形态的冲突及进化告一段落,大国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可能也将不复存在。后冷战时期政治家要解决的是冷战遗留下来的一些“技术问题”。长期以来的人类冲突因此宣告终结。追求自由成为人类的主要奋斗目标。在此必须指出,福山所指的历史终结局限于一定地区,在部分区域,历史还在重演。但福山坚信,这种仍在重演的历史之终结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

遗憾的是,福山虽然探讨“历史终结”这一极具挑战性问题,但他的论述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分析,而是哲学意义上的论证。其思辨框架缺乏历史证据,甚至出现史实错误。更有甚者,他用来支持自己论点的所谓“历史教训”,许多站不住脚。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直言,福山“根本就错了”。〔12〕

“历史终结”论是1989年西方朝野普遍存在的盲目乐观心态的产物。可惜这种乐观并不能持久。1990年后的国际关系发展证明,人类并没有像福山宣称的那样“回到黑格尔时代”,黑格尔的理论也没有完全战胜尼采的哲学。血淋淋的历史仍在重演。根据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资料,1992年全世界的军火开支高达6000亿美元,一年内发生了29次战争。战火中死亡人数达17年以来最高纪录〔13〕。由此可见,冷战的结束不但没有带来所谓太平盛世,反而使各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经济诸方面的争夺更趋复杂、尖锐。“历史终结”论的说法如同思想史中的“回到柏拉图时代”,“大同世界”等说法一样,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对于上述包括福山理论在内的诸多说法,亨廷顿统称为“结束主义”(endism)。他认为这种“结束主义”的主张提供了歌舞升平的假象,是“危险的、富有破坏性”的理论。亨廷顿尤其不同意福山的分析。指责其“历史终结”论有两大错误。一是过分强调历史的可测性及时间的永恒性,二是忽视了人性的弱点及“非理性”因素。〔14〕在亨廷顿看来,1989年以后出现的所有“结束主义”的观点,虽然不乏部分真知灼见,但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甚至中心的因素”。〔15〕这一因素即是亨廷顿极力渲染的所谓“文明冲突”。亨廷顿对他“发明”的“文明冲突”论津津乐道,颇为得意,以为发现了理解未来国际关系的秘诀。他除了在《外交季刊》夏季号隆重推出其理论外,为扩大影响,又在1993年6月16日《纽约时报》专栏版刊出其中心观点,并在接受《新观点季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等媒体采访时大力宣传他的“文明冲突”论。(16)《外交季刊》进一步推波助澜,在1993年10月号上刊登部分知名人士同亨廷顿商榷文章,在12月号上发表亨廷顿的答辩文章。《外交季刊》还将以极快的时间出版《文明冲突》论单行本(包括反驳亨廷顿的文章)。一时之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如野火春风,席卷世界各地,震动各国朝野。影响之大,实所罕见。

二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是,后冷战时间的世界主要冲突之源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文化方面的冲突。虽然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仍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角色,但国际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之中。这种“文明冲突”“将决定未来的国际政治”,(17)是人类历史到达一个新阶段的必然结果。

根据亨廷顿对历史的理解,他把国际关系史划分为四个时期。1793年前的国际冲突主要是君主之间的正统之争、领土之争。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国际关系史的第二个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是国家利益冲突,侧重于经济、主权、领土、军事上的斗争。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兴起,国际关系进入第三个阶段。意识形态的冲突取代了国家利益冲突。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经历了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共产)主义,自由民主制度与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冲突等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进一步上升到代表完全不同文明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斗及冷战。1989年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及苏联的不复存在,国际关系进入亨廷顿所谓的第四阶段,即后冷战时期。在后冷战时期,历史并没有结束,冲突依然存在,但冲突的性质及根源出现了巨大变化。亨廷顿指出,后冷战时期的主要冲突与前三次有显著不同。前三次冲突都是在一个文明体系(西方文明体系)内发生的,但未来的冲突将明显超出西方文明范围,沦为所谓“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冲突(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西方文明唯我独尊的局面将受到其他文明的强烈挑战。亨廷顿建议用文明的属性来划分世界。认为冷战时期留下来的“三个世界”的说法似已过时。文明的因素将成为压倒一切的国际冲突之源。亨廷顿甚至断言,“未来的全球冲突将是文明冲突”,“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的话,将是文明之间的战争”。

什么是“文明”?亨廷顿的定义是,“文明是一个文化的实体”,“是民族之间的最高文化组合及最广泛层次的文明认同”。(18)根据这一定义,亨廷顿认为目前世界上存在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为什么文明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并成为世界主要冲突之源呢?亨廷顿认为,随着各国的经济现代化及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人类的民族国家认同感将逐步消失。文化及宗教力量将日趋增长,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巨大的“非西方化运动”(de-westernization)。(19)这种“非西方化运动”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的理由是:第一,文明差别是人类的最基本的差别。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社会及文化价值观。他们对人与上帝的关系、公民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与群体关系、家庭与社会关系、夫妻关系等看法都有天壤之别;第二,随着人类的技术进步,世界正变成一个地球村。不同文明之间的人民互动及交流的频繁,加强了各民族自身文明意识的觉醒;第三,目前西方文明已达到顶点,并全力把自己的价值观向世界各地推销,这必然要与其他文明发生正面撞击,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明冲突;第四,人类的文化差异及文明特征是最难消除或妥协的。既然文明之间的接触势在必行,文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第五,世界正出现地区经济共同体趋势,如欧洲共同体以及可能出现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均属这类地区经济主义范畴。这种地区经济主义的出现也必然会增大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亨廷顿指出,文明冲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冲突指毗邻群体之间的领土或统治权之争。广义上的冲突系指代表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在军事、经济、宗教等各方面展开的生死搏斗。随着西方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的影响衰落,西方文明也必然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由经济、军事冲突引起的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文明对抗。

三

亨廷顿对自己的“文明冲突”论自视甚高,认为它是目前国际关系方面最佳理论。他在1993年12月号的《外交季刊》文章中咄咄逼人地写道: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之源,“如果不是‘文明’的话,又是什么?”并直截了当地称其理论建立了“后冷战世界的范式”,〔20〕俨然以新时代的“X”文章主人自居。诚然,亨廷顿的理论有许多可取之处。例如,他公开承认文明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时,采用“双重标准”。他也毫不掩饰西方国家以公正为名,行霸权之实的行径。认为联合国安理会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所作的决定都是出于西方自身利益的考虑,但总以反映各国愿望的姿态公诸于世。“西方实际上利用国际组织、军事及经济力量统治世界,维持西方的优势”。〔21〕亨廷顿理论的最引人入胜之处是它注意并强调各国文明的差异,并从文化角度解释国际冲突问题。然而,其理论的最大弱点也在于此。

事实上,从文明角度分析国际关系并不是亨廷顿的首创。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即有文明冲突一说。到19世纪,有关文明冲突的说法已如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在现代,尝试用文明因素解释国际关系,更是大有人在。例如,著名政论家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正陷于文明冲突。这种冲突也许会摧毁世界。其中干系最大的是两种文明,即大西洋——地中海文明与太平洋——亚洲文明,它们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

〔22〕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自80年代初即尝试从文化角度来透视国际关系,认为国际关系实际上是文化关系。〔23〕他在1981年出版的《权力与文化》(*Power and Culture: 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 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以及1992年问世的《全球模式中的中国与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the Global Setting*,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论著都是入江昭在这方面探索的结晶。《权力与文化》一书着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美关系。作者的结论是,日美两国兵戎相见的结果是双方发现彼此目标相近,对战争与和平的构想方面也趋于一致。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冲突,是入江昭与亨廷顿之间的明显不同之处。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白鲁恂(Lucian Pye)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曾用文明的概念来分析国际政治。他写道,“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一种文明”。“外界在对付这种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文明理应相信自己的乐观天性,并尽力与中国的这种独特社会建立联系”。〔24〕与亨廷顿过从甚密的布热津斯基最近也屡次宣称,在后冷战时期,现代地缘政治冲突已不复存在。目前与未来的国际问题的症结是文化和哲学上的,而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问题。〔25〕

亨廷顿是不是最先提出“文明冲突”论者,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该理论是否言之成理。依笔者看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虽不乏精辟见解,但漏洞亦多。例如,“文明”一词是亨廷顿理论的关键词,但亨廷顿对该词的解释颇值得商榷。根据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文化学专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说法,文明主要指已固定下来的社会生活状态。强调某种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是“文明”定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6〕但亨廷顿为了能自圆其说,有意将文明静态化,好像文明尘封多年后,仍能依然如故。孰不知文

明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亨廷顿甚至忘了自己在别的地方曾写过，“有关某些文化永远不变的说法理应受到怀疑”。〔27〕亨廷顿应该比别人更清楚，文明的兴衰是历史早已证明了的事实。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曾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罗列过世界上存在的20多种文明，而在今天，其中许多文明早就绝迹了。

“文明”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能绝对化。我们不会因为奴隶制在美国独立后仍存在近一个世纪这一史实，就断定19世纪美国文明是一个奴隶制文明。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世界上某些地区或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许多非民主成分，就断言它们不能最终民主化，不能同西方文明兼容。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是曲折的，是一种渐进的过程。亨廷顿自己是研究世界民主化过程的权威，他深知民主化是一个世界性趋势，“现代世界的总趋势一直是民主政府的日益增多”。〔28〕亨廷顿另外又写道：“从历史上看，文化是动态的，而不是僵化的，一个社会的主流信仰及态度也是会转变的”。〔29〕由此看来，未来的世界应更趋于一致，而不是出现文明的冲突才对。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文明”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亦即文明不仅仅指亨廷顿所说的八大文明，文明的含义应包含现代文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等。〔30〕如就“文明”的地缘含义而言，实际上早在15世纪以后，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已发生冲突了，而并不是像亨廷顿所说的现在才开始。文明的地缘含义，充其量只是一个概念（idea）而已，包括亨廷顿在内，大概谁也不能明确指出“西方文明”的地理分界线。所以，笔者认为，单从地理上谈文明，是不科学的，理应包括文明的现代含义，即把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现代化等作为文明定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文明的现代意义看，根本不存在什么文明的严重冲突。因为追求现代化、工业化等成为各国目标，亨廷顿所谓的八大文明，在这一意义上将殊途同归。

正因为亨廷顿对文明定义有意割裂，并将其模糊化、简单化，他的八大文明说颇有牵强附会之嫌。例如，他无法划分日本“文明”的归属，干脆把日本列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特文明。殊不知所谓“日本文明”实际上是东方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综合体。代表了所有非西方文明的前进方向：文化上保持自己特色（非西化）的现代化。

亨廷顿的“文明”显然不是理解国际冲突的锁钥，难怪当他用“文明冲突”论来衡量国际关系时，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例如，亨廷顿在解释日本为什么不能像德国在欧洲、美国在北美那样，在亚洲领头建立一个类似经济圈时认为，日本难以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日本文明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文明截然不同，彼此很难合作。事实上，真正原因恐怕要比亨廷顿所能理解的要复杂得多。但“文明”类别并不是主要的。笔者认为，至少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日本难比美国、德国，它除了其经济、科技实力外，在地缘政治中的比重也要小得多，日本的综合国力不足以在亚太地区领袖群伦。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亚洲国家的集体记忆。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正视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本质，一味欺骗舆论、漠视正义、混淆视听，致使许多历史问题至今未得到解决（如正式道歉、赔偿受害人损失、停止在教科书中玩弄文字游戏等），造成亚洲国家无法信赖日本。毋庸置疑，相互信任是任何一个经济共同体建立的基础。

“文明冲突”论的另一个欠缺是亨廷顿对事实解释采用双重标准。例如，他根据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贸易就断言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手对抗西方文明。如果亨廷顿把军火贸易作为文明冲突的佐证的话，那么，他又如何解释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这一事实呢？按照亨廷顿的逻辑，是否应把美国向许多“非西方文明”国家或地区出售军火解释为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合作呢？亨廷顿对此讳莫如深，因为这一事实明显与其“文明冲突”论格格不入。亨廷顿援引的另一个例证是1993年9月份国际奥委会选择悉尼而非北京。认为委员会根据文明归属投票。文明的分界线决定了投票的结果。当然，亨廷顿没错，西方国

家(包括亨廷顿本人)反对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并不择手段达到目的。但西方国家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基于政治、经济上的考虑,而不是文明的冲突。西方不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强大的中国出现。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现象不知亨廷顿是否注意到了。台湾当局在奥运会投票前正式表示不支持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理由是一个强大的大陆会使台湾在国际舞台上更无回旋的余地。这里已毫无文明冲突的踪影了。

亨廷顿在自己“文明冲突”论中采用回避事实或采用“双重标准”的作法还有一些其他事例,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亨廷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缺憾?原因之一便是以上述及的,他太强调文明冲突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另外就是“西方中心观”在作怪。他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就是这一“西方中心观”的反映,该理论并不是从学术角度考察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着意于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上,进而为西方国家出谋划策。在后冷战时期,西方权力的传统杠杆如军事、外交等逐渐失去效力,其他国家(或用亨廷顿的术语,“非西方文明”)正致力于国家建设,大力发展经济,加强现代化建设。使西方国家普遍有一种失落感。因为西方经济一直疲软不振,雄风不再,只好利用抽象的“文明”冲突(如人权等)来批评他国。这种现象在近期中美关系中尤为明显。难怪《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唐·奥伯多佛(Don Oberdorfer)最近注意到,“奇怪的是,华盛顿近来关于中国的许多言辞似乎与生机勃勃的北京及东部沿海城市的都市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美国在处理对华政策时似乎比日趋务实的共产主义国家(指中国。——引者)更意识形态化。这实在是一个讽刺”。(31)西方国家这种盲目自大又缺乏自信的“包围心态”(a siege mentality)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体现非常明显。(32)似乎世界永远由西方主宰才叫“正常”,才叫“文明和平相处”!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另一个缺陷是其未能跳出冷战思维模式的窠臼,冷战术语“我们”与“他们”对立与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实乃同出一辙,并无轩輊。因此,“文明冲突”论在理论上并无重大突破和建树。借用专栏撰稿人布鲁斯·纳萨拔姆(Bruce Nussbaum)的一个名词来说,“文明冲突”论充其量只能称之为“后冷战之冷战”的理论而已。(33)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最大弱点是其忽视市场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影响。经济、科技之争而不是抽象的文明冲突,将成为未来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冲突之源。贸易问题又成为世界性的大问题。著名军事战略问题专家爱德华·N·卢特瓦克(Edward N. Luttwak)甚至创造一个专有名词“地缘经济”(geo-economics)来描述经济问题已取代政治沦为国际政治中头等问题。(34)他写道,所谓“地缘经济学”,即“商业文法中的冲突逻辑”。他甚至以“(理解)战争,阅读贸易”为题撰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论述贸易冲突的严重性。(35)

《纽约时报》所发表的一篇赞成卢特瓦克观点专文指出,“过去的军事及外交之争已被与经济有关的竞争及同盟所取代。在这个全球一体化市场上,类似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便反映了新时代的潮流”。《纽约时报》甚至断言,“广而言之,如果在后冷战时代存在一个新体系,存在可取代冷战时期的东西方集团新的团体的话,那么,它似乎不应该是联合国会员国或固定的多边贸易,而应是贸易共同体”。(36)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最近也指出,新时代的新体系是贸易联合体。他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便是向该方向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37)

也许用贸易共同体,而不是“文明”,更能准确描述未来世界冲突,也更符合事实。按亨廷顿的说法,欧洲与美国同属西方文明,似应属一条战线。但目前的趋势是双方在贸易上的摩擦可能严重影响欧美之间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美国正重新思考其国家取向,并逐步向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靠拢。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便正式宣称,“西欧不再是世界的最重要区域”,美国过去在处理全球事务时“太欧洲中心化”了。(38)表示要同亚太地区接近,因为当“我凝视亚洲繁荣之花,便看见美国复兴之果”。(39)美国国务院分管东亚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更是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与内政之间的关联在亚洲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显得密切”。（40）美欧关系因为贸易摩擦已受到严重影响。如，法国把美国的关贸总协定谈判视为“掠夺成性的美国商业及文化帝国主义的同义词”。（41）美国最近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经济事务中，已有明显脱欧入亚的趋势，并以亚太地区压欧洲在经济上让步。”（42）

是“贸易”而不是“文明”是国际事务中主轴这一论点，还可从克林顿总统的近来表现看出。他可以在波斯尼亚、海地、索马里等外交事务中让步，但对于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问题，一直立场坚定，决不让步。”（43）因为他知道经济贸易是调整“美国面向未来”的最后底牌。（44）

关于经济冲突的严重性，亨廷顿事实上在其他地方有清楚的认识。他在1993年春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将导致政治、经济利益的严重对立”，“在未来的岁月中，美国与主要大国之间的严重冲突可能在经济方面”。（45）另一文章中，亨廷顿写道，日美未来的关系中，存在“经济冷战”可能，因为“日本的策略是经济战争的策略。”（46）亨廷顿甚至同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经济（冲突）是另一种战争的继续”的说法。（47）为什么所有这些明智的看法在亨廷顿撰写文明冲突论时都不见了呢？

四

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人类唯有合作才能生存。许多问题如温室效应、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等，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亨廷顿对此置若罔闻，仍在“文明冲突”论中重祭冷战大旗，鼓吹人类对抗，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易把世界引入歧途。其理论比“历史终结”论更危险、更有害。例如，亨廷顿多次鼓吹西方同中国的未来对抗，实在荒谬绝伦。中国占世界22%人口，只有世界上8%的资源和7%的可耕地。在世界上人均可耕地面积少于中国的只有孟加拉和埃及。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国，理应支持中国利用这有限的资源解决占世界近1/4人口的温饱问题，支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不应多方阻挠，更不应以所谓文明冲突的理由妨碍中国的现代文明进程。殊不知，中国一旦失控，将是全人类的灾难。正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所说的，“由于中国的比重，……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地与中国同一条船上”。（48）

1987年亨廷顿在就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会长时发表的主席演说中讲道，凭他多年研究政治学的经验，得到的第一个教训就是，“不要因为政治学家想做好事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做到了”，也许“他们可悲地发现自己意图实现无望”。研究政治学最基本的戒律是，“拯救政治绝无灵丹妙药”。（49）我们也许相信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并不完全是出于标新立异，出于要做新时代的乔治·凯南的动机，也许他真的想要找到一条理解人类冲突的捷径，可惜他的“文明冲突”论只是一条死胡同。

注释：

（1）有关批评亨廷顿政治倾向的诸多评论，可参阅以下几篇文章：Jared Diamond, "Soft Sciences are Often Harder than Hard Sciences," *Discover*, Aug. 1987, Vol. 8, pp. 34-37; "Scholars Bite Mad Dog," *The Nation*, May 9, 1987, Vol. 244, p. 595; Fred Zakaria, "Blood Lust in Academia: the Professor's Uendetta," *The New Republic*, July 27, 1987, Vol. 197, pp. 16-18; Ezra Bowen, "The Posse Stops a 'Softies', Scientists Blackball A Political theorist," *Time*, May 11, 1987, Vol. 129, pp. 76-77; Eliot Marshall,

"Academy Rejects Huntington Nomination," *Science*, May 8, 1987, Vol. 236, pp. 661-662.

(2) 亨廷顿对自己欲充当现代马基雅维里的野心, 一直坦承不讳。可参阅: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reface, p. xv.

(3) Edward M. Coffman, "The Long Shadow of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Jan. 1991, Vol. 55, No. 1, pp. 69-83.

(4)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

(5) 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 美国方面冷战精神之父。他在1947年以“X先生”笔名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苏联行为的基础》, 为“遏制战略”提供了理论根据。

(6)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尔科姆·沃勒普语。见 Malcolm Wallop, "America Needs A Post-containment Doctrine," *ORBIS*, Spring 1993, Vol. 37, No. 2, p. 187.

(7) *Boston Globe*, November 1, 1993, p. 5.

(8) 关于“单极时刻”论的详细介绍, 可参阅拙文《美国在危机中》(《美国研究》1992年第1期)第144页。

(9) 该论点主要认为,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全球主义”和“部落主义”的结束, 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相应衰落。

(10) 该观点认为, 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随着冷战结束而不复存在。约翰·穆勒是该观点的主要提倡者, 参阅 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9.

(11) Ellen K. Coughlin, "Author Revisits Disputed Thesis about the 'End of Histor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 8 1992, Vol. 38, No. 18, p. A8.

(12) William H. McNeill, "History Over, World Goes On,"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 26 1992, p. 14, Col. 1.

(13) *Boston Globe*, November 10, 1993, p. 17.

(14) Huntington, "No Exit: The Errors of End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89, p. 10.

(15)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Vol. 72, No. 3, p. 22.

(16) "The Islamic-Confucian Connection,"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Summer, 1993, pp. 19-24.

(17)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 22.

(18) Huntington, "The Coming Clash of Civilizations-or, the West Against the Res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93, Sec. 4, p. E19.

(19)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 27.

(20) Huntington, "If Not Civilizations, What Paradigms of the Post-Cold War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December, 1993), pp. 186-194.

(21) 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zation", p. 36.

(22) Theodore White, An Offering of History to Men Who must Act Now," *Harvard Alumni Bulletin*, May 13, 1967, p. 4.

(23) 参阅 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Feb. 1989, Vol. 94, No. 1, pp. 1-9; Iriye,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June 1990, Vol. 77, No. 1, pp. 99-108.

(24) Lucian W. Pye,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0, Vol. 69, No. 4, p. 58.

(25) Zbigniew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ieth-First Century*, New York, 1993; 同时可参阅《新观点季刊》记者对布热津斯基的采访。见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Summer, 1993.

(26)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83, pp. 58-59.

(27) Huntington, "A new Era in Democracy: Democracy's Third Wave," *Current*, Sept. 1991, No. 335, p. 36.

(28) Huntingto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Winter 1992/1993, p. 10.

(29) Huntington, "A new Era in Democracy: Democracy's Third Wave," *Current*, Sept. 1991, No. 335, p. 37.

(30) 关于“文明”一词的详细含义,可参阅: Keywords William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p. 59; Fer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English translated by Richard Mayne), New York, 1993; John Laffey,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ed*, Black Rose Books LTD., 1993; B. D. Nag Chaudhuri ed., *New 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ndian Society*, 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1990.

(31) Don Oberdorfer, "Replaying the China Card",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7, 1993. p. c3.

(32) Kishore Mabbubani, The Dangers of Decadence,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93, p. 10.

(33) Bruce Nussbaum, "Is That Old-time Religion the New World Order" *Business Week*, Sept. 27, 1993, No. 3338, p. 60.

(34) Edward N. Luttwak, *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How to Stop the United States from Becoming a Third Worl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Economic Struggle for Economic Supremacy*, New York, 1993.

(35) Luttwak, "For War, Read Trad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an. 29, 1993, No. 4687, p. 22.

(36)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1993, p. A24.

(37)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1993, p. A24.

(38)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 1993, p. G4.

(39) *The Harvard Crimson*, November 18, p. 4.

(40)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7, 1993, p. G4.

(41)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1993, p5.

(42)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 1993, p. A16.

(43) 有关克林顿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立场,有详见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 1993.

(44)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7, 1993, p. A1; November 24, p. A17.

(45) 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pring 1993, Vol. 17, No. 4, p71.

(46) 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p. 75-76.

(47) Daniel Bell, "Germany: the Enduring Fear. A New Nationalism or a New Europe" *Dissent*, Fall 1990, Vol. 37, No. 4, pp. 461-468.

(48) Perry Link,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10, 1993, p. 8; 有关生态问

题、环境问题等重要性的论述，可参阅 Uaclav Smil, *China's Environmental Crisis: an Inquiry into the Limit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1993; Smil, *Global ecology: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ocial flexibility*, London, 1994; Kennedy, Paul,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1993.

(49) Huntington, "One Soul at a Tim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Refor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1988, Vol. 82, No. 1, pp. 3-11.

论点摘编

罗斯福“新政”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刘绪贻

(武汉大学历史系)

1983年，我在《世界历史》是年第2期上发表了“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一文，论述了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这篇短文，拟根据现在我已收集到的资料，对罗斯福“新政”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进行初步探索，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30年代空前严重经济危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应付办法，都是大力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国情不同，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一样。大体上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德、意、日的纳粹型或法西斯型，即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实行疯狂扩张的类型。季米特洛夫在第7次共产国际会议上的报告中称之为：金融资本中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和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它是一种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以美国“新政”为典型的类型，即“福利国家”类型。

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曾得逞于一时，但它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失道寡助，必然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中遭到毁灭。这正是德、意、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亦即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的命运。由此可见，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终是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的。只有“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到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请参阅刘绪贻：“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历史教学》，1981年第9期。日本著名进步经济学家大内力教授运用“资本积累从根本上说意味着劳动力隶属于资本”的论点，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请参阅〔日〕大内力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破产》中译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第2章。还可参阅〔苏〕西瓦切夫、雅济科夫：《美国现代史》，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1980年，第125-129页。）

“新政”还不仅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1933年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说，“你已经使自己成为各国力求在现有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信托人。”

“如果你失败，合理的改革办法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损害，只好让正统观念和革命去互相厮杀出一条路来。”

“如果你成功，各地将进行新的更雄心勃勃的试验，而我们也可以把你任总统之日起作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

如我们在《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所论述，既然罗斯福从事的这场战争，也就是“新政”是有成就的，所以它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影响。其“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它成功地使如此众多的美国人、欧洲人相信：民主改革可以代替极权主义的制度。”（阿朗索·L·汉比编：《“新政”的分析与解释》，Alonzo L. Hamby, ed., *The New De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纽约，朗曼公司1981年版，第4页。）加拿大理查德·伯内特政府1935年初起实施的关于社会立法的纲领，被反对派谴责为“伯内特的新政”。虽然伯内特纲领受到攻击，但加拿大“有些省的确引进了类似于“新政”立法的法律。”（〔加〕威廉·J·麦克安德鲁：《加拿大、罗斯福与“新政”：就美国30年代改革试验来看加拿大人对改革的态度》，William J. McAndrew, *Canada,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Canadian Attitudes to Reform in Relation to the American Reform Experiments in the 1930's*,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1967年未发表博士论文。）1935年3月至1937年10月比利时的保罗·范齐兰的国民统一政府，被反对派谴责为“盲目抄袭美国的‘新政’。”1936年5月到1937年6月执政的第一届法国人民阵线初期实行的社会改革，被称为“法国的新政”。1933年3月22日，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下议院说：“仅在几个星期以前，任何注视美国形势的人，只能心怀极其沉重的忧虑。今天有新总统的倡导、勇气和智慧，已经发生了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变化。新的有希望的感觉和对于未来的期望正在回到美国人民心中，这种信心正在伦敦引起反响。……”（查尔斯·T·哈利南：“欧洲人看罗斯福”，Charles T. Hallinan, "Roosevelt as Europe Sees Him", 载《论坛》杂志第Lxxxix卷，1933，第348页。）英国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关于失业与复兴的决议，敦促英国政府效法罗斯福实行“新政”；1935年，英国自由党的戴维·劳合·乔治在罗斯福“新政”的鼓舞下，又要求英国实行“新政”，先后被保守党政府拒绝。但是，广大群众很是不满。因此，一俟战争结束，1945年7月大选时，刚刚领导英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丘吉尔政府就被赶下台，宣称将实行重大社会改革的工党取得了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强大工人运动面前，不得不把“福利国家”当作施政目标，也就是实行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罗斯福“新政”对战后日本、德国的影响更为明显。1987年，美国出版了《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一书，它的作者是西奥多·科恩。科恩是美国对日占领计划的制订与执行者之一，他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证明：美军以盟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在日本实行的占领政策，是严格按照占领军总司令、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945年9月18日及10月22日分两次收到的美国秘密命令制订的。这个训令原名“对盟军总司令在日本投降后初期占领与管制日本的基本训令”，其编号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它“在形式和语言上是军事的，在精神和实质上却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代的产物。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首的司令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多年以来不接触美国政治潮流的日本人更难想像到个中情况。不过，日本人无法避免如此强大胜利者的时代思潮对他们这个战败国的影响。”（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 美国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FS）

科恩还切实证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是在陆军民政事务处处长约翰·F·希尔德林具体组织下拟定的。这个处里有几个能干的“新政”派：欧内斯特·格罗斯少校、戴维·马库斯中校和查尔斯·卡迪斯中校。与此训令密切相关的，还有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远东小组委员会，和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参谋班子。前者的具体负责人是约翰·C·文森特，后者的具体负责人是埃德温·马丁。两人都是“新政”派，马丁更是热烈的“新政”派。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初稿是格罗斯、文森

特、马丁三人起草的（马丁后来说格罗斯是主要起草人），还经过“新政”派宠儿、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仔细润色。后来虽然经过修改，但最后文本仍是一种改革方案。“这种激进改革的方向，是‘新政’……的思想和经验提供的。政治民主长期以来已经是每个美国人一致皈依的信念，但通过政府行动扩大经济所有权、鼓励工会、拆散过大企业、消灭——读为清洗——‘为富不仁’者、加强家庭农场所有制，这些都是‘新政’的政策。”（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 美国自由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页。）

科恩认为占领军对日本的改革取得相当成功。它促进了政治上的民主，加强了日本普通人民的公民地位；实行了经济民主，为日本现时大规模消费社会奠定了基础。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艾森豪威尔的第1067号对德占领训令，也是“新政”派拟订的。1942年，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被任命为经济战委员会主席之后，任命马克思·洛温撒尔为他的副手。洛温撒尔在该委员会建立一个经济制度研究部，其人员完全由“新政”派充任。第二位继洛温撒尔职务的艾伦·罗森堡知道国务院有关部门不能向希尔德林提供他所需要材料和意见，就主动向他提供一系列按“新政”方针草拟的对德占领的“民政事务指南”。1944年8、9月间，罗斯福总统在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请求下，否定了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对德占领手册。这个手册是根据国务院与英国协议拟订的，它几乎没有提到非纳粹化的问题，还主张保留德国工业机制。陆军部长亨利·L·史汀生根据罗斯福指示另拟一个方案，最后从希尔德林那里得到一全套经济制度研究部所拟的对德民政事务指南。总统看到这份指南后，基本上是满意的。10月间，希尔德林的民政事务处拟订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1067号、即给艾森豪威尔的对德占领训令初稿。这就是希尔德林民政事务处拟订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380/15号训令的样本。许多人参加了两份训令的草拟工作，所以两份训令的内容有许多是相同的。

拉丁美洲也受到“新政”影响。“1936年，罗斯福旅行到南美时，他发现自己被当作‘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像偶像一般地受人崇拜；他的‘新政’成为拉丁美洲所需的改革样板。”（威廉·洛克滕堡：《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新政”，1932-1940》，William E.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 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3，第208-209页。）

由上所述，足见罗斯福“新政”不独通过大力加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还为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样板，帮助它们通过同样途径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这就是说，罗斯福“新政”在世界历史上地位，是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唯一可行途径，即大力发展非法西斯式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罗斯福“新政”

李存训

（武汉大学历史系）

自从罗斯福推行新政起，美国政府就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信贷和劳资关系等各个

方面实行广泛的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政策,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除兴建大批企业外,它的调节和管理还更深入地渗入所有主要经济部门。主要表现在:联邦政府建立一系列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机构,统管战时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大批军事工厂;联邦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达到巨大规模;国家直接控制工资、物价和房租;战时对外贸易和国际国内交通运输业务全部由联邦政府控制;国家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管理和支持;总之,战时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并具有军事性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罗斯福把争取战争的胜利与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两者分开,认为对付30年代的大萧条主要靠“新政医生”,而对付战争危机主要靠“胜利医生”。大敌当前,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新政医生”应该让位于“胜利医生”。

1943年12月8日,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时,他幽默地说,自1933年以来,“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指30年代大萧条)医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1941年12月7日碰到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于是它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这个外科专家。(约翰·布雷曼等编:《新政》第一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70页。)因此,自1939年1月至1943年底,在这整整5年期间里,除1941年8月12日,罗斯福同丘吉尔一起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保证当时处于殖民地状态的所有民族将在战后获得独立;1941年1月6日,他致77届国会年度咨文中,强调美国对“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义务;1941年6月25日,总统颁布第8802号行政命令,成立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并重申一切人员,不分种族、信仰、肤色或籍贯,全部参加国家防务计划的政策外,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提出其他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战争虽然基本上巩固了“新政”成果,但却未能将“新政”的社会经济改革推向前进。其主要原因是,罗斯福政府在战时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

作为一位战时总统,罗斯福认为,要打赢这场战争,更可取的办法是:暂停国内改革,号召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自由派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压制社会改革精神,联合各阶级进行战争,这将使企业家在政府中恢复权势,并有使新政的一切社会改革前功尽弃的危险。他们争辩说,利用战争可以推进社会改革,利用改革可以最充分地动员美国人民的智慧与道义力量,激发群众的战争热情。罗斯福不赞同自由派这些分析,认为这样就会疏远那些企业界领袖,而那些企业界领袖的合作对战时的军工生产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种疑虑严重地限制了罗斯福在战争期间本来可能进行改革的意向。

1942年初,罗斯福拒绝了一委员会劝他改善种族关系的所谓“早熟”的建议。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开始赢得这场战争……然后再为将来拟订总体规划。”(约翰·布雷曼等编:《新政》,第1卷,第270页。)他力图避免导致脱离“战争现实的规划”。“我深信,在这个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美国历史杂志》第55卷(1968-1969),第105-106页。)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道:“哈里·霍普金斯把指挥战争摆在任何其他一切事情前面。就他而论,战争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我的丈夫也持类似观点”。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新政使美国人民具有战斗精神,战争也会继续推进新政。既要彻底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又要继续为少数民族权利而斗争,同时也应该为战后扩大保健计划奠定基础。

何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看不到战争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呢?美国学者戴维·布罗迪认为,主要是新政缺乏全面改革的蓝图。新政本质上是反应性的。大萧条给予它以方向和动力。欧

战爆发迅速消除了促使新政采取行动的因素。随着1940—1941年失业人数急剧减少和1943年失业现象实际消失,随着1943年农民购买力比1939年几乎增加一倍,随着1939年工业生产达到创纪录水平,战争开支解决萧条后果,美国出现战时繁荣时,他们就觉得好像改革没有迫切必要了。《美国历史杂志》第55卷(1968—1969),第271页。)

布罗迪的上述分析是有一定说服力的。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甚至对自由派发动的改革也不积极支持。1943年6月,国会中的自由派发起一场改革运动。他们提出了要求推进国内改革的瓦尔纳—默里—丁格尔法案。该法案建议全面修订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使那些领域国有化;改善救济金发放制度,并扩大现有计划发放范围;增加强制性保健保险,为退伍军人提供抚恤金。尽管该法案迅速成为新政派争取战后前途的希望焦点,但罗斯福政府未给予它以任何支持。

国会中保守派力量的加强,是导致战时美国国内改革陷于停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38年11月国会选举结果,共和党在中部和远西部取得巨大成功,在参院得到7席和众院得到8席;自1932年以来第一次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在下届国会中,罗斯福总统极需南部民主党人支持他的外交政策。他不能冒险在国内改革问题上再与他们为敌,把他们赶到共和党人那一边去。因此,他在1939年1月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除请求继续实行赤字开支直到复兴以外,他不要求再制订新的改革立法,第二次新政改革运动陷于停顿。

罗斯福本人在1940年总统选举的成功,没有改变国会中新政派和保守派力量的对比。1942年中期选举,新政派损失更为惨重。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增加47席,在参议院增加9席;而且,民主党人在北方损失,相对地加强了南部民主党人的力量。

1943年1月第78届国会组成后,许多南方民主党人站在共和党人一边,形成国会中的保守派多数联盟,并左右立法方针。这届国会以极端仇视新政而引人注目,它力图尽量迅速消除新政影响,并撤销了与新政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机构,包括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公共工程署(Public Works Adm)、全国青年署(National Youth Ad)、缩减了农场保障局(Farm Security Ad),并阻挠战时情报局散发那些表示同情少数民族的小册子。

在至关重要的税收问题上,保守派控制的国会迫使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削减税收。罗斯福进行了反击,否决了1944年税收法案,因为该法案降低了公司和高收入者个人的税率。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他都避免同国会进行消耗精力的斗争,允许保守派暂时取得反对新政的一些小胜利,只要这些胜利不致危及新政的核心。

1943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对同盟国有共同决心打赢这场战争充满了信心。战场形势的好转又重新激发了他的改革热情。他认为,“除非国内这里安全,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就不存在真正的个人自由。“贫困的人不是自由的人”。因此,“我们现在就有责任制订计划,以确定赢得持久和平的战略和建立比前此任何时候更高的美国生活水平。”

1944年1月11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宣称根据该项法案可以为所有的人——不分地位、种族或信仰——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和繁荣的基础。

这些权利包括:

有在国内工厂、商店、农场或矿山从事有益的工作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挣得足以提供充足衣食和娱乐的收入的权利;

每一个农场主有生产和出售产品足以保障自己和家庭在生活上过得去的权利;

每一个商人,不分大小,都有在自由的环境中从事贸易,不受国内外垄断集团不公正竞争的控制的权利;

每一个家庭拥有体面住宅的权利；
人民有获得充分医疗照顾和有机会获得并保持健康身体的权利；
享受充分保障，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病、事故和失业的权利；
获得良好教育的权利。

所有这一切权利都意味着安全。而在这次战争打赢以后，我们必须准备在实现这些权利中进而达到新的人类幸福和康乐的目标。（巴顿·伯恩斯坦、艾伦·马图索编：《杜鲁门政府，一部文献史》，纽约1966年版，第89-90页。）

罗斯福总统的传记作者詹姆斯·M·伯恩斯评论说：“这是罗斯福总统一生中发表的最激进的演说。以前他从未如此直率和大胆地陈述所有美国人的经济权利，以前他从来未如此明确地把对着政府的旧的政治权利法案和通过政府获得的新的经济权利法案联系起来。”（詹姆斯·M·伯恩斯：《罗斯福：自由战士》，纽约1970年版，第425-426页。）

1945年1月6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重申一年前提出的美国经济权利法案是为所有的人建立一个安宁的繁荣的新基础；强调在这些经济权利当中，最基本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他权利能否实现的是：充分就业。反过来，美国公民的其他经济权利如果得到实现，就会对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作出重要的贡献；强调联邦政府必须——在各州、各市、企业、劳工和农场的帮助下——保证这些权利成为现实；“在战争期间，我们实现了充分就业”，“在战后，我们必须在政府履行和平时时期职能的情况下维持充分就业”，这就将需要为每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工作的人解决工作——而这意味着差不多是6000万个工作岗位。（《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6页。）

罗斯福总统在战时不断地高举经济权利法案的旗帜，大大地有助于巩固新政的成果。他告诉反对新政的宿敌，丢掉一切拖延改革的幻想，协商同意接受新政的条件。当然，要使经济权利的概念变为国会的立法，有一段长距离的路要走。但是，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已为战后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为1946年的就业法铺平了道路，为健康、教育和住房改革指明了方向。哈里·杜鲁门总统很理解经济权利法案的精神和实质，并认为实现罗斯福总统留下的遗产是他的光荣使命。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关于内政问题的综合性咨文中，重申了已故总统罗斯福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强调这个经济权利法案概括了美国“在各项长期计划中所追求的国内经济的目标”，决心在战后美国经济生活中为实现这些权利而努力。这个咨文中的许多建议，“可追溯到1944年竞选运动期间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拉尔夫·德·贝茨：《近代美国史》，第2卷，第41页。）

综上所述，罗斯福“新政”使美国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都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战争前期，罗斯福政府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因此，自1939年1月至1943年底，基本上就没有提出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新政医生”虽然让位于“胜利医生”，但“新政”并没有消亡，“新政”成果在战时基本保留下来。战争后期，罗斯福总统不断高举经济权利法案的大旗，大大有助于巩固新政的成果，并为战后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中美贸易中双方的利得分析

【注释】本文讨论的是中国大陆与美国的经贸关系问题，不涉及台湾。【注尾】

韦 伟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

中美贸易中的不平衡的问题在这两年突出起来，据美方统计1992年中国对美出口了256.8亿美元的产品，美国向中国出口了74.4亿美元的产品，美方贸易逆差为182亿美元。中国方面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美方统计中的相当一部分系从香港转口进入美国的，这并非为中国直接向美出口。据中国方面统计，1992年中国的美国出口额为85.9亿美元，从美国的进口额为89亿美元。双方统计差距如此之大并引发了争论。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香港转口造成的影响。中国认为香港转口的产品不应算是中国对美的贸易额，而美方坚持的原产地计算将其归入中国对美的出口。本文作者对这争论的意见是，以中方的统计看，是不能全面反应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情况；而从美方的统计看，又有夸大中国产品美国市场的一面。但是，中国产品大量进入美国无疑是一件好事，这表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美国的消费者带来巨大的好处。这也是中美经济关系更加密切的标志并对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重点分析以下几点：

(一)大量廉价的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使得美国消费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况下省下大笔的开支。据计算分析，中国的国民收入中资本的收益和劳动的收益各占一半。(#FF请参阅《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模型》(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一书中第四章第一节。另外，在邹志庄教授所著的《中国经济》一书中第四章也有讨论。#FS)而在美国劳动的收益占75%，资本收益的占25%。(保罗·萨缪尔森著，高鸿业译：《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中册，第222页。)由此我们做出一种推断，假如某种中国商品价格是100美元，那么其中资本和劳务的收益各占一半，都是50美元。假定两国资本的收益不变，并假定商品无价格弹性，生产的数量相同，那么在美国生产同样的商品其售价就应是200美元。如果我们不考虑运费和关税等，那么中国商品在美国销售其售价只有美国商品价格的一半是很合理的。如按上述情况继续推理下去，并假定所有的商品都是消费品，那么1992年中国在美出售的256.8亿美元的商品就为美国的消费者们节约了256.8亿美元的开支。也就是说美国的消费者们在少花了256.8亿美元的情况下享受了与原先相同的福利。(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并非全是消费品，其中也包括工业制成品。工业产品的应用自然也会降低工业生产的成本。上述推算仅是为说明问题而作的假设。)据香港报纸指出，如美国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则美国消费者要多付160亿美元。

(二)中国商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有利于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通过统计资料的分析可以发现，在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初期，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很高的，而80年代中后期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与此相伴随的是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大幅度提高。在此期间，美国进口商品中来自亚洲的部分增加量最大。80年代中国，日本，亚洲四小龙对美出口都大量增加。

增加进口可以平抑本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国际经济学的一般原理。美国的经济表现又一次验证了这个原理。中国劳动力成本历来低廉，以中美双方的统计资料对比考察发现，中国劳动力的平均成本仅约是美国劳动力平均成本的1/65。如以1991年的数字为例，19

91年中国工业界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一年2424元人民币,以当年外汇官方汇率折算成美元为年工资率为456美元,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年工资大致为29000美元,两者之比为1/64,中国工人工资只有美国工人工资的1/64。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可以使得中国商品以很低的价格进入美国市场,无疑这对平抑美国的物价起到积极作用。这又等于增加了美国人的实际工资。

(三)由于大量低价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节省了美国消费者的大笔消费开支,相应使原来的开支转化为储蓄。近些年来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一直显现下降趋势,私人储蓄率仅在5%左右。以1992年为例,这年的私人储蓄约为2126亿美元。如果我们假定美国消费者把因买中国商品而节省下来的钱全部转为储蓄,则美国私人储蓄中的大约7.5%是由中国商品进口而取得的。这对美国的投资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方面在中美贸易中的利得分析。

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增加中国的就业起到促进作用。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出口激增,说明对美贸易是有利可图的。大量港商、台商进入中国大陆办企业,生产出口产品,吸引了大量中国劳动力,据香港报纸指出,仅中国华南地区就有300万工人从事出口商品的生产。

以中方统计看,1992年对美出口约占中国对外出口额的10%左右,自美方进口额约占中方总进口额的11.5%。美国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据中方统计显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食品,轻纺产品及原材料上。这些产品大部分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有利于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对中国转化剩余劳动力提供了有利条件。反观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产品,主要以大型成套设备,计算及电子设备,化工原料,化肥,粮食等几大类为主。大部分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从中美双方的贸易产品上看,其特点很符合比较利益的原则。中国产品进入美国是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样,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起了帮助作用。

中美贸易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作为拥有占全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经济是不应长期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的。中国有着潜在的巨大市场,在世界经济处于相对不景气的时候,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使中国市场的潜力得以发挥,无疑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刺激作用。

通过对外经济交往和中美贸易,中国的贸易环境也有了较大改善。从1980年到1992年,贸易环境量由0.92上升到2.20。贸易环境量的改反映了中国出口贸易抗干扰和自我调节能力的提高。

如果采用强制手段来抑制中美贸易的发展,将会对两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据认为如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美国将失去20万个工作机会,还会影响到美国在华投资的4300个项目,美国飞机工业也将大受影响。估计在未来10年,美国飞机工业在华的投资将是110—150亿美元。

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也将更加密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会对亚太地区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明智的选择应是发展中美贸易关系而非限制或压制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

克林顿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

陈克容

(中南财经大学投资系)

克林顿上台后,他所面对的是复苏缓慢的美国经济和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和改善的经济问题。从目前克林顿提出的主张和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来看,我认为,克林顿经济学的主旨就是:以充分就业、长期经济增长、财政赤字、国际收支逆差为政策目标,实行既要积极发挥政府职能又要充分重视市场作用的折衷主义路线。具体内容包括:在短期内采取能够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措施。1993年政府将增加联邦开支300亿美元用于基建项目、教育、医疗以及向市镇的拨款等。对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在税收方面予以鼓励。对长期来说则要着重从消费转向增加投资,积极创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同时要削减联邦赤字,为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基础。克林顿在其“经济振兴计划”中提出要在四年内增加税收2460亿美元,同时限制联邦开支,将预算的增长限制在经济的增长水平之下,并争取将年赤字3340亿美元减少一半。他计划投资1600亿美元用于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等方向,着手进行全国统一电脑信息网等工程建设。他还将实行推广成年人教育制度和革新教育、改进医疗保健制度,并且要在4年内创造800万个新工作岗位。此外,减少美国国防开支也是一项重要内容。

从克林顿的经济政策以及他的主张来看,可以说,克林顿经济学实质上是对里根经济学的否定。它一反过去“政府应尽量减少对经济干预”的主张,重新回到了强调“政府参与经济”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上来。但是克林顿经济学基本上是一个多种学派的“综合”。它并没有要像肯尼迪那样专一地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也没有像里根、布什时期比较明确地以供应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主张为基石。这种“综合”是与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主义和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互相渗透相关联的。现在,人们对于货币因素的重要性、顽固的失业问题、为解决“结构性”失业而提升地位的人力资本政策以及普遍重视国家长期规划的作用等方面逐渐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共识。这种“综合”也是建立在总结战后凯恩斯主义和里根经济学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基础上,对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经济思潮所作的“折衷”。这种折衷主要表现在:

①克林顿立足于长期经济发展,把政府干预放在促进投资和削减赤字上,而削减赤字是和凯恩斯主义把“赤字财政政策”作为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概念意义相反的。政府干预则不同于新自由主义,但削减赤字又比较符合他们对传统“健全财政原则”的主张。

②克林顿主张增税,而且主要是增加富人的税收。这实际上否定了“利益逐层渗透”的理论。克林顿重新提出公平负担原则和主张实行“有权得益经济政策(Entitlement policy)”,即认为美国人都应有工作,人人有权享受医疗保健和接受教育,它强调个人的权利而不是工作机会;进行税制改革和扩大政府开支一样,都是要用来谋求预算平衡。与此同时,克林顿也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因而他也强调要提倡竞争。

③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府失败论”,改变以往自发调节产业结构的政策,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来加强以交通、通讯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实行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政策。

④宏观经济政策并不局限于一般总量的总需求管理或总供给管理,而是强调结构性调节,把重点放在促进投资而不是消费上。

此外,克林顿经济学所主张的增加政府对普及教育、人才培养和职工培训的人力资本投资则反映着宏观经济学的普遍的共同主张。

由于克林顿经济学才刚刚出现,因此虽然从理论上和根据以往实践而作出的判断来看,它似乎是比较现实的,能比较确切地反映美国经济的现状和特点。但是克林顿经济学对付美国长期以来形成的结构性问题以及摆脱“四高”局面的成效如何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未知数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①联邦财政赤字的控制以及削减的绩效;②对投资的需求以及消除高失业率而使人们建立起来的信心;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④国内外经济的结构性发展平衡。

从短期来看,克林顿经济学出现了不少矛盾,这主要表现在:

①克林顿主张削减赤字,其措施是一方面紧缩了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开支以刺激经济复苏。这个矛盾再加上对赤字的把握历来是个难题,因而容易让人想到1985年《格拉姆—拉德曼》法案的流产。不过,人们也许可以认为这种矛盾是暂时的,并且在当前美国经济条件下如果是暂时地使赤字增加也会有好处。保罗·萨缪尔森就对“暂时赤字增加刺激失业率下降”保持信心,其理由是:“当成功的反衰退计划扩大总收入,从而增加社会积蓄时,总投资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如果我们能有效使用长期闲置的资本和失业劳动力,我们将有更多的属于美国的资本品以增强1997年美国的生产力。”(保罗·萨缪尔森:“克林顿最优可行性方案”,《国际市场》1993年5月17日。)

②大幅度削减军费而造成的失业问题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相矛盾。由于军工工业是美国重要的部门之一,军费的削减必然带来军工业的萎缩,这将使许多工人失业。在短期内,必将加大克林顿解决失业问题的难度。

③医疗保健计划不仅加重小企业负担,不利经济复苏,而且也将增加政府开支,削减赤字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这就是说,处在形成过程中的克林顿经济学仍迫切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它所奉行的折衷主义路线的经济政策更需要尽可能地“综合”各派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博采众长,总结经验。与此同时,在经济学方面,这种“综合”正是表明经济学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现在,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产权学派、新制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合理预期学派和供应学派等各种形形色色的理论都不能简单地胜任宏观经济学的需要。只有“创立”这样一门“经济学”——在各个流派观点的基础上,构造一个适合的框架来综合各种学说流派的观点,并且根据战后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在“反危机”和治理“滞胀”局面的经验基础上对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加以兼收并蓄,克林顿经济学才有可能比较成功地解决问题。

书 评

为美国开药方

——介绍莱斯特·瑟罗新著《21世纪的角逐》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

莱斯特·瑟罗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和斯隆管理学院院长。

在国际上颇具盛名。自60年代以来,他先后写出了13部专著,大都很有影响。他的近著《21世纪的角逐》(1992年出版)一出版便在美国、欧洲及日本引起轰动,被列为美国非文学类畅销书,该书中文版由我组织翻译,1993年10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分析世界问题,为未来的21世纪勾画轮廓的。在对世界的分析中,作者提出了许多深刻、新颖和发人深省的观点。全书共分九章,有两章是专门论述美国的,其中一章分析美国现存的问题,另一章为美国未来提供竞争和发展建议,限于篇幅,这里只想对这两章的内容做一些评介。

美国失去了“长城”的保护

瑟罗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较长时间内,美国生活在“长城”的保护之下,这个“长城”是由五个方面的压倒优势筑成的:一是拥有规模很大的市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了大规模制造业;二是大批人才流到美国,从而拥有技术优势;三是教育发达,工人拥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术;四是富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高于其他国家;五是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管理和一支熟练的中高级管理队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城”内外都在发生变化。外部的变化是西欧、日本迅速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在收入水平上开始赶上美国;西欧通过成立欧共体和建立统一大市场、日本通过进军世界市场创造了规模市场和规模经济。内部的变化是:美国的工艺水平优势减退,研究和开发投资比例下降,低于德国、日本等国家,仅居第五位,专利发明和申请排在日本之后;尤为突出的是美国教育上的结构性问题变得严重,普及教育水平下降,培养的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减少,对劳动力的技术投资少,不适应高技术生产的需要;对投资产生严重影响的是美国的储蓄率很低,在21个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储蓄率是最低的,约为日本的1/2,欧洲的2/3。现在,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率还不及60年代的一半,美国的管理人材和经验也已经不再明显优于其他国家,在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在职培训等方面,美国都排在10名之后。在分析了上述诸多方面的问题之后,瑟罗认为,“这一切变化的意义很简单。美国已不再是生活在它的长城后面,长城倒了!”“美国必须适应这一严酷的现实”。

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分析和结论,瑟罗详尽分析了八个领域里的情况。在信息工业,美国是微电子工业的发源地,在60、70年代曾占世界半导体市场的60%以上,但如今已降到不到40%,在世界三家为首的商业半导体公司中,没有一家是美国的,计算机市场首为美国独霸,但现在日本已成为最强的竞争对手,尽管美国仍在大型计算机市场拥有优势,但竞争将会加剧。飞机工业首是美国的天下,但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把越来越多的市场抢走。在消费性电子工业,美国节节败退至湮没无闻的地步。在钢铁工业,美国错过了上次技术革新高潮,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市场缩小,美国能否重占优势取决于能否在未来的材料方面充当技术带头人。在化学制品工业,美国公司在世界最大的生产商中名次大大排后,美国公司只能充当小赛区里的选手,参加大型竞争的只有杜邦公司一家。在纺织工业,美国在低工资生产方面无法竞争。德国人对纺织业的新技术、新设备进行了大量投资,生产质量更高的产品,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投资远不如德国,美国的纺织工业要生存,就必须改变旧的思想方式。在汽车工业,美国是大规模生产的发明者,但美国的产量如今只屈居第三,从出超变为600多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成为造成美国贸易困境的主要因素。90年代初,在美国市场上,10种最受欢迎的汽车中,只有2种是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生产的。在机床工业,60年代中期美国还是净出口国,到80年代中期,进口机床占美国机床市场的一半。美国的机床工业落后于日本、德国,正在瓦解。

瑟罗揭示了美国的大量问题,但并不是说美国一无是处,已彻底衰败,而是说“已丧失它在20世纪后50年内曾拥有的强大的领先地位,在即将到来的世纪里的胜负将取决于它能在何等程度上学会做由欧洲人和日本人规定的新的经济竞赛。”“美国的问题是,它不是在

取胜——而是使其明白，竞争已发生变化——必须用新的战略按新的规则来进行新的竞争。”

为了使美国人认识现实，瑟罗博引旁征，真可谓是用心良苦。他引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主席阿塔利的话说，“美国人还不相信自己已经落后于工业化世界中最发达的国家。由于持这种固见，他们就不会为保持竞争性而做必要的改变。”他警告说：“要等到历史的定论很清楚时才采取行动，那是非常危险的。当1900年世界其他国家看起来已超过大英帝国时，英国人决定等等看，看这种情况是否真的发生了。事情真的发生了，至那以后，英国人在赶超上一直不成功。一个国家要是有志于为其未来提供保证，那么聪明的做法是，假设最坏的情况已经出现，尽早开始采取保持领先地位的措施。”

暴风雨来，要做好准备

瑟罗认为，世界变了，外部的现实要求美国内部也要改变。“不愿意面对现实，就不会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面对事实就意味着为实际已经存在的经济困境作准备。”

瑟罗为美国开列的强身药方是一个很长的单子。概括起来，有以下几项内容：

其一，限制消费，增加储蓄。对于美国人来说，第一步是在私人生活中改掉不储蓄的习惯（借钱购买消费品）；第二步是在公共生活中改掉不储蓄的习惯（靠政府的赤字）；第三步是采用大力鼓励储蓄和抑制消费的税收制度；第四步是建立激励私人投资和大量政府预算用于公共投资的机制。“为节制消费开方，就要从联邦税收制度着手。”“美国应设计出一种税收和开支体制，使公共和私人开支的增长慢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1%。”瑟罗认为，最理想的是“实行增值税，以鼓励出口和抑制消费”。为一个四口之家的头1000美元消费设立补偿性收入税信贷，对增值税实行累进制。把税率提高到与收入中不储蓄的那部分（消费）相等的水平，以便征得同等数量的政府收入税收入，应对储蓄免于征税，使累进收入税变为累进消费税。应取消工薪税，以鼓励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取消公司收入税，以刺激对生产上的投资。应提高消费者用以抵押贷款的现付金额，以限制消费大于收入的抽取储蓄的行为。总之，“要使税收制度能继续为投资和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和长期的激励机制。”

其二，更新技术，提高劳动力队伍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公司不能靠压低工资的办法来提高竞争力，而要靠技术方面进行大量投资，培养一支具有较高技能的劳动力队伍。美国应改进自己的教育制度。教育改革应集中于对进入大学的学生加强数学和科学教育，为大学毕业生建立起第一流的技术体制。为在校的中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应提高中学教师的工资，延长授课时间。应设立鼓励公司对工人进行培训的制度。首先是工人在加入劳动力队伍前应接受很好的教育技能，然后公司应在培养工人的具体技能上进行投资。为了鼓励公司对劳动力肯花钱培训，政府可以制定要求公司企业把1%的销售收入用作培训的法律，可以从纳税中扣除这部分投资费用。作为一种替代办法，社会保险制度应从医疗保险和老年养老金扩大到包括青年的培训。人一生下来就以其名义开设一个培训帐户，用于中学毕业后的培训。在有生之年，个人可以用这笔钱支付大学培训费用，偿还可以通过工薪税扣除的方式进行。

其三，创造企业集团，增强竞争能力。美国资本主义需要一次换心术，需要把已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心脏的金融交易家除掉，换上能成为美国工业再生心脏的真正的资本家。美国所缺少的是真正的、老式的资本家。要把今天的短期金融交易商重新塑造成明天的长期资本主义建设者，应鼓励股票投机商、金融机构成为真正的机构性资本家，使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依赖于其经营工业公司的能力；应鼓励他们造成一种金融形势，即除非把他们所投资的公司办成功，否则他们自己就不能得到利益；应改变金融和工业之间保持疏远关系的状况，让他们变得命运不能相分。关键是改变金融管理规定，允许金融机构在工业公司里拥有股份和工业公司在金融机构里拥有股份，创建类似于日本或德国那样的企业集团，美国公司应结能与德国和日本企业集团相抗争的战略联盟。

其四，应该制定国家战略。美国应改变法律，让公司结盟联合，用国家工业政策来给予

支持，采取进攻性姿态，以美国的战略对抗外国的国家战略，以牙还牙！应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对阻止美国产品进入的国家给予反击；美国的竞争计划应大大超出研究与开发政策，对发达国家的工业政策，美国应针锋相对，政府应制定一种明确的、但有限度的工业政策；应做出决策，明确地补贴一些部门，尤其在高技术领域，应有战略性措施。

瑟罗认为，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未来一代将失去世界一流的生活水平。美国的问题虽还没有严重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但是，“美国人应该意识到，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解决。如果连这种意识也没有，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小问题现在不加以解决，会变成大问题，将来再解决就困难了。”应该说，瑟罗并非是具有忧患意识的第一位美国学者。很长时间以来，不少人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美国存在的问题，但是像他这些系统分析问题而又开出一整套医治病症的药方的学者并不多见。他的许多分析都可以说是击中要害的，如教育问题、储蓄问题等等。他提出的许多对策也是具有战略眼光而又具体切实可行的。然而，在他的药方中，也有带有毒性的，像“以牙还牙”，“硬对硬”的保护主义做法，对世界的发展是不利的，其严重危险是，如果真的“针锋相对”，争相实行对抗和保护，那么世界就会陷入一场混乱，最终损害了美国，也损害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令人欣慰的是，历经七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已告胜利结束，这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放环境，对下一个世纪世界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当然，美国本身的问题还在。正如瑟罗所说的，重要的是“如何使美国自己知道应干的事”，暴风雨来了，该做好准备，“换上合适的衣服了”。

(Lester C.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William Morrion Company Inc., 1992.)

一个美国史研究者的足迹

——评邓蜀生著《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杨玉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是人民出版社邓蜀生编审新近贡献于学界的一部文集，也是继《伍德罗·威尔逊》(1982年)、《罗斯福》(1985年)和《美国与移民》(1990年)之后一部全面反映其学术成就的代表性著作。作为美国史研究的后来人，笔者深深为它所吸引。就个人体验而论，我以为，《美国历史与美国人》是一部很值得读、同时也很耐读的书。

—

邓蜀生是当代中国老资格的美国史研究专家之一。早年自复旦大学毕业后，风流倜傥的他搞过新闻采访、编辑和国际时事评论。翻开50年代的报刊，“邓超”之名常常见诸其间。“邓超”是邓氏当时用过的笔名之一。除了大大小小的文章，他还写过篇幅不一的五六种书，

包括中国人写的第一本反映朝鲜战争的书也是出自那时风华正茂的邓蜀生之手。后来，他改作人民出版社外国史的编辑。《美国历史与美国人·自序》说，“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史成了我新的工作对象。算下来，涉猎美国史领域也有30年了。”在这30年间，敢想敢说敢做的他，有过挫折，也有过欢欣，更多的是成功。60年代初，邓蜀生发表了他认为是研究美国史的处女作——《威尔逊与中国》。这篇刊载于中国最享盛名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的长篇论文，虽说今天看来“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其遣词造句不无“尖刻”之嫌。然而，只要顾及30年前中国整个的学术氛围，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就毫不奇怪了。事实上，它仍不失为建国后30年间中国大陆学者公开发表的美国史领域的代表性论文之一。也正是职此之故，当80年代初杨生茂教授主编《美国史论文选（1949—1979）》这部综合性文集时，公正地选收了《威尔逊与中国》一文。此次邓自己编个人文集时，也收了进来，并且如“自序”所说，“为了存真，在编入文集时未作改动”。由此即可约略看出作者尊重历史的求实精神。

邓蜀生的求实精神，当然并非仅仅表现于此。其实，就《美国历史与美国人》而言，于细微处，无不洋溢着这种精神。举一个例子：对罗斯福新政的重新研究，邓氏是开拓者之一。他的《罗斯福新政述评》（1980年），系统讨论了新政的方方面面。该文明确提出，“罗斯福的‘新政’有它的一定的积极方面”。正是靠了“新政大夫”，美国才得以度过1929—1933年的空前大浩劫。以此为契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得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也喘过气来了。这就使得‘新政’能够在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获得它一席之地”（第83页）。这在今天已纯然是常识了，但在十几年前尚未完全松绑的学术环境下，邓公能一反过去的“定论”而立一家之言，肯定不是像如今我们读这段话时这般轻松。《罗斯福与孤立主义的斗争》（1979年），也是一篇重头文章。读者由此可以看到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如何在当时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苦心经营，终于使孤立主义思潮弥漫的美国成为“民主国家的伟大的兵工厂”。即使这样一篇《复旦学报》破例连载的有根有据、言之成理的论文，据信当时亦曾有人以为作者可能“美化了罗斯福”、“忽视了他的帝国主义本质和绥靖主义的作为”云云。这一并非个别的例子一再说明：史学认识的更新和创见，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静下心来想想，几十年来，我们为此转了不知多少个弯，也吃了不知多少苦头。可悲的是，至今仍不时有人开着不大不小的“工厂”，动辄给人加上个“帽子”什么的。然而，举凡有学术良心的人都不难发现：离开这种创见与更新，自己不越也不允许别人越雷池半步，难道能说服自己？难道能说服别人？不仅口服，而且也心服？

二

研究美国的移民历史，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这是邓蜀生为我国美国史研究拓殖的一个新天地。他对美国移民政策、美利坚民族同化模式、美国华人历史的考察与思考，尤其卓识。这组论文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发表后，或者被转载（如《新华文摘》），或者被摘载（如《文摘报》），有心之人无不视为佳作。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反证是，由于邓氏此一方面的论文写到了家，有人甚至于干脆在自己所谓的“专著”或“论文”中照搬或改编（不甚雅观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抄袭）。单就笔者耳闻目睹，就至少有一部所谓研究美国近代移民问题的“很有价值的专著”用整整一章的篇幅差不多抄尽了《美国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其动因》一文，还有某家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杂志发表的一篇看上去很像是“重头论文”的文章（题目上了封面，且配之以英文），其实亦系抄袭该文而成。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笑话，但是事实。作者在《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中收入他这一方面的7篇文章，作为读者，似不可不读。若作书评，亦很值得评论。考虑到我已专门为邓著《美国与移民》写过书评（参见《美国研究》1993年1期），故兹不赘述。腾出篇幅，我们多说几句别的。

时下学历史、研究历史的人，大致都不太爱读历史方面的书或文章，更不用说是一般人了。这乍听起来有些玄乎，甚或危言耸听，但事实的确就是如此。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创刊于1978年、国内唯一的世界史学术园地——《世界历史》，1993年的订数仅有700来份，这在人口十几亿之巨的泱泱中国，岂不真是可怜到家了吗？说“史学危机”，喊了几年了，似乎仍难见起色。也可以奢谈“史学繁荣”，但大约无非是聊以自慰而已。对目前的史学窘况，可以人言言殊。细究起来，亦确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靠读历史、学历史，在当今铺天盖地的“下海潮”中恐怕很难发财，起码是发不了大财。“孔方兄”这宝贝玩意儿把人们搅得不仅晕头，而且转向。“厚黑发财学”之类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那些蹲在“史坑”的书生：靠历史能来几张钞票？学历史的，于是乎，要么“转业”，要么“第二职业”，要么“怠工”，再不就是“苟延残喘”、“不死不活”。试想，学都不学了，还读哪门子历史？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这并非个别的例外。再从史学自身的现况看，无庸回避的是，也有许许多多的致命弱点。比如史学论著老气横秋，死气沉沉，不用说读内文，单看着标题就让人皱眉头。谁若不信，只需翻翻那些八股式加老太婆式的所谓论文或者甩出一套套新名词、腾云驾雾、不知所为何物的所谓著作，心中多少就有些底了。历史本来是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形象丰满的，不知从何时起被人阉割得七零八落、干干巴巴。读起来，味同嚼蜡，非但没有味道，而且是直倒胃口。历史要吸引人，除了客观的大环境亟待改善外，就主观而言，史家的文风、学风也必须改进。唯有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格调清新的史学作品，才能赢得而不是失去读者，才能使史学走向而不是脱离大众。也只有这样，历史学本身才能踱出低谷，重焕生机，“再度辉煌”。

邓蜀生不愧是大家手笔。这位记者出身的美国史专家，行文轻松，运笔自如，潇潇洒洒。读他的东西，不仅不觉得累，而且可以说是美的享受。收入文集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国历史上的杰出总统》一文，不失为邓氏风格的典范。自30年代中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内，中国人写这位美国政治大家的作品（文章、著作）者，不可谓不多，然真正揪住读者阅读欲求的是邓蜀生。他以生花之笔，为我们绘声绘色地刻画了身残志坚、无所畏惧、融胆略和权术于一身的世界伟人F.D.罗斯福的新形象。该文篇幅不大，但写美国历史人物能锤炼到此种境界的，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起码是不多见的。读者要是感兴趣，我倒建议不妨多拿出几天工夫，找出邓蜀生的《罗斯福》细细一读。上述文章只是这部一版再版的名人传记的引言。单此一篇，是解不了渴的。

三

在我国大陆硕果尚存的美国史元老中，大多都在高校或在研究机构（如黄绍湘、杨生茂、刘祚昌、刘绪贻、丁则民、罗荣渠、汪熙、丁名楠），唯有邓蜀生例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干的是“编辑这一行”。其实，这也正是他的特点。改革开放十几年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已大大地不知上了多少个台阶，其标志之一就是有关著译作纷纷问世。作为一名资深编辑，邓蜀生靠其天时、地利、人和，在美国史著作出版方面尤其贡献良多。大家所熟知的有价值、有影响的著作，像《美国内战史》（刘祚昌著）、《美国通史简编》（黄绍湘著）、《美国外交政策史》（杨生茂主编）、《战后美国史》（刘绪贻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丁则民主编）等，无不都是由邓氏亲自担任责任编辑的。在出版业不景气、以所谓经济效益为最、史学著作出版难的今天，能够持之以恒地为出版学术精品而奔波、操劳，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愈是在如今，我们愈是需要像邓公这样以学术为重、有出版家气度的编辑。事实上，也正是靠了这些默默无闻的“催生婆”的奉献，我们的学术界才得以顽强地保留了一片净土，一块绿洲。这是我们的文化事业的希望之所在。

邓蜀生不是一般的编辑。多年从事编辑工作的经历与体验，使他愈发意识到“编与写很

难分开”这一至理真言的份量。他在文集的“自序”中是这样总结的：

要编好书，必须知书，要深入下去，知识要尽可能广博，还应成为所从事的工作的某一方面的内行。做到了这一点，就更能与作者有商有量，相互切磋，平等交往，不强加于人，也不屈于别人之所强加。

编辑整天同书稿打交道，只要肯钻研，就会心有所得，有所得也就会产生形之笔墨的愿望，编辑与作者一身二任的格局就很自然地形成。我这本文集就是我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的过程中所作努力的反映。

读了以上自述，再去读《美国历史与美国人》，就会另有所悟。在某些人看来，编辑无非是剪刀加浆糊，剪剪贴贴；或者如人们常所形容、但未必贴切的“为他人作嫁衣裳”。邓蜀生以其学术造诣和实绩再次证明，这纯粹是误会。编辑未必都是内行，但不是内行的编辑在很大程度上很难说是好编辑。事实上，古往今来，真正能成就大事业的编辑家，往往本身就是大学问家。惜乎时下有些干编辑行当的，只是眼睁睁地盯着“孔方兄”一个劲地“捞”，什么一身二任，什么编辑兼作者，统统抛诸脑后。我虽非杞人，但仍为此而忧。

邓蜀生先生为了实现“作为编辑而争取成为美国史领域的内行”这一宿愿，身体力行，脚踏实地，终于走出了一条有口皆碑的成功之路。他不仅写了大批文章，而且先后出版了数部专著，还编辑了几十种有价值的图书，并合作翻译了若干名著。用邓氏自己的概括就是，“或编或译或写”。这部《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

四

不知何故，近年来我不知天高地厚，陆陆续续写作、也发表了一些书评。虽说没少招惹了是非，但仍冒傻气，颇有“痴心不改”之慨。又因为是学美国史、教美国史的，所以对有关美国史的书评每每特别倾心、关注。可惜好此道者不多，年轻人中，南开的李剑鸣、东北的梁茂信都是有书评面世的，但似乎不很经常。在老一辈美国史研究的学者中，只有邓蜀生乐此不疲。也许是“臭味相投”的缘故，说白了，我特偏爱他的书评。《美国历史与美国人》中收了7篇，我又特别喜爱《林肯这个人》和《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这两篇，前者是评《美国内战史》的，后者是评《美国通史简编》的。我觉得，这两篇是书评佳作中的佳作。当然，正如通常所说的文无定法一样，书评该怎样写，谁也定不出一个“规则”来。只要能自圆其说、有自己的个性与风格，而非流于吹吹打打、肉麻兮兮，这书评大体上就可以说是好书评。我之特别推崇《林肯这个人》和《黄绍湘著〈美国通史简编〉》，就是因为它们典型地反映了邓氏的个性与风格。设若不是邓蜀生，恐怕就很难写出这样的美国史书评名篇。刘祚昌教授的《美国内战史》、黄绍湘教授的《美国通史简编》，先后问世于70年代末，邓蜀生是这两部代表了当时中国学者对美国历史认识最高水平的著作的责任编辑。我不知道、也未曾打听过那时编辑与作者之间如何切磋、合作的具体情形，只是想着重提到的是，在这两部有份量的著作问世的同时，邓蜀生先后在《读书》上撰文介绍，评是论非，蔚然一家。这两篇书评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并非面面俱到，而是各有侧重。除了评《美国内战史》、《美国通史简编》外，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涉及美国史研究的一些深层问题与解释。给人印象最深的，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评价林肯，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地位，也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评价历史人物（要）看主流。林肯发布《解放宣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美国总统，恐怕很难超越这个限度了”（第368页）。邓蜀生指出，“我们过去对美国历史人物或是避而不评，或是作简单化的政治鉴定。该肯定的不加肯定，因为是帝国主义头子。当然，在今天的形势下，也不要走到另一极端，……该批判的也不批判了”（第371页）；其二，活生生的历史离不开有血有肉的人物。“读史而不见人，就如同观看舞台上空荡荡的‘演出’；见人而不见主要的人物，就好比只见舞台上熙熙攘攘，看不出个所以然，纵

有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历史也只能把读史者带进不同时代的庙会气氛中,看起来热闹,看不出门道”(第365页)。就美国历史而论,邓蜀生主张,美国内战的中心人物是林肯,不是史蒂文斯,也不是魏德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中心人物是威尔逊,而不是德布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美国中心人物是罗斯福,而不是鲁登堡。“不管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的作用是比较积极的或非常消极的,这些人事实上是处在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中心地位。是好人,或是坏人,都应该大胆地去写”(第428页);其三,还中美关系史以本来面目。“中国人写美国史,中美关系史是一个重要课题。怎么写?还是按照过去的套套来写吗?……200年的中美关系史,一开始就是美国侵华史吗?”(第430页)事实当然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是有起伏的,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就不是侵略与被侵略、而是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同盟关系。邓蜀生以他特有的率直写道:“是侵华,不能说成友好,不是侵华,就不必算入侵华帐内。某一时期侵华就照实写下,另一个时期没有侵华……,也应该老老实实地照写。这样才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和历史的考验。写历史的人至少可以自圆其说”(第431页)。如何写书评?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很难回答的问题,说不清,道不明。关键是实践。邓先生为吾等晚学树立了榜样。

末了,我还想补充说明,作为中国学者的第一部个人美国史论文集,《美国历史与美国人》的问世是极令人鼓舞的。不知从何时起形成了这样一种莫名其妙的怪诞现象:治中国史者,出上几本个人文集,似乎平而无奇、无足挂齿,偏偏治世界史者难得有此机会。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为例,兢兢业业、埋首于此的老、中、青学者不下四五百人,然而在编辑、出版个人文集方面,却始终没有能实现“零”的突破。感谢人民出版社,终于隆重推出邓蜀生的个人文集,这在中国美国学发展史上开了一个可贵的先例。这是一个好兆头。

更正

本刊1993年第4期第120页第3-4行应为“(这)样的逻辑判断,即一种社会组织的变更,只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与社会之间的永恒矛盾,而无法加以克服,任何社会变革对个人自由”;第141页第5-6行应为“译介的美国史学名著,无论是史学名著还是在当代美国史坛流行的最新作品则相对较少。这里略举一例,如美国学者”。特此更正,并致歉!

信息

美中经济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胡国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自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大陆、台湾、香港之间的经贸往来不断增长。从1979至1989年的十年间,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额从170.5亿港元增至3434.4亿港元,增幅达19.1倍,大陆由此成为香港对外贸易的第一大伙伴。到1991

年底,在大陆实际引进外资额283亿美元中,香港投资占60%左右。而到1992年底,大陆在港投资总额已超过120亿美元,居香港外来投资之首。与此同时,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总额也从1978年的0.475亿美元激增到1991年的57.93亿美元,增幅达121.9倍!大陆与台湾间经贸关系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美中关系经历了艰难的低潮时期后,出现了向正常、平稳的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及美国声明今后外交政策的中心将是经济关系的今天,美国与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关系将向何处去,引起了中美学者和经济界人士的极大兴趣。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美国经济学会等单位于1993年11月9—12日,在我国南方的新兴城市深圳举办了“美中经济关系国际研讨会”。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美国的6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家和银行家聚集一堂,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

10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滕藤在欢迎词中指出,随着大陆、台湾两岸关系的缓和,以及香港回归祖国日期的临近,两岸三地的经济关系不断发展。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本次国际研讨会将就此进行讨论。因此这是一次既有学术意义、又有实践价值的会议。

在接下去开始的两天半时间的紧张讨论中,各方专家、学者抛砖引玉、畅所欲言,使得讨论热烈、而又气氛良好。

美国著名学者,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哈里·哈丁博士在发言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大陆、台、港三方经济关系的发展对美国 and 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及其前景。他认为,尽管在“大中华经济圈”的崛起中,人种因素(即三个地区都是华人社会)起了重要作用,但它不会发展成为一个排外的实体。因为它是外向型的,并且欢迎非华人的投资;同时,在大陆沿岸形成的各个经济网不仅相互加强了联系,而且也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经济的联系。因此,随着三方经济关系的发展,将为美国的工商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哈丁先生还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属于一种“低工资、低技术”类型,充其量是“低工资、中等技术”类型,在短时期内,不会发展为“低工资、高技术”类型,因此也就不会很快地成为美国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构成威胁。至于中国大陆和台、港三方的经济互动,能否导致三方的资源结合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实体、进而形成一个经济和军事的超级大国?抑或随着三方的这种经济互动,因此而导致大陆的分裂和解体?哈丁先生认为二者都不会出现。他批评了现在许多著作把大陆、台、港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外汇储备等经济资源计算在一起的作法,认为除非大陆和台湾统一了,否则这种算法是不合适的。他指出,随着三方的经济互动,大陆南方与其他省份的经济差别确实越来越大,但中国的中央政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制定了一个新的经济体制。在新体制中,大陆各省份经济上相互依存的成分会越来越大。因此,在今后几十年内,中国经济的一体化会是非常真实的。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陈宝森研究员在发言中分析了大陆、台、港经济关系的加强及中美经济关系的改善对美中两国的有益之处,并敦促克林顿政府像尼克松政府在1972年那样,采取勇敢的、创造性的行动,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谱写新的篇章。

台湾“亚洲与世界社”顾问委员会召集人陈明教授以其亲身参加对美贸易谈判的活动为据,考察分析了美国对台的贸易政策。他指出,克林顿上台以来,美国寻求的不仅是贸易自由化,而且是贸易公平化。美国已准备采取强硬手段来解决其他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如果以汉斯·摩根索关于广义帝国主义的定义来衡量,则美国贸易政策中的保护措施很像是“贸易帝国主义”。在对台贸易中,美国于1986年两度以301条款的贸易报复相威胁,迫使台湾取消了完税价格表,对美开放了烟酒市场;1989年又成功地使美国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公司进入了台湾市场。另一方面,则以“反倾销”和打击所谓“非法转运”为名,削弱台湾产品在美市场占有率,这种作法甚至导致了台湾一些产业的破产。陈教授认为,世界政治是强权政治,在进行贸易谈判时,只要政治力量不均等,力量大的一边难免不被看作

是“贸易帝国主义”，并且这种谈判往往干涉到力量弱的一边的内政。美国在其贸易政策上和作法上就常有“霸气”的表现，当然也有理性的一面。

中国外经贸部美大司官员区华榕先生在发言中简要叙述了中美贸易发展的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他说，两国贸易额从1972年至今，已从24亿美元发展到389亿美元（美方统计），发展是很快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最惠国待遇，301条款、知识产权、贸易逆差等问题。他认为，1989年以后，最惠国待遇问题被政治化了。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对中美双方、包括香港都不利；知识产权问题主要是执法问题，尽管中国做出了努力，美国却仍在抱怨；贸易逆差问题，美方把中国通过香港转口的贸易金额算在中方帐上，而实际上中方仅拿5—10%的加工费。他认为，今后中美在贸易上的争论会更多，纠纷不可避免，但应该采取理性的态度来解决，而不应采取高压手段。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拉蒙·迈尔斯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保持中美经济关系发展势头的重要性，认为应该使美国领导人对此有清楚的认识。他对美国政府以对外贸易为武器来达到非贸易目标的作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应该把人权与贸易问题分开、把武器扩散问题与贸易问题分开。他建议中国方面下大力气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特别是加快产权改革，明确私人财产的界限和公私财产的比例。在确定财产后，即可通过立法和市场来进行交换。他认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在今后5至10年内必须完成。中国更大的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能够吸收更多的美国产品，这将会成为美国的决策者们不将贸易问题与其他外交政策问题相联系的一个新的激励因素。

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商务系闵建蜀教授谈到中美贸易额统计上的差异问题，认为大陆通过香港转口贸易即使算入中国的外贸出口，现在美方的估值也过高了，因为这里面有香港方面的附加值。但究竟如何计算？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如何计算？他建议应研究出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方法。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青年研究人员韦伟分析了中美贸易双方的利得问题，认为统计表明这是一种互补互利的贸易。

摩根担保信托公司副总裁宦国苍先生在发言中分析了大陆与台湾经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他指出，现今两岸经济关系发展迅速的原因在于：两岸间劳动力价格上的差别（台湾劳动力的价格平均为大陆的7至8倍）；大陆市场的吸引力；各国和东南亚相继赴大陆投资对台湾产品价格造成压力，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台商不得不到大陆投资以降低产品价格；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大陆，此外，大陆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也使台商愿到大陆投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大陆劳动力价格势必逐渐上扬，能否继续保持对台资的吸引力就成了今后的一个大问题。他认为，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对政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经济互存、共同利益的发展会对政治上的接近产生有益影响，台湾工商界对台湾政治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现在就出现了这种现象：企业家走在政策的前面，而政策又走在了法律的前面。

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副教授陈一新先生分析了台湾当局对两岸三地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所采取的对策。他认为，所谓“大中华经济圈”的兴起使台湾当局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企业界要求向大陆投资，发展两岸贸易；当局却采取口头上支持，实际上强调建立这种经济圈的、文化和社会障碍的策略。陈先生认为，这些障碍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一下子克服，如果克服了，两岸也就统一了。因此，他认为台湾当局是在用“统一牌”来抵制“大中华经济圈”的形成，同时却在尽力使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挥作用，以谋求台湾经济不过分依赖大陆的更安全的策略。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章嘉琳研究员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探讨了两岸经济关系的发展，他认为当前世界贸易的地区化、集团化及盛行的“管理贸易”，是新形式的保护主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保护主义。在这种形势下，大陆和台湾均应减少对美经济的依赖，相互加强经济往来，以抵销世界经济地区化、集团化

带来的负面影响。

香港中银集团经研部研究员谢国梁先生谈到香港有人担心一旦两岸实现“三通”，原来香港在两岸转口贸易中所获益处将丧失殆尽。他通过仔细研究后，认为“三通”的实现是会对香港的转口贸易和两岸人员中转方面的收入造成一定损失，但台商和私人在港的存款不会有大的缩减，况且两岸直航将对亚太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亚太金融服务中心的香港将会从中获得足以弥补上述损失的好处。饼做大了，大家所得的份额都会更大。

武汉大学美加经济研究所陈继勇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人员侯玲女士分别就美国在华投资问题发表了看法。他们认为，美国在华投资发展较快，效益也好，但投资额相对较小。陈继勇教授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美国应淡化中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强调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并无条件延长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尽快复关，加快对中国的高技术转让。而中国则应进一步提高对引进美资重要性的认识，深化经济改革，尊重美商经营自主权，改善金融体制，加强对美投资的宏观控制。哈里·哈丁博士则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能源深加工和销售、以及电讯业等领域，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谈到中国复关问题，香港岭南学院社科院院长郭益耀博士和浸礼学院商学院院长范耀钧教授都认为，是美国政府作梗，使得中国未能尽快入关，这其中，政治因素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从保护民族工业、防止国际收支恶化的角度看，中国应暂不急于入关。但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入关后，机遇大于挑战，还是应尽早入关。

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执行副总裁托马斯·汤普森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董辅__先生在会上分别就美中两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作了深刻而生动的分析，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

会上，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王缉思、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主任斯蒂芬·尤哈利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青年研究人员范士明、台湾经研院顾问、台湾大学名誉教授施建生先生，以及哈里·哈丁博士等人还就“大中华经济圈”名词的含义及使用问题发表了不同见解，有的认为这个词生动、易记，有的则认为“中国经济区”或“中国三角”更好。大家虽未对此取得共同意见，但却一致认为，“大中华经济圈”只是一些西方人为了讨论方便而非正式使用的，不是正式的法律上的名称。

此次研讨会时间虽短，但正如陈宝森先生代表会议主办者的总结报告所说，学者们交流了观点、通报了情况，讨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中美经济关系的各种建议。各方面一致认为会议取得了成功。

简 讯

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中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的美国著名学者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于1993年12月2日来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访问，并与中国有关专家就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等问题进行了座谈。（雷克）

由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主办的“凯瑟·斯泰因、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对现代主义的贡献学术研讨会”于1993年11月2日在北京举行。30多位中外学者与会，提交论文22篇。（郭栖庆）

首都青年学者“21世纪与亚太”国际问题研讨会，1993年11月21日在外交学院举行。70多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50余篇。与会者对美国的亚太地区新战略、美日欧经济大三角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斯萍）

《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在1993年9月出版的第80卷第2期上,刊登了中国学者1990—1992年间出版的美国史著作目录共九篇。据悉,该杂志将陆续摘登中国学者近年出版的论著目录。(黄安年)

1月20日下午,美国财政部长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un)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报告会由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主持,财政部长刘仲藜和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出席了报告会。本特森说,他此次访华有三个目的:在中国市场中寻求美国经济利益,显示美国对中国经济改革及进一步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切结合的支持,清楚表示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相信,美中两国能够解决现存的分歧。本特森并回答了社科院学者提出的问题。(文钊)

新书架

《美国历史与美国人》 邓蜀生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除“自序”外,正文444页。全书共33.8万字。

这是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的一部论文选集,也是中国学者的第一本个人美国史论文集。计收入1964—1992年发表的有关论文、书评、序文27篇。涉及美国移民史、罗斯福新政及外交等内容。该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品位,但个别提法仍有失真实(如第340页称“黄兆群同志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位美国史博士”之类)。

《美国社会经济史论》 黄安年著。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除“序言”外,正文608页。全书共48万字。

作者黄安年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系其有关论文、评论等的结集,计37篇。考察了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发展道路及特点、动因,强调了改革、开放与美国发展的关系。只是有些篇目(如“人权”等)与该书论旨无甚关联。另有一些史实欠确之处,如第573页误把美国人高理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裨治文的《联邦志略》当作两个人的两本书(其实是同一作者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等。

《美国工人运动史》 张友伦、陆镜生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除“前言”、“结束语”、“附录”外,正文697页,分7编、26章。全书共58.8万字。

两位作者均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这是出自中国人手笔的第一部系统论述自殖民地时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人运动兴衰史的专题著作。作者认为,美国是工人运动发生最早的国家之一,曾在19世纪经历过狂风暴雨的时期,亦留下过光荣的革命传统。后来逐渐被纳入法律轨道。1955年劳联、产联合并后,“美国工人运动基本上纳入美国资产阶级政府可以控制的范围”(第697页)。该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承认美国工人运动的特殊性,但不承认它是一种例外”(“前言”)。

《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 茅于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智慧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9月第1版。除“出版者的话”、“总前言”(田国强等)、“前言”、“参考书目”外,正文257页。全书共17.3万字。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軾的一本新著,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组织编写、田国强主编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之一。作者结合其旅美经历,说明市场经济的运

作流程及规范,涉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体系。“本书所讨论的不限于经济学本身,特别探讨了经济制度运行的整个社会背景。”其关注的焦点是:“为什么美国如此富有?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前言”)全书计44篇,自成一體,深入浅出,有很强的可读性。

《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 何顺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除“导论”外,计16章,正文326页。全书共27万字。

这是一部探索美国西部拓殖史的创新之作。作者何顺果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从“西进运动”的考察入手,本书着重研究了西部迅速开发的原因及其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大西部的拓殖从一开始就是在资本主义原则上进行的,它乃是一个纯粹按资本主义方式开发的典型模式”(第77页)。西进促进了一个新西部的诞生,并使之发展为“美国的最美国化的部分”。移民及其大规模的西部开发,是“美国在经济上由商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变,并最终实现工业化的强大动力”(第7页)。

《西书拾锦》 冯亦代著。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除“后记”外,正文285页。全书17.5万字。

这是散文家、翻译家冯亦代的一本有关美国文学的随笔式评论集,系《人间小品》丛书之一。除个别篇目涉及英、俄作家或作品外,均为对美国文坛名家或名作的品评(如欧茨、厄普代克、海明威、辛格等)。行文轻松活泼、读之趣味盎然,不失为大家手笔。

《“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总编:施咸荣;执行编辑:金灿荣、赵梅),现代出版社1992年第1版。16开本。除“代序”(李慎之)、“序言”(资中筠)、“附录”外,正文515页。全书共66.7万字。

本书是199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20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涉及外交与战略、经济、文化、教育与科技交流。共91篇,其中中国学者(含台湾学者)55篇(包括综述在内)。

《中国大陆美国研究现况与分析》 李本京、于子桥著。台北正中书局1991年12月初版。除“序”、“作者简介”、“附录”外,正文计4部分。全书共210页。

本书作者李本京教授现为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于子桥教授为美国伊利诺大学政治系主任。其目的“是要阐明大陆美国研究的概况,并且加以适当的分析”(“序”)。该书首开海峡两岸美国学界交流之先河,不无贡献。然惜乎多有隔膜、讹误,尤以其所附《“成就学者”参考名录》为甚。
(英堂供稿)

J.G. Blight, *Cuba on the Brink: Castro, the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oviet Collaps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3.

1992年1月,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对手,包括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赫鲁晓夫的助手,以及卡斯特罗相聚在哈瓦那,面对面地交换他们各自对30年前那场危机的回顾与评论。本书介绍了此次特别聚会的背景和基本原则,逐句记录了与会者对危机期间决策过程的回顾,几位关键人物的言论、举动,及其对对手的左右。

Z.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1993.

布热津斯基曾在《大失败》一书中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巨变做了令人惊叹的判断。在最近完成的这部新作中,他分析了全球的政治思潮,对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日本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政治大国、西方社会在道德与精神上的衰落等等世界范围的新课题作了全面分析,并探讨了解决这些危机的方法。他对西方社会日益膨胀的物欲与放纵,以及社会价值观的大混乱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与担忧,并提出了对策。全书自始至终贯穿了一种温和保守主义的观点。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Y. Knopf, Inc., 1993.

萨伊德是当今世界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文学评论家,在《文化与帝国主义》这部新作中,他分析和阐述了这样两个主要问题:欧洲人一直试图去统治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另一部分世界,从而将欧洲“文明”移植给那些本该被征服的“野蛮人”。与此同时,抵御欧洲统治的斗争导致了非殖民化运动和新的文化特征的形成。萨伊德的分析是令人信服的,因为他的政治结论是以深入的文化研究和广泛的文学分析为依托的。他阅读了大量名家经典,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著作,以探索抵御欧洲文化的根源。最后,他将目光转向美国,分析了美国演变为帝国主义大国的历史,指出美国的发展虽迟于欧洲,但其自我赋予的“使命感”却比欧洲人更为强烈。

H. W. Brands, *The Devil We Knew: American and the Cold War*.

E. Pessen, *Losing Our Soul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冷战的突然结束,使绝大多数美国人以往所具有的对未来的担忧一下烟消云散了。但作者认为,其实早在80年代末期,美苏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是一种比较平稳、正常的状态了,双方彼此了解。佩森在书中尖锐批评了过去40年的美国对外政策,认为美国对苏联意图的判断一直是错误的。布兰兹的批评则较为温和,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一直受到心理、战略、经济、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冷战时代的不同时期产生了不同作用,但它一直左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

D. H. Lumsdaine, *Moral Vis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Foreign Aid Regi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作者认为,美国在提供对外援助时应更多地着眼于人道主义目标,而不是政治或经济利益。书中,他反驳了对外援助中的现实主义观点,对过去40年的国际援助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美国的国际援助体系,并对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计划进行了评价。

H. Chang Parriss *If China Crosses the Taiwan Strait: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3.

大陆从未排除过对台湾动武的可能,如果这一天真的出现,情况将会怎样?一些专家被邀请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马克·普拉特认为,美国有必要向北京暗示,美国乐于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美国坚决支持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将采取严格的中立态度。

Tan Qingshan *The Making of U.S. China Policy: From Normalization to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3.

同其他许多研究中美关系的著作不同,本书将研究重点放在政府的外交政策决策过程

上,特别是国会与行政当局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上。他特别分析了美国政府的政治程序对华政策的制定所产生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并非总是出于战略考虑,国会及行政当局本身的某些因素对政策的形成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R. G. Sutte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Challenges for U. S. Policy*. R. P. Cronin, *Japan, the U. S. and Prospects for the Asia-Pacific Century: Three Scenario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2.

萨特与克罗宁都是美国国会研究中心的资深分析家,专门从事美国与东亚问题研究。多年来,他们就美国在亚洲所面临的政策难题向国会提出了许多权威性的分析报告。这些报告通常不作公开发表。这两本书是他们首次以那些报告为基础编辑出版的。书中分析了克林顿政府亚洲政策中置于最优先地位的日美关系的前景,探讨了广为流传的关于美国因更多地致力于北美事务而可能从亚太地区逐渐撤出的问题。
(高英东供稿)

告 读 者

《美国研究》(季刊)自1987年创刊至今,已历七载,风风雨雨,苦苦甜甜,在作者、编者、读者的共同培育下,得以维持至今。在此,编辑部全体同仁仅向热心的作者和读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新的一年,在创办本刊的初衷不变的前提下,为拓展稿源,突出各家独到之见,提高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我们对版面做了一定的调整。除保留原有的“专论”外,新辟“论点摘编”、“书评”、“随笔”、“专访”、“学术动态”、“新书架”、“争鸣”等栏目,欢迎学者们赐稿。使这本刊物真正成为中国所有从事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们共同的园地,对传播、深化和交流对美国的认识和理解作出我们的贡献。

但愿新春之际,我们送到读者手中的这份刊物,能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本刊编辑部
1994年新春